

内 容 提 要

拉鲁斯是19世纪法国百科全书编纂家、出版家兼教育家。本书着重介绍他把一生贡献出来、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甚至把健康牺牲掉，耗尽心力完成大百科词典编纂工作的种种事迹。本书还通过介绍拉鲁斯一生的经历，向读者提供了19世纪法国的重大事件、教育情况、民情风习等，宛如一部生动的历史画卷。

本传记可供法语工作者、语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社会科学研究者、外语教师、大中小学教师及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者阅读。

译者序

作传与写史原是两个概念，但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写史以记事，但不能离开在其中活动的人物，因为没有人物也便没有了事件；作传以志人，但人物要写得生动、真实，又必须把他们放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去写。我国的太史公司马迁是深懂这个道理的。他的一部史记凡一百三十篇，计：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其中本纪、世家和列传，实际上都是人物传记，共一百二十篇，占史记的绝大部分。《皮埃尔·拉鲁斯传》的作者通过拉鲁斯传向我们提供了19世纪法国历史的缩影。使我们在了解拉鲁斯一生的同时，也了解了法国19世纪的重大事件、教育情况、民情风习……等。这本传记也可以说是一部生动活泼的历史画卷。

大约全世界所有懂法文或正在学法文的人都知道，拉鲁斯是一部法文大词典的主编。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学者还是专家，大约都翻阅过拉鲁斯词典，在专业法语工作者中，他的词典几乎可以说人手一册。但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他的名字尽管在全世界广为人知，却很少有人能说出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因此，当我发现法文原版拉鲁斯传时，欣喜万分，用了几周业余时间把它读完。原书约40万字，翻译时作了选择和删节。

读拉鲁斯传，有如走进一座辉煌的知识宫殿。19世纪法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如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著名的巴黎围城、巴黎公社、凡尔赛军队的大屠杀等等，作者利用拉鲁斯留下的材料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绘。其中许多细节，不见于正史，却作为当事人目睹的事实作了娓娓动听的叙述。此外，本书围绕拉鲁斯的经历，向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知识，如文学艺术的美学思想、宗教思想、哲学思想、对妇女的看法、社会观念、道德观念、政治经济学、文学史、教育观点、教学改革、以及当时法国各级学校教育的情况和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等等。可以说，这部传记的本身就是缩小了的一部19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

这里应当提一下拉鲁斯的教育观点，因为对我们今天仍有启迪作用。他讲的虽是初级教育，不仅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甚至大学教师也应从中吸取教益。例如，他认为教育“首要的乃是培养人的品质、判断力和道德观念，这比培养才智更重要”。他还引用了巴黎大学教授博坦的话：“只管传授知识是不够的，占第一位的是道德品质教育。”要做到这一点，拉鲁斯认为“教育者本人要有高尚的情操和爱学生的品德”。他并且“始终赞扬小学教员这一名称的光荣和这一职业的高尚”，赞扬“他们美好的品德和功绩”，他办的教学杂志对小学教师去世都予以报导。他还认为“小学教员应该具有广泛的知识（我们不说他应该是个学者），他应该热爱自己的事业，如果他对这一工作毫无兴趣，那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好”。他还说：“小学校长和小学教员职务是低下的，但从未来教育事业的进步和繁荣观点来说，却没有一种职业比它更为重要。”

拉鲁斯十分重视教学法的改革。他的教学法归纳起来一是重实践，二是重“有用”和“有趣”。他反对教员满堂灌，学生死记硬背，反对枯燥的讲解。他提倡办女校、并实行义务教育。对

学生他提倡要爱，反对体罚，但又不是溺爱，他说：“所谓真正的爱，是用知识的力量来熏陶他们，而不是溺爱。”，“你愈是粗暴地对待一个性情怪僻的孩子，就愈会使他无可救药。”这些观点在19世纪的法国，无疑是一种革命。

他对农业的发展也相当重视，他在《师范学校》上写道，“30年来，法兰西在农业上取得了不容置疑的进步，各地的农业促进会，各类农业学院大大增加……这种努力是值得赞扬的，那价值远远超出了中国皇帝单纯致力于单一的土地耕种。……‘乡下人’，尽管它听起来刺耳，尽管它的渊源是十分高贵的，但如果他们再晚生1000年的话，他们便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在这之前，只有佩剑贵族，强权贵族，随后便是锦衣贵族和学者贵族，但将要到来的却是农业贵族和粗手贵族，这是于人类最有用的贵族。最崇高的荣誉，从前只授予那些战场上的英雄……而今天，在牛棚马厩里工作的人，在田野上耕耘的人，以及驾牛割麦者都可以得到！……”

在谈到他努力工作为出版大百科词典而耗尽心力却遭到误解批评时，说：“……我们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做法却受到怀疑。在这种唯利是图的气氛中……在这个出版作品完全变成商品和不健康的时代里，道德、情操一文不值，招摇撞骗大行其道……因此，人们就很难相信，会有那么一个傻瓜竟能把自己的一生贡献出来，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甚至把自己的健康牺牲掉来完成一部诚实和自信的作品。……”他在另一处还愤愤不平地说：“一部作品的价格，并不总是由该作品的文学价值来定的，新闻小说，丑闻秘史之类的东西，曾不止一次地冲击了作品的实用性及其文学价值。”

他对艺术作品的看法也很有意思，在批评蒲鲁东的观点时，他指出：“……他没有感受到纯物质的美，没有感受到一幅美丽

的画面或一尊美丽的雕像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魅力。他只要求艺术具有实用性和说教性，但他却忽略了艺术的目的首先应有欣赏性，与此同时也要努力提高其思想性。我们不应该忘记，艺术品首先要能赏心悦目。”

这类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的观点，在本传记中颇不少见，此外，他勤奋工作的精神也很感人。

本传记涉及面广，可供法语工作者、语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社会科学研究者、外语教师、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及广大的学生阅读。

由于译者水平不高，错译、误译之处，希望热心的同行们给予批评指正。

王 殿 忠

于南京

作者原序

本书的出版，旨在纠正一桩不公正的历史事实，从而结束几乎100年来人们对此所保持的沉默局面。

皮埃尔·拉鲁斯这个名字，在全世界广为人知，它几乎成了法语词典的同义词，而奇怪的是，世界上几乎竟没有一人能够准确地道出拉鲁斯究竟是什么人。不用说在一般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便是在研究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学者著作中也找不到他的名字。如果你想到阿尔劳和萨尼亚克^①的著作中去寻求，或是到《名人百科大词典》上去查找，也是枉费力气。便是在《科里奥文学词典》或《新版科里奥文学词典》里，甚至在《文明通史》中，也同样不见他的影子。直到1966年，《不列颠百科全书》才给了他一席之地，也不过是一简单的小传而已。而这一小传在《梅尔会话手册》1909年版中便已出现了。此外，就是在专讲教育和训练的著述中也不见其人（费迪南·布耶松1911年所编《教学和训练词典》和莫里斯·夏瓦尔代1966年所著《教育大师传》除外）。确切地说，他的名字除了语言史专家如布律诺特、布鲁诺、凯马

^① 这两人都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译者

达、马特雷、以及《名人百科大词典》中的“语言”条目下曾提到过以外，从没有人提起过。但记者们只要有机会却是常常提到他，尽管这些人常常把他的名字挂在嘴上，但有关他的传略不是荒诞不经，起码也是错误百出。

在《法兰西大百科全书》中，阿纳托尔·蒙济对拉鲁斯作了一个浮光掠影的概述，他说：“的确，对拉鲁斯的职业作一概述还是必要的。拉鲁斯（1817~1875）由自学成才而成为一个教育家，高级小学校长，后来又投身于反教权主义中去。1852年成为一个出版家，并于1866到1870年间出版了15大卷对开本词典（另加两卷增订本），这就是《19世纪万用大词典》，其内容包括语言、历史、地理、神话、传记、文学、艺术、科学……等门类。这一宏篇巨著遂成为不论是文化界和其它各界所使用的不断出版的各类词典的基础、依据和样板。”这一简短的叙述概括了他的一生，但其中至少有三处错误：第一，拉鲁斯并没有领导过一个高级小学；第二，他的词典出版工作是在1876年结束的；第三，该词典也不是对开本。……

作家们对这位词典编纂家也并不更为宽厚。对于佩吉和热拉尔·博埃对拉鲁斯的评价，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保持缄默。于勒·勒纳尔的日记对他不予理会；龚古尔的日记中倒是有两处提到过拉鲁斯，但说此人是一个高级细木工！类似这种排斥异己的现象，原因很多也颇为复杂。首先，他没有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传记，而拉鲁斯书店对其主要创始人的传记出版又过于慎重；其次，有些人竟毫无道理地认为他是一个第二流的次要人物；还有，出于对一个搞普及工作的人的蔑视和看不起，认为他是从事“初级”题材创作的作家。有人说，虽然他文笔生动，但却缺乏认真的修饰和润色。还有人说他过于感情用事，并且时代的烙印在他身上也太深，致使其著述有一些已经过时了。……

然而，却有数以几十万计的讲法语的普通人，从他的著述中学到了我们的语言，也有同样多的记者和法文读者每天都在查阅他的词典。拉鲁斯在法语教学上进行了一场革命。他同奥古斯坦·布瓦耶合办了一家生意兴隆的书店。这家书店可以说为走向共和开辟了道路。也可以说，它极大地陶冶了当时的法国人，特别是陶冶了全体小学教师。他对第三共和时代的影响是明显的。如果说，拉鲁斯不是一位先知的話，那么，在许多方面他至少是一个先驱。比如，自1861年起，他便为实施义务教育大声疾呼，1873年他便已明白无误地勾画出当时历史教育的现状。自那时起，他便是政教分离的鼓吹者。作为蒲鲁东的信徒，100年前他就主张人民参加国家的管理……1894年10月，他的故乡土西城为他的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公共教育部长乔治·莱格在会上说：“拉鲁斯是对他所处的时代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在通过教学手段和自身的努力来教育人民、传播知识、解放思想等方面，再没有人比他贡献更大了。”

为使这位被埋没了的伟大人物复活，我们的资料来源在哪里呢？首先，一点档案资料都没有！有关这位辛勤的耕耘者的所有文献都已散佚，其中包括他的信件（只有几封被保留下来），给人的感觉是，他生前似乎没写过一行字。而实际上他却是上一世纪写作最多的法国人。其写作量之多超过了巴尔扎克和雨果。幸而他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于是我们便从他排得密密麻麻的20700页的《19世纪万用大词典》中，在他创建和主持的教学杂志《师范学校》和《竞赛报》中，在他写的大量教科书和他的其它书籍中找到了最清晰的材料。我们还从奥拉斯·马尔古（1893～1970）丰富的研究成果中，在《研究、探索和保护古城土西协会公报》中找到了佐证。我们已经打开了通路，同时也希望今后有关他的论文、凭证、书籍等，能继续开拓我们已经开始经营的

这块土地。

由于我们和这位豁达大度而又无比勇敢，并且出身平凡的人有着长期亲密无间的历史关系，因而得以窥见他心灵深处的东西并对他充满了景仰之情。我们无意对其充实的一生中某些缺疵加以掩饰，我们谨希望能在出版界和思想界的历史厅堂上有他一席之地。他的一生堪称楷模。他是修车匠兼铁匠的儿子，应该说是白手起家。由于改革了教育方法，他得到一笔款子，但却把它们全部用于民众教育事业。即此一桩便足可证明，他是大公无私的典范，富有献身精神的典范和忠于自己原则的典范。作为一代青年的导师，在这位灵魂的冒险家身后，仍有一大批当代青年在追随着他。因为和他们同样，他也会是一位对现实不满者、幻想家和具有雄心的人。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位浪漫主义者、是一位体魄健康、心地善良、充满现实主义和勤奋努力的浪漫主义者。

目 录

译者序	(1)
-----------	-------

作者原序	(5)
------------	-------

第一章 农村的童年	(1)
-----------------	-------

土西，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1)
-------------------	-------

铁匠铺和小客栈	(4)
---------------	-------

童年	(6)
----------	-------

成长中的苦读者	(10)
---------------	--------

拿破仑气氛	(13)
-------------	--------

第二章 从小学教员到大学生 (1834~1852)	(15)
---------------------------------	--------

在凡尔赛	(16)
------------	--------

在土西任小学教员	(18)
----------------	--------

在驿车上	(21)
------------	--------

路易—菲力普时代的巴黎	(21)
-------------------	--------

“图书馆馆员”	(23)
---------------	--------

永不毕业的大学生.....	(26)
思想的演变.....	(29)
1848年的革命.....	(33)
任教于若伏莱私立学校.....	(35)
苏珊·科贝尔.....	(36)
拉鲁斯的浪漫主义.....	(38)

第三章 教育学家.....(42)

1850年前后的教学法.....	(43)
教育、教学、小学教员.....	(46)
词汇学家.....	(49)
词汇学.....	(50)
其它学科.....	(52)
拉鲁斯的教育学原则.....	(53)
教育杂志.....	(56)
1856年的词典.....	(57)
其他著作.....	(60)

第四章 拉鲁斯—布瓦耶书店时期 (1852~1869)

.....	(65)
当时的巴黎.....	(65)
奥古斯坦·布瓦耶.....	(68)
勤奋地工作.....	(71)
剧作家和记者.....	(73)
闲逛巴黎街头.....	(75)
旅游和消遣.....	(78)
友谊和政见.....	(79)

书刊发行人.....	(81)
第五章 大百科全书	(82)
事业的起源.....	(83)
维克多·雨果和蒲鲁东的支持.....	(91)
拉鲁斯的宏图.....	(94)
合作者.....	(101)
钱财问题.....	(107)
大词典的语言内容和思想内容.....	(112)
评价与批评.....	(115)
第六章 性格与观念	(120)
道德观念.....	(123)
社会观念.....	(126)
政治观念.....	(129)
宗教观念.....	(132)
文学趣味.....	(136)
勃艮第人.....	(139)
善良、正直.....	(141)
博学多才.....	(143)
第七章 悲剧性的余年 (1869~1875)	(147)
健康状况不佳.....	(148)
印刷厂的出赁及分离.....	(151)
1870年的战争.....	(154)
巴黎围城.....	(158)
巴黎公社.....	(164)

拉鲁斯笔下的巴黎公社.....	(167)
拉鲁斯与巴黎公社.....	(171)
结婚和去世.....	(173)
纪念碑.....	(177)
身后的荣誉.....	(179)

第八章 继承人.....(182)

奥古斯坦·布瓦耶和苏珊·拉鲁斯.....	(182)
家庭企业.....	(186)
一个百年的书店.....	(188)
其他重要词典.....	(190)
国外影响.....	(194)
今天的规模.....	(196)

第一章

农村的童年

家乡的土地对任何人都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而对作家和艺术家来说，这种影响表现得尤其深刻，因为他们对其所处的环境及其周围的物事的感受，比一般人要敏锐得多。因此，我们就应该回顾一下拉鲁斯在其中成长的第一个环境。他于1817年10月23日生于罗纳省的土西城。该城距奥塞尔25公里，距巴黎172公里，座落在乌阿纳谷地的一个小山坡上，周围是一片大牧场，再向外看，便是起伏的群山，山坡上长满郁郁葱葱的树林，农舍错落其间。这便是小拉鲁斯生长的环境。

土西，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拉鲁斯的家乡，自他1817年诞生至今，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第一帝国的乌云刚散，在沉重的战争负担和在被占领者的奴役之下刚刚解放，所到之处满目疮痍。1894年10月14日，为这位词典编纂家举行纪念碑揭幕式时，大家便已注意到发生的变化，因为在这一天大家也同时为能够供水、供电而庆贺：“毫无疑问，作为思想宣传家的拉鲁斯，如果地下有知，看到他的名字

能和一个进步的业绩联系在一起，他会感到骄傲，但却绝不会感到惊奇。因为当他离开这个用冒着黑烟的煤油灯照明的故乡时，他就预见到，有朝一日这里将会有清洁甜美的饮水和干净明亮的电灯照明。”

土西的居民也能从拉鲁斯本人对其家乡的描绘中感到快慰。这篇文章原载《师范学校》杂志第三期，尽管岁月在流逝，情况在变化，但他们仍能在字里行间认出自己的城市，尽管作者在文章中虚构了某些地方，但他们从中体会到了作者对自己家乡的温情和热爱。

“土西居于风景秀丽的莫尔旺和普依塞谷地中央，两岸野花芬芳扑鼻的乌阿纳河流经市镇，就更增添了它几分俏丽。自下而上，山坡上形成层层梯形花园，把城市装点得颇具东方风味。这块土地尽管被罗马人的铁蹄践踏得七零八落，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创伤，但它仍然是高卢式的。许多本地人常用的习语从未出过省界，这便是我国文化遗产的有力证明。如果语言因素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当地居民的典型高卢人的性格就能说明一切：这里的男人健谈、好奇，兴趣广泛，喜欢传播消息，而女人们则对哪怕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有灵敏的反应。如果你想把一件事闹个满城风雨，并传到朗戴尔诺^①去的话，那么你只要把这件事告诉土西城的一位妇女并请她答应你一定要严守秘密就够了。

“土西的教堂是在封建时代的一片废墟上建起的，已相当古老，外表庄严肃穆……土西的城堡在市镇的另一端，规模宏伟，但内部已破败不堪无法居住了。其中许多建筑规模不小的殿堂。一个世纪以来从未透过阳光。蛇在地下室里肆意穿行，巨型蜘蛛静悄悄地在阁楼上结网。城堡中遍布地道，随处可见弃置不用的

① 朗戴尔诺是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的省会，距土西城十分遥远。——译者

枯井。这个中世纪的城堡似乎就是一部阴暗的历史，使人感到是个可诅咒的地方。有朝一日如果我能达到蓬松·泰拉依^①那枝巨笔于万一，我将酝酿一部恐怖小说，其中有可怕的阴谋，有涂面的强盗，有杀人的毒药，有带血的匕首，那么，最惊心动魄的场面一定是在一个狂风暴雨，地动山摇的深夜，那地点就在土西城堡深深的地下室的最下边一间屋子里。”

“但土西除了它的城堡和教堂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为本城增光的东西，那就是芦笋。其生长的土壤为沙质，以泥灰石和粘土为基底。这种土壤结构，就如天生为这种植物准备的温床一般。这种芦笋是食物品尝家餐桌上的珍品。正如埃莱娜是斯巴达所有女儿中最漂亮的女儿一样，土西的芦笋也是南方芦笋中味道最鲜美的芦笋。如果土西有那么一位敢做敢为的人来种植这种植物的话，那么每公顷平均收入将会达到一万里弗尔。这种芦笋味甜而鲜，做出菜来鲜美异常。倘再加以白汁调味，便能烹出它特有的原味。此菜清淡可口，如略加些醋及油烹调尤妙。品尝土西的醋油芦笋，其口福无异于享用蒜烹雪鸭或野鸡烩肉块。如果有朝一日在鲜花盛开的时节，塞纳河两岸的饕餮者尝到土西芦笋的美味，那么别的东西他们便会觉得啖之无味了。”

土西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蒙昧时期，这里有大量史前时期的遗物。两千多年前便已开发了铁矿，这里的民族属塞农人的后裔。它有着一个光辉而痛苦的历史，曾遭异族入侵，曾受过连年战火洗礼……到拉鲁斯时代，全镇共有2400人。主要产品是大型慢帐，半毛半麻的混纺粗呢。工厂有酒桶厂、地板厂、制革厂、毛纺厂，此外还有赭石矿、矿泉水、皮革、木材等。

除拉鲁斯外，土西还在15世纪出了一位诗人名叫皮埃尔·格

^① 蓬松·泰拉依（1829～1871）法国小说家，185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自1853年起，便不断在法国各报上发表连载小说，取得巨大成功。——译者

罗涅，再有一位是红衣主教吉龙。

铁匠铺和小客栈

在路易十八执政时期，一个名叫爱德姆·阿塔纳斯·拉鲁斯的人来到土西，并在那里开了一座造车铺兼铁匠铺。他祖上原是荣纳省库尔松的一家自耕农。他搬来后，生意兴隆，因为土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商业中心。但在拿破仑连年战争期间，却处于十分萧条状态，到了19世纪，土西又恢复了生机，朝气蓬勃地发展起来了。阿塔纳斯开的作坊紧靠着路易斯·纪依姆的家。路易斯·纪依姆出身于土西一个传统的纺织工和制呢工的家庭，在从事混纺粗毛呢的生意中发了财。她于1816年11月27日和爱德姆·阿塔纳斯结了婚。1817年10月23日便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皮埃尔·阿塔纳斯。他就是小拉鲁斯，大家都习惯地称呼他为拉法埃尔，这是他在库尔松的祖父的名字。他的童年便在他父亲的铁匠铺和在他母亲自己经营的小客栈里度过。这个小客栈位置选得非常之好，就在王家公路旁边，从奥塞尔来的车辆都要在这里打尖。每星期六逢集的日子，从早晨太阳刚刚出山直到红日西下，方圆40公里内所有的客商小贩都云集于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拉鲁斯家里生活相当宽裕。他祖父母是位于土西以南几公里的库尔松一个村子的自耕农，外祖父母也是一个小康之家，而且声誉相当好。小拉鲁斯对他父亲有真挚的爱，而对母亲之爱尤深。1871年10月21日他母亲在土西去世，对他是一严重打击，健康状况更加恶化。母亲是一位精力充沛而又讲究效率的人，她抚育着两个孩子（一个是小皮埃尔，另一个是他的姐姐索菲亚·玛丽一路易斯）同时还经营着一家小客栈。这家客栈后来改名为“奥塞尔城市旅馆”，现在依然存在。因此，伴随着小皮埃尔童年

的，是通红的锻铁炉火和小客栈的酒吧间。

拉鲁斯后来曾著文赞扬他的母亲。他是自卢梭以后赞扬母爱的第一人。他写道：“实际上，没有任何感情可以同母爱相比……母爱是永生的。它不受死亡的羁绊，也不因子女的忘恩和不孝而受到影响。它一直存在到母性心脏的最后一跳……。她是一位母亲，那么，她就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三重崇高的使命：十月怀胎，生儿育女，并把他们抚养成人。因此，我们应该完全忘记她们性格上的疏僻、操行的不贞和个性上的缺陷，而只应该记住她们这三大功勋。这也是她们能在世界上生存的唯一理由。”在这里，作者明显地流露出对女性的轻视。

在《师范学校》杂志上，他甚至建议规定作出母亲的本分，并引用了他非常喜欢的话：“作为母亲，儿子出生后第一声呼唤的便是她，在痛苦和危难时喊出来的仍然是她。当孩子幼小的心灵上感到幸福、觉得高兴时，倾述的对象还是她。她可能是他长久的，甚至是永远的最亲密的朋友和最亲爱的人。当孩子能够喊‘妈妈’这两个字时，他便非常喜欢在各种场合之下，用各种声调重复地呼唤着，这就是孩子在哑哑学语时发出的声音。”（见《师范学校》第四册）怎能设想，拉鲁斯在摘抄这几句话时，不想到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童年生活呢？而关于“父亲”这一词，在他的大百科词典里却未见有如此的发挥。

但父亲在修车铺兼铁匠铺里的工作，对孩子时期的拉鲁斯，印象却非常深刻，甚至到成年时还经常提到它。在词典里，他详细描写了修车铺的工作细节：“……要造耕犁、钉耙等，就需要有修车匠，也需要有把零配件、各种工具和种地用的农具从这里运到别处去的车辆。因此到处都可以找到修车匠。哪怕是乡村里最小的一个居民点，也总有一个制车作坊，这种作坊一般都靠近兼掌马蹄的铁匠铺。这种造车铺不做别的，只制造装饲料和某些

原材料的大型车辆。……造车的木材一般是榆木，柞木，栎木，槭木，山毛榉木，千金榆木等。车轮壳一般用榆木，车轴一般是铁的，车轮的这一部分离不开马蹄铁。”（见大百科全书《车匠》及《车轮》条目）

铁匠铺，大车制造作坊，小客栈的餐厅，以及餐厅里的食客，向这位土西的孩子提供了一个观察、欣赏的舞台和酝酿灵感的温床。

童 年

小皮埃尔成长的环境是一个充满神话故事，充满对术士巫婆的迷信和各种无稽之谈盛行的世界，同时也是儿童们恣意嬉戏的世界，他便在这个环境里长大。“我孩提时代，特别相信妖怪夜间变成狼出来吃人的故事，因此我就特别害怕。人们还从一本小书上给我读“克罗克米戴纳”^①的恐怖故事，我只要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吓得浑身紧缩不敢移动。每天晚上聊天的时候，都有人向我讲阴森可怕的幽灵如何夜游等等，如果晚上我一个人在公墓的墙下走路，就会吓得直哆嗦。我一个人也从来不敢晚上进教堂。我经常回味着我家的一个老女工给我讲的那些故事，她的故事经常吓得我喘不出气来，浑身颤抖直打冷战，但我宁愿打战也要听。她还常带我去参加巫师、巫婆们举行的‘巫魔夜会’，我就跟她去，我用眼看着他们。他们似乎也带着一种恶魔似的冷笑在看我。她也常向我讲，死尸如何在裹尸布下跳舞。还有一些魔鬼的头上长着角，脚下是分叉的蹄子；于是我眼前便经常出现这些魔鬼，它们都用发着红光的眼睛看我，直看得我全身的血液都凝

^① “克罗克米戴纳”是当时大人们用来吓小孩的妖怪。——译者

固了。每次听这样的故事我都万分惊恐，而每次我也都得到万分满足。我是一个胆怯而又轻信的孩子。长大成人了，我慢慢地发现，我的理智和学识把我童年时荒诞不经的迷信都抛弃了，但不管怎么说，要想在我头脑中把那时得来的印象抹掉是不容易的。”

于是拉鲁斯在他的词典中便反对那些给孩子们心灵造成恐怖的东西。在“克罗克米戴纳”条下，他一开始就这样说：“不论在什么时代，也不管在哪个国家，大人们总是想出一些阴魂和妖怪来吓唬儿童，企图以恐怖来使他们唯命是从。”释文接着又毫无顾忌地说：“而神甫们的做法又远远超过了大人对孩子们进行的这种恶劣的启蒙教育。他们对待大人就象对待大孩子，把他们置于无知和迷信的枷锁之下。‘克罗克米戴纳’就是这些迷信故事中的一个。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哺育孩子们的乳汁，是从令人恐怖的恶魔身上挤出的。在为孩子们出版的带插图的书藉中，大多都充斥着这些东西，甚至它们在幻灯上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结论中，他写道：“在中世纪末期，‘克罗克米戴纳’的角色便由魔鬼来承担了。人们经常看到，为使不听话的孩子就范，哺育他们的总是那些阴森可怕的故事，其形式则视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不同。这些东西经常刺激着他们的想象，那结果，与其说使他们具有刚强的性格和发展他们的智慧，倒不如说使他们变得奴性十足和愚昧无知。有远见的人很久以来便大声疾呼，反对如此愚蠢和不理智的做法，而且身体力行，对孩子们进行耐心的开导。这些孩子巴不得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个‘克罗克米戴纳’才好，于是善良的妈妈如果再向他讲诸如‘克罗克米戴纳’要把他带走的蠢话，这位小反抗者便会从心底发出笑声。并会说：‘你去找克罗克米戴纳去吧！好妈妈，克罗克米戴纳是不会来的，他已经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神话故事是儿童们的神奇世界。拉鲁斯在这方面编写的条目可分两类，一类是晚饭后大家围坐聊天时得来，另一类是通过个人读书或别人单独的讲述所得。前一类在他字典的“故事员”条目下是这样写的：“故事员这一行当，自从有了书店以后，几乎后继无人了，特别在报刊、杂志大量出现以后尤其如此。但在我们这一辈人以前的社会上，却非常盛行并起了重要影响……当今的世界，人们已不讲究谈话的艺术；当代人都以严肃、认真而自诩，但他们却往往令人望而生厌。冬日夜长，乡村里受人欢迎的说书人便在众人的围坐中有声有色地讲起来。而今天，这些人便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中自然地淘汰了。今天，人们可以花一生丁买上一份报纸围炉而读，不去听故事。”

拉鲁斯认为“成年人是大孩子，他们也始终喜欢神话故事，尤其喜欢美妙而离奇的故事。”因之，各式各样的神话故事便摩肩接踵成群结队地向我们开来。拉鲁斯对后来的以小说代替神话深表遗憾。他对查理·佩罗的《鹅妈妈的故事》颇为欣赏，他说：“这个故事将同法兰西语言一样，永远流传下去。”

他在大百科词典里，把《小红帽》的全部故事情节都叙述出来，他说：“《小红帽》同样也是对我们孩子非常有益的故事。当孩子把整个故事讲完时，爸爸也感动了，他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想起了往昔自己的荒唐行为，于是便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说：“我明白了什么是不幸，我懂得了应该拯救那些不幸的人。”^①

这位词典编纂家对自己童年时代看过的皮影戏也非常怀恋，童年时他常去蒙马特大街上的皮影剧院看戏，他甚至在词典里把这个剧院的开演时间都介绍出来。

^① 这是拉丁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19）写的一句诗。——译者

在儿童的王国里，玩具便是国王。“每当你爸爸从集市上回来时，你便跑过去拥抱他，爬到他身上并悄悄地把手伸进他的衣袋，看看里面是否藏着一支棒糖，有没有一支三色芦笛，或者是否藏着一个前鸡胸后驼背的滑稽小丑。这时你便一边吮着棒糖，一边向大家炫耀着芦笛，同时操纵着木偶。这时大人们便任你去玩，并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我相信，世界上作爸爸的没有一个人会象那位可怜的若克里斯那样，他从集市上给儿子带回一面鼓，却对他儿子说：‘喏，好儿子，拿去玩吧，但要注意，可不能把它搞出声音来。’”（《师范学校》杂志第六册）

在大百科词典里，拉鲁斯对“玩耍”和“玩具”含义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他说：“玩耍对孩子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并把“玩具”区分为“室外玩具”和“室内玩具”，室外玩具可使孩子锻炼灵活、机智等应变能力，诸如大小球类和跳绳之类。室内玩具如布娃娃等。他指出，一些布娃娃的价格可以达到2000法郎，这些布娃娃甚至会喊“爸爸”和“妈妈”。他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孩子们对玩具的第一个反应。这些叙述至今仍有意义。利用孩子们对玩具的兴趣，可以使玩具起到有效的教育作用。在孩子们稍具智力，并逐步发展和逐步运用这些智力时，他们对什么都想摸一摸，都要看一看，对什么都想研究，都想学习，都想了解。一切东西对他们都是个谜，他们都要猜一猜，他们对面前所有的东西都要翻过来倒过去地研究一番、端详一番，并且这里摆一摆，那里放一放，总要想尽办法为这些东西找出用处来，于是便把它们当成工具使用，直到搞得七零八碎为止。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要了解是太复杂了，当然更谈不上进行分析，于是在简单的头脑中便产生了无穷的问号：“为什么会这样？”“该怎么办？”等等，因之便没完没了地问个不停。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常常把母亲们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这个时期，任何拿

在他们手中，落在他们眼前的东西都是研究的对象、实践的对象，而且通常是默默地，不自觉地这样去做。但这些在他们的头脑中却留下了烙印，并且是深刻的烙印。

关于“儿童”条目，大百科词典有丰富的论述。拉鲁斯特别阐述了截然相反而又互为补充的两类儿童，即人们称之为“好孩子”和“坏孩子”的这两种类型。“伊索的语言，其真正营养，乃是来自孩子们，不管他们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可爱的还是可厌的，不管他们是天使还是魔鬼。对孩子出现这些评价的原因，出自大人们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孩子。一部分人看到他们富有诗意的一面：金色的卷发，明亮的眼睛，玫瑰色的小嘴常带笑意，说话时既透着聪明、天真，又带点调皮。这是女性和诗人的观点。另一部分人的眼睛，则只盯住他们的冒失、任性、懒惰、贪吃，以及可以加给他们的任何其它缺点。这后一部分人是伦理学家的观点，他们是心情忧郁的人，经常把人看得一无是处。他们常常过于自信，认为自己是超然物外的人，评价着一切的善与恶。这些善与恶，在他们所写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中，其界限又是那么明确，其区分又是那么严格，并给予冷静地分析和严肃地解剖。就象一群伦理的丈量家一样，他们只用冷静的反命题来测量我们的山坡和地面，……正如其中一位伦理学家很坦率地承认的那样，（对于他的这种坦率态度，我们应予赞赏）他说，他们就如一支部队的号兵，只管吹冲锋号，当别人在号声中去冲锋陷阵时，他们也便自认完成了本身的使命。”

成长中的苦读者

在拉鲁斯生前便已出版的他的小传向我们指出：“他是修车匠兼铁匠的儿子，童年时在家乡度过。在一所简陋的小学里完成

了开蒙学业。这个时期的初级教育打开了他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文学生涯。他性格好动，喜欢新奇，思想活跃。不管什么书，只要能搞到手，他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如果流动书贩来到村庄，伙伴们便马上通知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嗜书如命。这时书贩的书箱便被他们翻来复去的挑拣搞个乱七八糟。这个四处找书看的年轻人从此便能经常在衣袋里装着伏尔泰的，迪莱—迪米尼尔的，以及卢梭的和皮高尔特·勒布伦等人的书。这说明了流动书摊上图书种类是很多的。这些无疑是以19世纪中叶为止的法国文学的重要源泉。“流动书商”一词，在《贝特洛大百科全书》上赋予如下定义：“在集市上以廉价出售普通读物的商人。”据1854年估计，这种流动书摊在全法国有7000个，如每个书摊按200本书计，那么，就有140万册书籍在流动，还不算当时的历书、年鉴之类，而这类书在当时竟达到400万册之多。

在历届政府治下，如第一帝国时期，复辟时期，七月王朝时期，以及后来的第二帝国时期，此类书摊文学都受到严格控制。拉鲁斯的词典也受到这种思想方面的审查，但在词典中他却起而反抗，反对以任何形式，诸如以哲学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原因为由，对这些书摊进行查禁。他说：“众所周知，本大百科词典是一切阻碍思想自由和阻碍自由思想的敌人。保护书籍的思想性以使它免遭毒害是一回事，而阻止出自真诚而写出来的作品，并把这些作品看成有政治问题，则是另一回事。政府当局有时把这些读物看得比那些淫秽、荒诞、低级下流的作品更加危险。”他并举了一份1853年的调查材料。该调查说，在路易—菲力普治下，通过3500个个体流动书摊，有900万册书籍在流动。“在这一行业中，有300名左右的个体业主，每个业主有雇员或职员10~12人。这300名个体业主分散在巴黎、鲁昂、里摩日、厄比纳尔和图尔，以出售廉价书籍为生。”

几乎所有的传记都曾提到这个年轻人嗜书成癖的情况。他在16岁之前便已读完伏尔泰、卢梭、阿朗贝尔、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的作品，这几乎是个奇迹。当时《柴纳日报》的总编罗贝特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该文章写于1866年夏季，因为拉鲁斯的父母正在准备几个月后庆祝他们结婚50周年，而他们结婚日期则是1816年11月27日。文章写道：“他的童年是勤奋的，在他15岁时，从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阿朗贝尔、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中吸取来的各种思想便在他头脑中混合起来，并开始发酵。这时他已经模糊地、隐约地看到自己将来的工作轮廓，而这一工作是需要渊博学识的。……他在苦读中似乎听到了晨曦到来时云雀的歌声。于是我们这位未来的大百科词典编纂者不得不熄灭了他案头的灯光。”

在1875年拉鲁斯逝世时写的一篇传略中，非常明白地描述了他看到流动书摊到来时的情景：“这位年轻的爱书人，只有当他所有的衣袋里都塞满了各类大杂烩的书籍时，他才抽身离开。”这里用“大杂烩”来形容当时书摊上书籍五花八门，是再准确不过了。1876年的《柴纳年鉴》说得好：“在16岁之前，他已从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阿朗贝尔、孟德斯鸠等人的作品中吸收了营养。”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拉鲁斯的爱读书，在当时的人中是十分闻名的。这事他童年时的伙伴不但可以证明，并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况。大百科词典的增订本初版时，补充了他买书的情况，为了买书，他把自己积蓄的零钱全部用上了，该词典说：“读书是他唯一的爱好。”他对事物普遍的好奇心，他的求知欲，他的刻苦用功，便决定了他将有个不寻常的前途，尽管当时他本人尚无一个明确的想法。

拿破仑气氛

土西城如同法兰西大部分其它村镇一样，拿破仑发动的连年战争，给它们带来的结果是苦难和鲜血。然而在这场战争频仍的灾难之后生下来的孩子们，却是在对拿破仑的个人崇拜中长大的。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我们这位未来的拿破仑三世的对头，拉鲁斯也不例外。他的童年是在雄鹰和战旗的阴影下度过的，在向我们讲述“沙文主义”一词时，他道出了其中的隐密：

“不要开玩笑吧。我们这些人是在玩着木头做的战刀，白铁皮做的步枪，对战鼓声特别敏感的环境下长大的。每当在一个庄严的场合下，那个‘粗暴的人’来干预我们的事务时，在我们身上便总能找到沙文主义的老的温床。对这个沙文主义，我们总是以极其强烈的人类普遍和平的思想来嗤笑它，但我们却没能很严肃地想一想如何减少这个主义的影响。而所谓民族的光荣和战争的光荣等偏见，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的弱点之一。这些弱点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其由来之古老，其劣根之顽固，足以和不开化的野蛮时期的人类相提并论。对这些东西，首先是那些战胜者们，其次便是沙文本人，却称之为光荣的传统……应该看到，沙文主义和波拿巴主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并肩战斗着，并在复辟的大旗掩护下跑遍了法兰西。这两个词甚至从韵脚上看都那么和谐^①……此外，尽管拿破仑离开我们已很久远，他早已死去，但仍然有那么多的文章和颂歌在赞扬他的业绩，因此他的形象今天仍在人们的头脑中扩大着。这一伟大形象使历史上所有的英雄黯然失色，使所有的浪漫传奇故事顿失光彩。它还开辟了一个新的

^① 法文chauvinisme和bonapartisme两词韵脚相同。——译者

领域，即所有的戏剧都以前所未有的竞争性在编年史的舞台上竞相表现这一形象。所有已成年的后代人都知道拿破仑的名字，所有的年轻人都被它的传奇故事所感染。在这些传奇中出现的是威名显赫的武功，结果每个人便都带着羡慕的心情去倾听这支伟大军队的业绩和功勋。一颗颗由于政治压迫变得狂热的心，带着激情拜倒在这些曾经打遍欧洲的士兵、军官和将军们的脚下。”

通过这一被检查和删改的节录，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前一个世纪的民情风俗，大百科词典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资料来源。它本身就是见证，是一位深思熟虑的见证人的力作。拉鲁斯生于滑铁卢战役后两年。1821年5月5日拿破仑在遥远的海岛上去世时，他刚刚4岁。那时，有关这位伟人逝去的传奇正在形成，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略知世事。这个时期，所有的作家，所有的人，都包围在这一气氛之中。

我们这位未来的词典编纂家就是在这种气氛中长大的。如果说他后来竟声明对这位皇帝及其家族持仇恨态度，那是因为爱的失望和转变的缘故。他年轻时，对波拿巴确实实有着名符其实的个人崇拜。在大词典中，他用了大量篇幅加以叙述，他是这样开始的：“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最响亮的名字，毫无疑问，应该是拿破仑。”他的笔下所表现的敬意，同他的思想一样，是绝对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牢固的根须深深地扎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心中，以致到了成年时期仍然未能全部拔除。

第二章

从小学教员到大学生

(1834~1852)

拉鲁斯在土西的小学教员生活结束了。但直到法国教育史上
一件大事发生之前，他一直留在土西。这件大事便是1833年6月
28日“基佐法”的颁布^①，随后于同年7月26日又明令补充。这部
法令规定，每个区至少必须有一个小学，并规定小学教师需持有
证明其能适合教学工作的合格证书。这一法令还扩大了小学的教学
内容。当时小学教学依据1808年3月17日的法律规定，只教小
学生“识字、写字和算术”，现法令“规定了在小学中强制进行
思想教育、宗教教育，开设阅读课、书法课、法语语言分析课、算
术课和法定度量衡制度。此外还制定了新办法，即在初级小学之
上，增设高级小学，教学内容为：几何分析、线条画、测量
法、物理基本概念、歌唱、实用自然、初级史地、尤其是法国历
史及地理等课程。”因此，法国1830年原有27365所小学，到
1840年便发展到39640所。拉鲁斯对基佐没有好感，但在这一点

^① 弗郎索瓦·基佐(1787~187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这里指的是1832~1837
年他在公共教育大臣任期内颁发的主张初级教育教学自由的法令。1847~1848年任法
国政府首脑，这时他执行的是保守政治，从而引起了1848年的法国革命。——译者

上却向他表示敬意：“他把自己的名字同组织法国的小学教育联系起来，从而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作为一个坚决的反民主人物，在他身上表现出一种不统一性，即他后来的荣升和他这些进步措施构成了这种不统一。这正是真理不可战胜的伟力所在。”（见大词典“基佐”条）

在当时，年轻的拉鲁斯并不见得怎么关心这项法令。其时他正在爱德姆·普莱任教的学校里学习。爱德姆并非一个超人，但正如上个世纪许多这样的教师一样，他是一位认真、勤奋、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他向学生传授了漂亮的书法和正确的拼写规则。

他非常喜欢小拉鲁斯，向他提供学费并教给他一些附加课程，并介绍他报考凡尔赛的初级师范学校。1834年拉鲁斯以优异成绩被录取。由于奥塞尔没有师范学校，每年荣纳省都准许四名优秀生公费进入这个学校。拉鲁斯便取得了享受这一公费的资格，从此他便走上了真正的就学之路。

在 凡 尔 赛

依靠宫廷资助的凡尔赛师范学校于1834年秋接受了拉鲁斯入学，不久他便满了17周岁。他虽然读过许多书，但却没有系统，距科班要求的知识所知尚少。入学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考试结果，他在四名學生中名列第一。

他准备了一套全新的行里走进校门，从此便成了一名“学生—教师”的公费生。他“阔”起来了：一件蓝呢礼服，一条黑呢长裤，一顶黑丝圆帽，两顶棉便帽，三件印有棕榈树叶并钉有带校徽的纽扣的罩衫，均按军服样式做成，外加一顶军帽，一条漆皮腰带。学校的规章似乎相当严格，要永远保持肃静，严守纪律，还有各种其它严格的限制。“一旦入了学，‘学生—教师’便将

接受下列教育：必修教材包括道德和宗教教育、阅读、书法、法语、数学、法定度量衡制度以及宗教歌曲等；选修科目有：实用数学、史地基础、物理概论、实用自然、历史概论、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和卫生保健、测量学、水准测量和几何制图及体操等。主要课程通常由校长亲自担任，其余课程和监督工作最多由两名教师担任，但不包括指导神甫。一般情况下严格控制借聘外校教师，但在特殊情况下，比如教唱歌曲，可以例外。”（大百科词典“初级师范”条目）

我们这位师范学校的公费毕业生与母校的老师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和加利安先生，他是拉鲁斯后来办的教学杂志的合作者，并由拉鲁斯—布瓦耶书店出版了他许多有关教学的著述。下面便是拉鲁斯在报纸上登的公告，该公告要求其同事们为他寄送听写材料。他用词总是那么欢快和欠斟酌：“我们曾向朋友们发出过一个号召，作为对这一号召的回答，凡尔赛师范学校的前语法教师加利安先生为我们寄来大量材料。如果说依波克拉特是医学教科书之父，埃罗多特是历史学教科书之父的话，那么，加利安先生便是听写教材之父。你给他一个不管什么样的主题，比如说一条无名的河流，一个针尖，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他能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给你写出一篇带有分词句、未完成过去时，同时有tout和tous和结合着quand和quant的听写文章^①。”

拉鲁斯对其他老师、主考教员和考试委员也同样有良好的印象。因为1837年4月17日，他和另外13位同时考试的同学分别获得基础教学合格证书和二级教学合格证书，1838年又分别获得一级教学和高级小学教学合格证书。这种高级小学教学合格证在当时还不象现在发得那么滥。1837年仅颁发了194张。当时他在凡

^① 这种句式和时态听写时容易搞错，tout和tous，quand和quant在法语中发音也大致相同，也易弄混。——译者

尔赛师范学校只是个辅导教师，他当时就对这种全面的文化教育非常感兴趣。当时他可以说正是一个含苞待放的花蕾，因为他离开凡尔赛师范学校时还不到21岁。他的当铁匠的父亲和开小客栈的母亲应该为他们儿子的荣归感到骄傲。他的姐姐也应同样高兴。

在土西任小学教员

回土西后，拉鲁斯没回他的母校圣·路易广场小学任教。1832年5月22日镇议会决定把老教师爱德姆·普莱的300法郎补助津贴取消，理由是“鉴于他在晚上和课外时间给许多学生上了数量相当多的辅助课，已为其生活提供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收益。”这事足以证明镇政府对如何提高教育质量是何等无知。事实也是这样，在1830年土西全区报名入学的新生中，几乎有一半人能读会写，而在1790年，甚至在十个新生中有九个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新人和有比较坚实基础的教师。爱德姆·普莱在此任教24年，却没有获得高级小学任教合格证书。1833年3月28日镇议会选任巴泰勒米·蒂博为该校教员，他是凡尔赛师范学校学生，高级小学任教合格证持有者。

现在人们经常传说，拉鲁斯原先曾是“由公共教育大臣基佐筹建的”那个高级小学的尖子。另外一些人则说，那是指的另外一所职业学校。甚至颇加美化地说：“基佐本人，由于他发现了拉鲁斯的出色才能，便亲自到土西来建立了这所学校，并让他担任了法兰西专门职业学校中最年轻的校长……”。不幸的是，这一切均属子虚乌有。土西的高级小学经由当时的镇长保罗·戴弗朗士提议，创建于1894年，于10月14日开学，拉鲁斯的半身像也同时落成。公共教育部长莱格参加了仪式。拉鲁斯只当过一所初

级小学的校长，并且只有一个班，就是巴泰勒米任教的那所学校。

在“基佐法”投票生效以前，大多数教员在教学法上都各行其是，其方法大都为把学生一个个地叫起来念单词或作算术。但自“基佐法”颁布以后，这种教学法便被摒弃了。荣纳省省长邦迪公爵曾提醒大家说：“各位市长，各位市、镇议员及各地方议会，我谨提醒各位，从前各行其是的教学法应予废除。所有小学教师如果不立即采用集体式教学法，将取消其教学资格。”

从此以后，他在他的近百名学生中忙得团团转。在夏季农忙时，学生人数可以降到60名左右。他一方面要实践复杂的集体教授法，还要严格按照学生到校天数计算学校开支。学生分成四部分，由教师训练出来的几个辅导员帮助辅导，但他们的津贴是菲薄的。作为这个学校的元老，拉鲁斯可以领到一部分额外补贴。

除了大量时间用于备课和批改数量很多的作业之外，他在课前还要把粉笔分成百来块小段，还要剪出百来支鹅毛笔管，还要自制墨水以便晚上学生来自修时分成小瓶出售，还要给每个书桌挂上不同的字贴，还要在墙上贴硬纸卡，把当天的作业用粗体字写在上面，还要单独为辅导员解释问题……当时他正在实践集体教授法和相互式教授法。

这位凡尔赛的老师范生曾渴望进行一些新教学法试验，但他受到的是地方当局所给予的经常性的监视和被迫执行一些强制的硬性规定。他必须一个月向地方当局呈送一份报告，内容包括学生情况和教学形势。同时，当局对他工作的检查也越来越频繁了。他只能在法定课程之外进行语法和几何的补充教学，甚至连地理和历史也不得不这样做。他经常为书籍不足和教学方法的单调而苦恼。在那个环境里，死记硬背代替了理解，机械的重复代替了学生的创造性和判断力。这位带着满腔热情和百倍信心来自几

尔赛的青年教师对这样的学校无论如何也不会满意的。省里的学监由地方要员陪同曾数次前来视察。在学监的报告中（这些向上级的报告总是以地方当局的意见为主）对拉鲁斯这样评价：“能力强，品德好，相当勤奋，在镇上也有相当威望，与镇政当局保持着较良好的关系，但与神甫的关系却相当糟糕……。”当时的小学教员颇有点象神甫的助手，特别是他们都得兼任唱经班的成员，这很不合拉鲁斯的胃口。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的教学工作这唱经班有什么联系，可能自那时起，他便对宗教课不那么热心了。

拉鲁斯的内心是难过的，他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东西不懂，而又并非完全无知。他觉得当时学校的书本上讲的尽些蠢话和毫无意思的内容，他难以忍受这种不能按自己意愿教学的局面，而对于自己既无办法又无自由扭转这种局面，感到痛苦万分。他在那种被怀疑和被监视的气氛中感到窒息。因此，首都对他的吸引力就越来越大了。在首都，他可以进一步深造，并能施展自己的教学才能。但，有把握吗？他能把自己的新教学法引进一个更宽广、更普及的范围里去吗？两年以后，他决定离开此地的教育界。这一决定的起因自然是积各式各样的向往和失望的结果。这里面既有他的雄心壮志、渴望接触更广阔的天地、对新鲜事物的渴求，同时也含有对现实的失望、缺乏自由和对这个变幻无常的时代渴求了解等因素。此外，需说明的是，拉鲁斯是以私人身份当的小学教员，并未在教育部注册。

在这两年的教学中，拉鲁斯经济上并不宽裕。镇政府每年拨给他400法郎经费，但只学校租金一项，每年就要用去300法郎。如果每个学生家长都能按时交纳学费的话，他每年可以收入1500法郎。这绝非一个充足的数目。更何况，还要生活，还有各项其它开支。在土西的生活结束了，一个22岁的年轻人，怀着雄心壮

志和献身精神来到另一个新世界——首都巴黎。

在 驿 车 上

1840年夏末的一天，拉鲁斯乘上驿车奔往巴黎。从奥赛尔到巴黎，要在这种颠簸的驿车上坐两天一夜。

拉鲁斯后来一直保留着对这种驿车的回忆，并认为它优于铁路：“姑且不论坐火车经常发生事故，单就其枯燥乏味来说，也够使人难耐了。首先，它笔直地向前行驶。据卢梭的观点，这就大煞了旅行所特有的诗意；其次，当你欣赏车外迷人的风光时，那些景物就在你眼前，但你却象坦塔罗斯一样，金苹果就在你眼前，但却可望而不可及^①；第三，车开得飞快，不给你从容谈心的机会。再说，一旦进入车厢，每个人便忙着抢座位，几乎旁若无人，一旦坐下还要带着一副嘲笑的面孔，为自己躯体灵活、身大力强能够捷足先登而自鸣得意。

“关于这种古老而美妙，陈旧而庄严的驿车，在我们年轻时，它缓慢地、笨拙地、沉重地、乏味地载着我们从省会来到首都巴黎。”

路易—菲力普时代的巴黎

拉鲁斯来到巴黎，这位年轻的乡下人发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巴黎呢？

当时一些描写巴黎的书籍都带有大量溢美之词：“巴黎，她

^① 坦塔罗斯，希腊神话中宙斯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缚永世站在有果树的水中，水深及下巴，渴了想喝水时，水就退去，饿了想吃果子时，树即升高。

伟大、漂亮而豪华，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其市容之美，居欧洲之冠，其人口之多居欧洲第二；其市区之广居欧洲第四。法兰西是世界上人口最集中的国家，而巴黎又是它的完美无暇的首都，是情侣们幽会之所，道地的法国沙笼比比皆是。与欧洲的其它首都相比，巴黎是佼佼者，其优越性随处可见。在外国人的心目中，没有哪一个城市可与巴黎相提并论，也没有第二个城市可以被他们轻易地承认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因此，没有到过巴黎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游遍世界各地，却不能被称为旅行家。但巴黎也并非尽如人们所说的那么美。就风景的幽美和气候的宜人来说，她不及那不勒斯，也不如罗马或康斯坦丁诺普耳^①。但在巴黎，外国人可以看到整个法国，它的居民最合群、最慷慨、最聪明。他们把它国人民当作兄弟。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就与它国人民是紧密相联的。他们总是那么殷勤好客。伦敦也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但她自私而傲慢，只不过是一个工业重镇而已。至于巴黎，她是光明的起源，欧洲的心脏。一句话，是文明的象征。她以新奇的娱乐活动和赏心悦目的装饰来吸引游人。大多数人都心旷神怡地从这里满意而归。而离开她，又很少有人不觉得遗憾。”（以上见《全法市镇地理词典》）

拉鲁斯也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之一。在一篇题为《现代文明中巴黎之作用》一文中，拉鲁斯对这座“高贵的城市”发挥道：“人们把她称为法兰西的心脏和神经，甚至还把她誉为‘欧洲的首都’，‘世界的中心’，‘现代文明的首府’，所有这些美称绝非过份……的确，没有一座现代城市，也没有一座历史名城能与她比美。她是当今世界上完美无缺的首都，是世界上人文荟萃之地，凡是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以她为第二故乡，离开她

^① 即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译者

都会感到遗憾，各种思想都汇集于此，她是世界进步的先导，自由的前哨。”

拉鲁斯所踏上，就是这样一座罩着耀眼光环的巴黎。但那时的巴黎，无论就其版图还是从五光十色的闹市区来说，也无论就其阶层的划分和总的气氛来说，与今日巴黎相比，都大为逊色。

“图书馆馆员”

《荣纳日报》在总编辑M·罗贝主持下，于1866年用整整一个夏季的时间发表了一份拉鲁斯传略连载，该传记说：“巴黎对他想要渴求了解的各种思想所施予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使他炽热的想象力受到极大的震慑。他24岁只身来到巴黎，身上只带了几张1000法郎的钞票。自那时起，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气象学校的各种课程，以及巴黎历史博物馆和巴黎国立工艺博物馆的各类材料都成了他勤奋学习的教材。他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能搜集到的资料。这位虔诚的求知者这时已成了尼札尔、圣一马克—吉拉尔丹、米什莱、基内、阿拉果、弗鲁朗等人的信徒，每天晚上都在圣—热内维埃夫图书馆整理他一天中匆忙搜集到的成果，并把这些“强化营养品”艰难地吸收、消化。因此，同住一个旅馆的伙伴们便戏称他为圣—热内维埃夫图书馆馆员。

在这里他没有外界的资金，生活费全靠自己筹措。他孤身一人投入这个世态炎凉的人海之中，在首都千家万户的一条大街上孑然独处于一幢六楼顶层的屋顶室里，过着鲁滨逊似的孤岛生活，他的日子是艰苦而困难的。这位未来百科大词典的编纂者来到巴黎的全部财富便是几张1000法郎的钞票。这点微薄的生活费用除了支撑他在巴黎十年的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开支外，还要

提供他为编写大词典搜集资料的费用，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这种苦行僧式的清苦生活，与普路塔克的译者阿米约^①十分相象。大家知道，阿米约的老母每周都托塞纳河上的船夫为儿子带一些大面包作为一周的口粮。这种大而笨重的面包如今在乡下仍能看到。而我们这位编纂家顶楼的小屋里，就放着一罐子熬过的黄油，正是这位年轻的勃艮第人的老母千里迢迢为儿子带来的。

“人们很难想象，在繁华的巴黎，只用一罐黄油、1/4公斤洋葱、两公斤面包，再加以大量被人们称为‘意志的源泉’的辣椒为‘佐料’，便是未来词典编纂家的日常食谱。在这个斯巴达式^②的食谱里，再加入勇气和耐力竟使这位健壮的年轻人的肚皮创造了罕见的节约奇迹。每到深夜寂静旅馆的客人们进入金色的梦乡时，这位年轻人便开始行动了，因为只有在这时候，散发出来的香气才拨动不了沉睡者的嗅觉神经。因为洋葱，特别是在它煎炒时总有一股强烈的味道，但又不能对它们说：‘喂，你不要跑得太远！’这时如果有一位探险家或是一位梦游者通过第四十五号房间的锁孔向里窥探的话，他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景象：这位勃艮第人已变成了厨房里的炼金术士，只见他悄无声息地打开一个四面宽宽的大箱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四周瞧瞧，便从中取出炉筒、煤、风箱、还有那个装黄油的罐子，于是屋里便出现了各种足够他享用的丰盛晚餐，他把食品（一块两公斤重的面包）庄重地摆在雅各布和他12个儿子的餐桌上^③。这是在远处的一个面包店里偷偷买来的，每两天买一次，用大衣包着拿上楼来。通过这个锁

① 雅克·阿米约，法国人文学家（1513～1593），在查理四世和亨利三世时作过大指导神甫，后来任奥赛尔的主教。他以翻译古希腊传记家普路塔克的《列传》而闻名。该《列传》把古希腊、罗马的名人并列，对比并加以评论。——译者

② 斯巴达人以刻苦著称。——译者

③ 雅各布，希伯来的多子老人，有12个儿子，他们便是后来以色列的12个部族的祖先。——译者

孔，苏格拉底还可能看到其它一些别的食品，为此他曾不止一次地责备过安底斯泰纳^①。但有一天晚上，这一套秘密家具几乎在一瞬间就全部失去作用。那时这位年轻的勃艮第人正挟着面包悄悄地登上他自己的第六层阁楼，看门人的住房里似乎很嘈杂，好象这所公寓里所有不务正业的人都聚集在里面。他和他的两公斤面包很顺利地通过了第三层楼，突然，挟在腋下的面包滑了下来，不幸的是它还滚得很远，并且颇具威胁性地碰到了凶狠的看门人住的房门。对这块不听话的面包，我们的主人匆忙地想阻止它逃跑，但命运之神却偏偏要前来干涉，以致它竟滚到那位具有古希腊斗士之勇的看门人的屋里。于是我们的勃艮第人便顾不得面包，飞快地跑回自己的小阁楼里去。这天晚上火炉没被启用，因为不需做洋葱汤了，我们的炼金士也因为没有面包，没有汤喝而提前睡了两个小时。第二天早上，他便看见那个犯了罪的面包骄傲地摆在看门人的窗上，上面贴有一张字条，一位爱开玩笑的大学生在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无主面包”。从那以后，我们这位可怜的勃艮第人在这块面包挑战的目光震慑之下竟达数日之久，尽管它已经长了毛，却依然向它的主人做着神秘的鬼脸。这一事件使他白白地丢了60个生丁，但却拯救了面子。这种令人遗憾的清苦生活整整过了八年。那几张1000元的钞票也在别人的手中被派了用场。但他的头脑却武装起来了，卡片上记满笔记，而大百科词典的曙光已在地平线上升起。”

几乎完全可以肯定，上面这段文字相当大一部分出自拉鲁斯自己之手。文中表现了他的写作特点，比如：博学多识，善用典故，热情欢快，模仿欧仁尼·絮或蓬松·杜泰拉依等的连载小说

^① 安底斯泰纳，希腊哲学家（前445～365），他是苏格拉底的门徒，犬儒学派的创始人。他蔑视财富、华丽和享乐。为此曾受到苏格拉底的责备。这里指的是拉鲁斯餐桌上都是很简单的食品。——译者

诙谐、轻松而活泼的笔调。再说，也只有他自己才是唯一能提供如此详尽细节的人，如第四十五号房门，逃跑的面包等，此外，除了两公斤面包在当时的准确价格之外，这篇文章还告诉我们，作者当时住处是在拉丁区的一家专为大学生开设的旅馆里，并住在六层楼的屋顶室内；在这里寄宿的人不得在自己房间做饭，并生动地描绘了这位年轻的勃艮第人不得不诸般节省的窘象。

他这一时期的整个生活，正如他的伙伴们戏谑地称他为“图书馆馆员”一样，经常出入于图书馆，而且是所有的图书馆都去。我们可以在他的大词典中对这一词的长长的释文中得到佐证。首先是国家图书馆，它的名字先后是“‘国王图书馆’、‘王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帝国图书馆’……我们还应该更正确地呼之为‘法兰西图书馆’，其中藏有大量图书及各类资料。”

此外还有“兵器图书馆”，“马札里纳图书馆”，“法兰西科学院图书馆”，“巴黎大学图书馆”以及“市立图书馆”等。他对这些图书馆的特点都了如指掌，如兵器图书馆取书特别迅速；马札里纳图书馆安静舒适，而在法兰西科学院图书馆则可以结识那里的许多院士等等。

永不毕业的大学生

拉鲁斯和蒲鲁东一样，路易一菲力普时代的巴黎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学习和进图书馆。蒲鲁东比拉鲁斯大八岁，于1838年11月初到达巴黎。但和后来成为他的门徒的拉鲁斯不同的是，他甚至连保证自己安心学习的经济条件都没有，他懂得什么是困苦。在1840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我已经不名一文，失去了勇气，并被生活击倒。去年一年都在穷愁中度过。我成了穷人，全部收支情况是，从去年4月1日起，我只剩下200法郎，

但它们要支持我在巴黎六个月的用度。”于是他只好以卖文为生。1840年6月出版了他的巨型回忆录《什么是财产》，在第一页上便写着这样的名句：“财产就是偷窃”。而拉鲁斯此时还在批改着他的学生的作业。1863年他已批改了20年的作文。

在搞研究和在大学听课这一时期，他埋头于拉丁区。这个区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大不一样。

在当时那种五花八门、旋律紧张、生活放荡的环境中，拉鲁斯与其说是其中的一员，不如说是一位观察者。他象巴尔扎克一样，眼看着这一切并把它们记在心中，写在本子上，然后加以汇总，为将来的巨著做准备。他当时主要任务是学习，并为从事写作做准备。在那时的20年之前，巴尔扎克听过维尔曼的课、基佐的课和库辛的课，他还到自然博物馆去听过居维叶和热弗罗依·圣—依莱尔的课。拉鲁斯也步这位前人的后尘，“为使自己成为现代生理学某些方面的内行，并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起步晚但却成就大的学生”而贪婪地吸收着同代人的知识。

他的学习方式特别。这种方式今天已不复存在了，至少在巴黎大学是如此。即白天去巴黎大学或其它学府去听由法兰西学院的大师们上的公开课。这些学府建立于复辟王朝时期，到路易—菲力普时代仍然具有很高的威望。

现在的巴黎大学创建于1893年，是唯一保留着小教堂的大学。黎赛留的小教堂在1791年就变成了60多户人家的避难所，院子里杂草丛生。有一天夜里，教堂的屋顶竟坍了下来。1801年，以美术展览馆的名义，由一大批画家和雕塑家对巴黎大学实行了殖民占领，费用由国家提供。1821年又改为教学之地。次年，由第一任校长尼科尔主教增建了一个阶梯教室。泰那尔、盖·拉萨克、基佐、维尔曼、库辛等都在这里讲过课。拉鲁斯就是这些公开课的听众之一。

他几乎在巴黎所有的大学里都听过课。他称法兰西学院“是人间知识的殿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学府能望其项背”。他在职业技术学院上过技术课；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听过许多名家的讲课，他还经常到自然博物馆等处去听过讲座。

大家对拉鲁斯这种巨大的求知欲都钦佩不已。他对一切事物都感兴趣，对一切知识都如饥似渴地吸收。他学习的内容广泛，师承众多，他向埃戈尔学希腊文；从夏庞蒂埃和帕坦学拉丁文；夏斯勒、米基维茨、奥札纳姆给他讲过外国文学；尼札尔、圣—马克·吉拉尔丹、基内等人教过他法文；米什莱给他上过历史课，而巴比内以及仲马^①等人给他讲过自然科学；语言学和梵文是比尔努夫教的。此外他还深入学习了地理和哲学，汉学家朱利安教过他中文，可以说他头脑中装遍了百家学问而且胃口大得惊人，且能奇迹般地兼收并蓄。所有这些学习所得，经过他的消化，分类，登记入卡，然后又查证了大量其它著作；最后写进了他的20700页、四开本^②的巨著——大百科词典。对于一个青年来说，其知识的触角要伸向四面八方，要探求上百门学科而又不能因此而失去自己的个性和自己要研究的专业方向，没有极大的求知欲和雄心壮志是办不到的。

他虽然囊括了各个领域的广博知识，但他除了获得过高级小学教学合格证外，却从未想到要通过大学考试。无疑，他认为在他这种年龄正是有所作为的时候，他也肯定会想到，他所乐于从事的词典编纂工作会使他一无所得。但他却没想到，他这种对毕业文凭的蔑视将会损及他在文学上的声望，因为语言纯洁主义者后来总是这样错误地看待他：说他“浅薄”，无需对其作品认真

① 这个仲马是让·巴蒂斯特·仲马，法国化学家。——译者

② 法国开本与我国不同，4开本相当于我国8开本，8开本相当于我国16开本，对开本为我国4开本，以此类推。本书后面提到的开本都是法国制。——译者

对待，并说，他只不过是一个自修成材的人而已。当然，这后一点是被他们说对了。

思想的演变

从什么时候起，拉鲁斯开始蓄须，我们不得而知，但在1838年初他还没留胡子。他是在拉丁区求学时受到周围气氛的影响，有意模仿那些“青年法兰西”分子才这样做的。在词典中，他说：“青年法兰西是热烈拥护自由思想和拥护在某些方面具有新思想的一伙年轻人……”，“1838年10月27日，那时我们还没留胡须，我们在《快报》上读到一篇专栏文章，这是一篇专门议论胡须的妙文，它吸引了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须也有了新的含义，它原先只是自立和成人的表记，现在却成了共和主义者的象征。龚古尔的表兄维尔多依伯爵是个共和主义者，他就留着胡须。在第二帝国时期，一纸通令下达，禁止教育界人士蓄须，并禁止使用烟斗，因为“那是无政府主义的残余”，但可以留“帝须”^①。

他受同时代大学生的感染所表现的对贝朗热的崇拜，再就是他的思想在一个时期内曾受到天主教社会主义的强烈影响，而这一影响又渊源于米什莱和基内，随后便是蒲鲁东。

贝朗热把我们引入拿破仑的神话世界。“在路易一菲力普时期，对那支‘伟大的军队’英勇壮举的回忆以及对国民自卫军所给予的重视，反映在戏剧舞台上，便是又重新出现了军事题材。这正是老兵沙文诞生的时期，由于对他的爱国主义感情的偏爱，于是便出现了‘沙文主义’一词。当时的笑剧《三色国旗》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新型的沙文，于是这出戏便成了当时喜剧的明

^① 帝须是下唇下面留的小髭胡须。——译者

珠。”

皮埃尔·让·贝朗热（1780～1857）在拉鲁斯的词典中占据了异乎寻常的篇幅，甚至还为他的父亲立了相当长的传记，又拿出好几页的篇幅来介绍他歌词的写作过程。当然，文章对其政治上的错误和他对拿破仑的迷信使用了保留的语言。但拉鲁斯仍然认为贝朗热是争取自由和伟大的18世纪思想界的泰斗。

拉鲁斯对于共和理论的观点，可以说在某些时期内涂上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色彩。这在他的词典里对《车间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车间报》是一份月报，出版于1840年，是巴黎工人为研究经济问题和传播民主思想而办。”这份报纸由比什赞助，工人们自己编辑。拉鲁斯对它有明显的好感，是它的一位认真的读者。在介绍这份报纸时，他提到的那种幻想很可能他自己也有份：“在这一群杰出而能干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人是他（比什）虔诚的信徒。在报纸发行的十年中，他们始终不懈地宣传他的学说，支持他为调和天主教和大革命之间的矛盾所做的工作。在今天能有几个人还有这种高尚而天真的幻想呢？当年这份报纸的一位老编辑曾给我们写过一封信，他写道：‘经验是已经有了，如果《车间报》今天仍然在世的话，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也正象1848年以前人们所说的那样，它将把‘天主教的孩子’放在一边不管而不再离开‘伏尔泰的孩子’。现在仍然在世的当事人目前所进行的努力就是我这种看法的证据。’”拉鲁斯本人当年曾经常和这家报纸的编辑接触，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把他看作《车间报》今天还在世的当事人之一。

拉鲁斯一直把比什（1796～1865）当作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尤其在两方面对他有着深刻印象：“无比的智慧、创造能力和思想品德上的巨大能量……我们对于一位有着这种品质的人深表敬意，但毫无疑问，他的哲学思想是我们远远不能企及的，但幸运

的是，由于他高尚的品德，使他这种思想将永远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民主思想的荣誉。”比什曾创立过“人民之友”社团，该社团在七月王朝时勉力维持下来，他的学生昂蒂姆·科尔崩（1808～1891）使《车间报》大大活跃起来。他一生中所专心致力的事，乃是“使人具有人的应有价值，努力发展有个性的人的活力和生命，而这一切在他看来，正是人类全部发明创造和全部社会习惯如纪律、宗教、道德等所竭力要取消和扼杀的。”科尔崩原是一位老工人，1848年当议员，但他却是拉鲁斯名符其实的思想上的老师之一。

那份昙花一现的《前景报》（1830～1831）也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这份报纸，大百科词典也花了很大篇幅给予介绍，其中重要人物有弗雷德里克·莫兰（1823～1874），他是教授和共和主义者；蒙塔朗贝尔，拉科尔戴尔，特别是拉芒奈，他是“法国和当时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曾对拉鲁斯产生过真正的吸引力。在大百科词典中，对这位民主的圣徒和前途的使者的一生描写详尽、细致，对他的作品也给予极高的赞扬。就是在1856年出版的小词典（即《最新法语词典》）中，对拉芒奈的介绍也占了五行之多，这在该词典中是少见的：“拉芒奈，19世纪最著名的散文作家之一，开始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最终成为一个革命的民主斗士（1782～1854）”。

与拉芒奈有着同样的浪漫气质但思想渊源却不同的米什莱、基内和米基维茨，特别是前两人，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对拉鲁斯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历史把他们三人的名字联在一起。因为在七月王朝末期，他们的课程遭到禁止，这就更促进了年轻大学生们的觉醒，于是在1848年2月3日便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参加的学生有3000余人，当时各大报纸的舆论都有利于被驱逐的教授。以后不久，又有2000多名大学生冲进了波旁宫，要求对

教育大臣起诉。“此事发生在同年2月20日，而24日法国便实现了共和。”拉鲁斯肯定是这些游行中的一员，他对这些游行叙述得十分详尽。

米什莱对学生的演说始终回荡在这个年轻的土西人心中：“年轻人，我向你们致意！创造未来的责任又落在你们肩上了，世界需要你们。你们没有后顾之忧，你们有健康的体魄，有充足的时间，有思想的自由……思想自由，对能理解它的人来说，这是个伟大的字眼。我们应该有支配时间的自由、思考的自由、幻想的自由、工作的自由以及足够的休息时间。我们还应该有选择道路的自由，探讨真理的自由，学术研究和了解人的自由！……你们是社会最需要的人才，你们年轻力壮，有发展前途，不犹豫多疑，无个人牵挂，你们是自由的天然而勇敢的传播者。”米什莱主要的论点是：到人民中去，使学者和人民结为一体；“我们应该明白，没有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这是他这次讲演的全部思想核心。

拉鲁斯的许多思想是来自米什莱和基内。如果说，他对自由、民主和法国大革命、对18世纪（他经常借用米什莱的说法，把18世纪称为伟大的世纪）有着深厚的感情，还有他对人类进步的重视甚于对商品发展的重视，对于曾经抚育过他的人民从未背叛过，对于以往的叛乱寄予极大的同情，对于法国的未来充满信心，那么，这一切都部分地来自这两位大师的影响。至于蒲鲁东，他主要吸取了他的对社会的信念，特别是他对正义和联合的热爱以及对工人状况的关怀。拉鲁斯开始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徒，随后便逐步地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从米什莱和基内的课程中吸取了战斗的反教权主义思想，吸取了对耶稣会内心的憎恨感情，这种感情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可理解的。1840～1848这几年对了解拉鲁斯未来的立场是关键的时刻。1848年、1851年和

第二帝国时期发生的事件只不过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些信念罢了。

1848年的革命

1848年的严重动乱，其先导是在动乱之前发生的一连串丑闻和时局的动荡。1843年，一件诉讼案把内阁里贪污腐败的情况暴露于众。公共工程大臣让一巴蒂斯特·泰斯特把特许开采古特南地区盐矿的经费，94000法郎的一笔大款子装入私囊；与此同时，吉拉尔丹又透露，贵族院的一个席位被人用钱买了去；而政府当局又侵犯了戏剧特权，普拉斯兰公爵杀死了他的夫人；法国驻那不勒斯大使自杀身死；“一些目无王法的人对粮食囤积居奇以从中谋利，而当权者又滥杀那些终日食不果腹的不幸者”。因此，自1847年7月9日始，便发生了著名的“改革宴会主义”者的动乱事件。不久这一动乱便席卷了七月王朝。开始，有1200人于7月9日首先参加了巴黎地区的“红色城堡”组织，接着外地各省市也都起而仿效。力尽计穷的政府当局遂禁止了巴黎第12区的宴会，就在这一天，革命便爆发了。2月24日，临时政府前往市政厅开会，在奥赛伊码头的军营前被迫停了下来。龙骑兵们向拉马丁献上一杯水酒，拉马丁举起酒杯说：“朋友们，这就是宴会！”拉鲁斯的大百科全书是对这次革命抱有巨大希望也抱有更大失望的一本历史教科书。……

1849年法国有两件大事，一是霍乱流行，一是世界和平大会召开。在巴黎，霍乱流行了八个月，自3月份到10月份，死于霍乱者有16165人。拉鲁斯在一本书中谈到当时情况时，讲述了一位灵柩车夫的事：“他每天早晨准时到殡仪馆，就象一个办事员每天去办公室一样，然后他便机械地登上驾驭座，此人没有一点

生人的活气，就象一个穿黑衣的活动木偶，帽子上戴着黑纱，手里拿着鞭子。对周围痛苦的人群无动于衷，似乎置身事外……他并没有政治见解。革命发生了，街上到处是障碍、到处是枪声。但他照样坐在车子上运送死去的御前卫士、国民自卫队队员和普通市民。他并不想让他马走得更快些，也不打算往它身上打一鞭子，可霍乱却并不认为他有什么冷漠的感情。他对运送的死人看也不看一眼，只计算着走过的路程，如果能因工作辛苦而得到点额外的报酬，那便是他最大的快乐。他等待着更大的瘟疫流行。”

1849年8月22日，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圣—赛西尔大厅里坐满了人民代表，大会由维克多·雨果主持。拉鲁斯对这次大会的领导人作了详尽的描写：法国方面的大会副主席是德盖里教士，他是马德莱娜修道院的神甫，另一位副主席是阿达纳斯，新教牧师，人民代表。维克多·雨果致了长篇开幕词。诗人预言，欧洲将出现各国联盟，将用市场代替战场，将实行全民普选。他还指出，大炮将被送往博物馆，“就象今天把从前的残酷刑具放在博物馆里向人民展出一样。”他说，这样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临，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一年的成就有时抵得上过去一个世纪。”在作这些回忆时，拉鲁斯激动异常，自那时起，他澎湃的心潮已涌向克里米亚、涌向墨西哥、涌向世界各地。

“1848年12月10日，一位威信扫地的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被任命为共和国总统，并忙于总统宣誓。但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便明目张胆地背叛了自己的誓言。1849年1月29日，几个秘密社团策划了一次暴乱，但由于尚加尼埃将军预先采取了防范措施而流产……1850年以及整个1851年的前11个月，社会安定，但却被‘十二月分子’^①给搅乱了。由波拿巴雇用的流氓团伙组织了多次曾

① 指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的参加者和拥护者。——译者

在恢复帝制的游行……这一对立的斗争（一方是大多数君主政体的拥护者，一方是国家元首）以1851年12月2日的阴谋得逞而告终；以驱走议会、以大规模的逮捕、以大街上的屠杀而告终。在巴黎，有一小部分勇敢的法律和共和国的捍卫者曾试图反抗那位阴谋的王位篡夺者，但却徒劳无功，他们被镇压下去了。波拿巴完成了他凶险的、沾满血腥的‘杰作’，并以流放代替了枪杀。”

随后，各种斗争又接踵而来，各种迹象表明，拉鲁斯参加了这一系列震撼世界的斗争。这些斗争敲响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丧钟。

任教于若伏莱私立学校

1848~1851年三年期间，拉鲁斯在若伏莱私立学校担任辅导教师，或者也可以说是个学监。后来他在一篇谈语法的文章中写道：“当时，我的注意力第一次被这一专业所吸引，我当时是若伏莱私立学校的教师，也就是说，我周围是一些有学问的同事，我可以放心地向他们请教。他们当中有些人同时又兼任夏勒马尼公立中学的教师，他们都受过严格的教育并有很长的工作经验。”他之所以走这一条路，并担任教师的职务，理由很简单，第一，他要吃饭。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总不能老靠父母养活。第二，他还想把自己在教育方面积累的理论加以证实和考验，并想在这些年轻学生中实践以后，使这些理论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若伏莱私立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它除在本校培养一部分学生外，还派一部分人去夏勒马尼中学就读，一些天赋较差的人则留在本校。

拉鲁斯把学监分为三个类型，一类是公立中学的学监，相对

她要幸运一些，薪水也比较丰厚。这类学监的作用差不多和监狱的狱吏一样。而“私立中学的学监，条件就差得多了，他们薪水不但少得多而工作量又非常之大。他自己除带一个八年级或九年级的班级外，还负责监视那些不守规矩的学生，以致一年下来便搞得疲惫不堪。还有一种是已经退休的学监，他们属于领取养老金者之流，在巴黎，这类人特别多。他们穷途潦倒、老态龙钟、生活邋遢；他们经常垂头丧气、目光惶惑；双手插在油亮的衣袋里。但还有任务，即在星期六和星期天跟在年轻学生的后边充任监督。在这种局面下他们感到事事难办但又摆脱不掉”。这是一幅略带嘲讽味的漫画肖像。拉鲁斯所描写的可能就是那些命运比较悲惨、走投无路的某些老同事。

在谈到拉鲁斯初任学监时回忆说：“他是我所认识的学监中最积极的人，他身材矮胖，蓄着浅褐色胡须，目光闪烁、沉默寡言，面色阴郁，使人强烈地感觉到在这一外表后面可能隐藏着许多颠覆性思想，如果不是‘许多’，至少也有一个，至于这种思想是否破坏性的姑且不论，但至少他能把这种思想奉行到底。那动力，除了铁一般的意志之外，没有其它。这位学监立志要编写一部大词典，这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大百科全书。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他身后不只留下了一大笔财产，而且更重要的是一部巨著，*Exegit monumentum*^①，他确实为我们建立了一座千古不朽的丰碑。”

苏珊·科贝尔

当拉鲁斯在若伏莱私立学校工作时，他便有了一位女友。她在

① 拉丁文：一座圣经注释者的丰碑。——译者

拉鲁斯一生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位女友在很晚以后，拉鲁斯逝世前三年即1872年才成为拉鲁斯夫人，她就是苏珊·波丽娜·科贝尔。她于1825年生于马尔沃若尔，这是一个小市镇，父亲的职业是染匠，名叫弗朗索瓦·科贝尔，母亲叫苏珊·热丽。

很有可能拉鲁斯和苏珊·科贝尔在1848年以前很久俩人便已相爱并且同居了。“同居”一词可能不甚确切，因为我们不能肯定那时他们是否正式在一起生活，至少开始时他们并不正式居住在一起。苏珊·科贝尔的侄孙女安托尼娜写了一篇回忆录，她说：“……他和他的女友非正式同居了30年……”他们的婚礼是在1872年举行的，这就使我们想到1842年去，而那时苏珊·科贝尔才17岁！

作为一个典型的勃艮第人和一个乡下人，拉鲁斯至少对管理家务不太内行。他是一个略带幻想味的文化人，而且又从事着繁重的脑力劳动。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处理诸如吃饭问题，穿衣问题，家务问题以及钱财等事务。于是苏珊·科贝尔便充当了他的家庭主妇和后勤人员，以便他专注于案头工作。而拉鲁斯对妇女是尊重的，有时甚至有意躲开这些事务，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她处理家务的自由。

苏珊·科贝尔的作用绝不限于家务和尽一个女人的义务。拉鲁斯给她信中曾写道：“在编写《教育词汇学》时，你是我名符其实的‘合作者’。你肯定还记得，在居尔图尔·圣-卡特琳娜大街和弗朗-布尔热瓦大街时，每天我都把我为词汇学编写的作业练习交给你，你直率的评价，对我的修改和补充帮了忙。我的合作者，我还欠着你这份合作的债，这样说是公平的。”

从这封信可以推断出，当拉鲁斯在若伏莱私立学校任职时，苏珊·科贝尔当时正住在和该校相邻的弗朗-布尔热瓦大街。但作为当时的一名妇女来说，很少有可能接受系统教育。无疑，她

是在与拉鲁斯的接触中增长了学识。似乎可以说，拉鲁斯让她看自己作品的底稿，正象莫里哀把自己的剧本交给女仆提意见一样，只不过这里边又多了某些含义罢了。莫里哀想要了解的，只是他剧本的人民性如何，从来没想到把女仆称为“合作者”，而苏珊·科贝尔反复阅读那些著作原稿，却给予注释、改错和补充。因此，她除了应有善意以外，还应有真才实学，要对语法有足够的修养，还要有一个比中等水平略高的文化水平。此外，我们还发现她是一位有头脑的女性，丈夫去世后，她把后事处理得井井有条。

从保存的一张由瑞士画家让-巴蒂斯特·邦茹尔于1872年为她作的一幅半身画像来看，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普通、聪明而又略见严肃的女性：双唇紧闭，很难看出一丝笑意，如有，也很可能是略带嘲讽的微笑，一双灵活的大眼，宽阔的前额，鼻子略嫌高大，在庄重的下颏左上方有一颗美人痣。一头黑发在前额曲卷着，同时呈波浪形披散在双肩并垂于背后。整个面部已变得不甚清晰。项上挂一条黑绳，下面缀一镶有宝石的十字架。罗纱的连衣裙上镶着花边，几乎把整个胸部都遮住了。肖像是当时流行的椭圆形，是她在瑞士照顾当时身体欠佳的拉鲁斯时所画。

拉鲁斯的浪漫主义

在这位词典编纂家将要出版他的第一批著作时，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他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浪漫主义影响？我们是否可以把他的看作一个浪漫主义学派的追随者？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他承认这一学派的价值。他在词典的“浪漫主义”条目中，支持了这一观点，即取消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便是取消了一切文学。他在结论中说：“无疑，人们是大大夸大了浪漫主义的消极性和它

的破坏性，特别是在初期即1830年到1848年这一时期。我们尤其不应对这样一个运动给予简单的否定，因为在浪漫主义运动中产生了那么多不朽的伟大作品，产生了象米什莱和奥古斯坦·蒂埃里这样的历史学家，产生了象乔治·桑和巴尔扎克这样的小说家，产生了象德拉克鲁瓦、德康、卢梭这样的画家，产生了象柏辽兹、弗利西安·大卫等这样的作曲家，产生了象维克多·雨果、拉马丁、阿尔弗雷德·缪塞和戈蒂埃这样的诗人。对此，我们是不能给予简单否定的。”在该条目中数次提到维尼，而史达尔夫人和夏多勃里昂则被认为是这一运动的首倡者。对维克多·雨果（如同对莎士比亚一样）词典则经常使用“天才”这一字眼。

然而他的兴趣和爱好偏向于古典作家，这也是明显的。拉封丹倍受赞扬。在他的《师范学校》杂志上，他曾为拉封丹撰写过长篇文章。他对人们给这位作家冠以幼龄儿童作家的称号表示遗憾，因为这就使人们忽略了那些对成年人也有教益的童话，因为成年人也能从中吸收很多养分。他喜爱古典作家，这些作家的大量引文在他的大百科词典中俯拾即是。他也喜欢18世纪的作家，特别是狄德罗、伏尔泰。但有时他也批评他们的作品缺乏趣味性。无疑，他欣赏伏尔泰的轻松、挖苦的笔调，但更欣赏他那宽厚长者的思想。

拉鲁斯的本质是古典的。对于古典文学，他赞扬它们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想象和理智的平衡，以及对趣味性给予的绝对重视，也就是说，它们很好地把握了美感、比例感和分寸感，很好地表现了爱的真诚与善良。他接着说，我们将永远珍藏着一两部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但我们却永远不断地学习伟大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并且乐此不倦，因为他们属于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国家。对于浪漫主义作家，我们的编纂家批评他们的作品晦涩难懂，过

分夸张，过于放纵情感并过于伤感。和蒲鲁东一样，拉鲁斯来自农村，来自人民群众，因此他也表现得有些过于现实，过于理智，而且过于为自己的宏伟蓝图所担心。

然而，和巴尔扎克、蒲鲁东、拿破仑三世或者雨果一样，拉鲁斯也是时代玉成了他。即他们都诞生于19世纪，这一世纪属于浪漫主义。它为作家、艺术家们自由地成长壮大，自由地张开幻想的翅膀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他们可以自由地为所欲为，自由地在作品中表现怪诞和荒谬，自由地发展自己天真的和乌托邦式的信仰。想成为学识渊博的百科全书派的幻想贯穿于整个世纪，特别是贯穿于19世纪前半个世纪。马克西姆·迪康在他的《文学回忆录》中谈到他的朋友福楼拜和他自己（此书写于1848年，当时他还很年轻）时说道：“我们当时都想作一个博学多识的百科全书派，什么都想了解，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并非难事。这个奇特而可笑的目标有它的长处，它使我们进行了广泛的涉猎和研究，并迫使我们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事物。我们当时是贪得无厌的。居斯塔夫·福楼拜就这样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想，我以后也仍然会这样。”拉鲁斯和这位朋友有同样的求知欲，同样广泛的研究兴趣，甚至有同样丰富的积累。

在那些反动和思想专政的年代里，拉鲁斯和米什莱一样，是法国大革命的浪漫派作家。词汇学使他着迷并且使他产生了神奇的力量。尽管各种阴影、失望和沮丧不断地跟随着他，但这种力量对他来说，就是孕育着巨大的希望，就是重归于纯真和博爱，就是对理智和人民必将胜利的信念。他亲眼看到了一场革命，即科学和工业革命。他公开承认这种革命给“人”带来的许多危险，同时他也热情地赞颂它的成就和带来的物质财富。机器和铁路大大发展了，人们研究并使用了化学、生理学和生物学。各种设想都可以自由提出，黄金时代的曙光已出现在地平线上。

这一次的科学实验将由许多拉鲁斯的同辈人来承担，甚至包括了
蒲鲁东、雨果及以后的勒南和泰纳。信仰在当时，似乎显得有点
天真和不受条件限制了。科学、进步、理智，甚至全人类的爱，
都是最完美的思想体系。但它们自己却无法保证能够造福于人
类，也不能在实际上拯救人类。在这种极度的，而非适中的热情
中，我们发现了拉鲁斯的浪漫主义灵魂。这种浪漫主义属于他在
其中生活的那个时代，但却走在该时代之前。

就是这样，孩提时代受到的影响，大量的工作和整个的时代
把他武装起来，从而使他开始了一个硕果累累和创新的时期。

第三章

教育学家

从拉鲁斯的一生看，首先，他是一个教育家。作为教育家，他有着双重身份。从他短暂的教学活动和他的许多教学著作看，他是一个儿童教育家。从他的大百科词典看，他又是个群众教育家。本章着重谈谈他的教学方法并涉及其它方面的著述。除了他初期写的文章以外，其他著作均已由拉鲁斯—布瓦耶书店印刷出版。该书店创设于1852年，由他和他的一位同乡奥古斯坦·布瓦耶合作经营，这就大大方便了以特殊方式发行和印刷拉鲁斯的著作。这些著作以文学形式在法语初级教学法方面掀起了一场革命。1880年8月10日，负责初级教育的领导人费尔迪南·比伊松给奥古斯坦·布瓦耶的信中说：“在翻阅这些著作时，使我吃惊的是，大家竟然没有发现，在整个初级教学中，今天所使用的语法教学方法，除了实施手段不同外，实际上就是30年前拉鲁斯所采用的方法。”尽管如此，据我们所知，他的名字却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本教育史上出现过（当然《费·比伊松词典》和夏瓦尔戴斯的一本书除外）。

我们材料的主要来源是他自己写的有关教学的书籍和他办的两份教学杂志，一份叫《师范学校》，现共存13大卷（自1858年11

月到1865年10月)和《竞赛报》(1862年11月到1864年10月)以及他的大百科词典上的许多条目。他第一部著作内容为初级小学词汇学,是一套法语完全课本,供三学年用。它是拉鲁斯撰写的全新教材。第一学年本名叫《词的种类和词的关系》。这本书后来改名为《词汇学基础语法》。他在若伏莱私立学校时,便开始实践他酝酿已久的初级教育改革计划。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直到后来为编写词汇教学法一书中的某些练习,才脱离了该校的教学工作(见大百科词典增订本第一卷)。他的工作得到未来的拉鲁斯夫人的帮助。我们还将涉及到在他生前便已大部出版的40种教学书籍,十几种其它著作和小册子。这一不懈的写作活动,其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科学的普及。他被一种民主意志所鼓舞着,这个民主意志便是教育人民,并在自由和共和的钟声敲响之前,为人民群众准备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1850年前后的教学法

自1830年~1840年,拉鲁斯还在土西,就已深感教材的贫乏和教学方法单调乏味。当时学生只凭记忆学习,死记硬背,对大多数内容都不理解。检查的方法是一个个地向老师背诵,老师据此给予表扬、批评或惩罚。拉鲁斯曾不止一次在他的著作中幽默地引用布封这句话:“我们曾把教孩子比作教鹦鹉,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觉得这种比方极为贴切。”因此,在他的《基础语法》前言中,一开始就这样说:“一位督学当着学生的面就对我们说:‘不要教给孩子们过多的判断、推理。’并建议我们要把这当成一种制度定下来。”用第一批使用拉鲁斯课本的老师们的话说,当时的倾向是把孩子当成会说话的机器而不是使他们成为能够灵活思考的学生。

当时在教学中还经常使用拼写错误举例法。有一种《错字、错句手册》，《贝特洛大百科词典》给它下的定义是：“把不规范的字和句按原来的错误式样写下来。”这种方法，其目的是把原来的错字、错句再现在学生面前，以便给予更正……拉鲁斯对这种方法予以善意的嘲笑，他说：“这种方法由于语法学家麦利埃的提倡，曾于1811年风行一时，并且很时髦了一段时间。但20年后，人们便发现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这就使学生们眼前经常出现一种错误的字形或句式，并且习以为常，从而深深地打在他们的记忆中，并使它们常常和正确的写法相混淆。”另一种方法是让学生在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种拼写间选择，或者把一个词标上阴阳性和题目要求的数^①，但是“错误举例法最好的手段也绝无价值，这种方法应在学校中予以废除。”

拉鲁斯对“相互教学法”未予绝对否定，但也认为好处不大。大百科词典对这一方法的定义是：“一种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之中一部分人教另一部分人的一种教学法。”这种方法是把一个班分成几个可变的机动小组，由一个辅导员加以监督，而辅导员也经常变换。“小老师”或称辅导员也分成若干个组，与呈半圆形围坐的学生们相对互相纠正和互相教授知识。拉鲁斯认为这种方法有双重弊端，即它既教不好学生，也培养不出“小老师”来。“当时许多聪明的教师对这一教学法反应很冷淡。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把集体教学法和相互教学法结合起来，这也是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混合授课法”（见大百科词典“教育”条目）。我们可以承认，在不断地思考基础上，实践经验是可以产生出聪明才智的。

“从前的语法教学，大多数教师是各自为政、随心所欲的。通

^① 法语名词有阴性、阳性和单数、复数之分。——译者

常的做法是，只满足于教给学生某一语法现象而不予解释，也没有练习。再没有比这种方法更枯燥、更令人兴味索然的了”

（同上“语法”条目）。当拉鲁斯在写他的语法教科书时，当时绝大多数小学教师使用的是洛蒙写的《法语语法》独家课本，对此，拉鲁斯深表惋惜。

为取得教学效果，当时普遍采用体罚手段。对当时的体罚工具“戒尺”，拉鲁斯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那是一种木制或硬皮革制成的长条形的东西，头部扁而宽，如果学生犯了错误，就用这东西打他们的手心。”“我们这一代人对这种教育工具或者说刑具十分熟悉。当时我们的学习气氛是这样的：老夫子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眼镜架在额头上，戒尺则挟在胳膊下。当我们偷懒或者不遵守纪律时，他就经常用这戒尺打我们的手心。时至今日，我头脑中仍保留着那又狠又重的板子打在手心上的无情记忆。戒尺打在上手，巴掌打在脸上，而脚却踢在——不管什么地方。但这些手段却没能使我们做到把一个标点符号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也不能使我们正确区分什么是形容词用的现在分词和什么是真正的现在分词。”他接下去说，戒尺现在是没有用了，但是它的作用却被某些“打屁股先生”所代替。

以上是对1850年左右的教育情况一个轮廓式的介绍。记忆支配一切，令人生厌的课堂，用体罚处分学生，教材质量低下而且危险，教学方法陈旧又不能适应需要……这就是当时小学教育的情况。

在此，我们还想探索一些问题的细节，因为我们缺乏准确的资料而不得不这样做。比如哪些教育家给了拉鲁斯以启发？值得一提的是大百科词典的“教育学”条目是由一位未来的公社社员写的，他的名字叫于勒·安德里厄。和大家一样，我们的词典编纂家也很景仰大人物，如蒙田、拉伯雷、卢梭等。拉伯雷保卫了

使学生独立思考的原则并为未来做了准备。蒙田也同样，他鼓励教师给学生以独立思考的机会。至于卢梭，拉鲁斯对他不够相信，认为他的学生很象温室里培养出来的果实，并认为使它们重返原始的天性毫无意义（见“卢梭”条目）。

与拉鲁斯最接近的，大约是泰科·科默谟斯(1592~1670)，这位摩拉维亚人在把巴孔的经验用在教育学的实践中，有许多地方走在了时代的前边。拉鲁斯主张向所有的人学习所有的知识，科默谟斯也有同样看法，他说：“所有的孩子应该学习所有能遇到的一切，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和他一样，拉鲁斯坚持观察自然、坚持进行有趣味的和轻松愉快的教学活动，坚持做物理和化学实验，坚持形象的重要性，坚持在学校里再现人类社会（科默谟斯说，学校就是人类的一个车间），坚持对教育的普及工作。米什莱称科默谟斯是人类教育的第一位福音传播者。

瑞士教育家佩斯塔罗兹（1746~1827）发展并且延伸了这些思想。拉鲁斯也承认，他是自己的老师之一。

拉鲁斯后来又兴趣盎然地追随着雅克多（1770~1840）的生动活泼的教学法，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教育、教学、小学教员

拉鲁斯对许多事情的立场是明确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行不通。从基佐那里，他明白了“人的价值在今天，乃是生活中成功的首要力量也是首要条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它。”他赞扬马蒙泰尔的《父亲给儿子上课》一书，他反对卢梭那种喂养襁褓里婴儿般的慈母式方法，对罗贝尔的教科书赞扬和批评互见。比起我们颁发奖学金的办法，他更喜欢瑞士的“同届生晋级大

会”的做法。他赞成办“修辞班”^①而不甚喜欢办“专业班”。他还主张实施女子教育，这在当时也很大胆。

他认为其中首要的，应该是培养人的品质、判断力和道德观念，这比培养才智更重要。这就要求教育者本人要具有高尚的情操和具有爱学生的品德。在这方面，他向我们讲了一则小故事：

“苏格拉底的学生中有一个12岁的孩子，过了一段时期，他便把这个孩子送回到他父母身边去，并对孩子的父母说：‘你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吧，因为我无法使自己爱他。’这句名言包括了整个教育制度的精华，我们把它奉献给读者以供思索……苏格拉底把他的教育体系建立在劝导、建立在爱和互相信赖的基础上，而他一旦发现自己缺乏这一基础时，第一位的东西以及所有的教育模式便已失去意义。”因此拉鲁斯说，“苏格拉底是先生的先生。”这一高尚的思想启发着拉鲁斯，从而出现了苏格拉底式的生动活泼的对话式教学法的萌芽。他在教育中关心思想品德的主张当时也正处在萌发和实践阶段。

基佐通过1833年6月28日的法令规定，每个区至少有一所小学。1867年的法令又规定，居民凡超过500人的行政单位必须建立一所女子小学。但在1861年2月，拉鲁斯就远远走在前面了。他在给当时公共教育部长卢兰的公开信中就呼吁要在法国分批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一思想在他的杂志中曾数次提到，并收到其凡尔赛师范学校前校长勒布伦对这一问题看法的信。他在词典中对这个问题也同样表示得明确、具体。“免费义务教育的首倡者和先驱”，这是拉鲁斯受之无愧的一顶光荣桂冠。

怀着真正义务教育的民主思想，他对当时有60万名儿童得不到入学机会表示惋惜。他说，这些孩子的真正敌人就是无知。他

^① 旧时法国中学的最良班。——译者

特别强调实行社会教育的好处。他非常高兴地看到兰斯兴办了职业学校。对于图书馆的发展，在他的词典中曾不止一次地作了热情赞扬。他还热情地赞助成立科学艺术普及协会和工科综合普及协会，并肯定了1863~1869年任公共教育部部长的迪雷所实行的改革措施。

《师范学校》杂志是由小学教员主办并为小学教员服务的刊物。这份杂志始终赞扬小学教员这一名称的光荣和这一职业的高尚，以及小学教师的美好品德和功绩。“然而我们大家都知道”，拉鲁斯在他的回忆中以切身的体验写道，“如果说小学教员是一个王国里的国王的话，那么，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人想到为他配备各部大臣以便在他不在时继续管理这个国家。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君主政体正在逐步地向共和政体过渡，这个国王常常不在位。于是，刚才教室里还静得能听到苍蝇起落的声音，现在就一下子变成了无政府主义最好的温床。

每个人都无所畏惧高声起哄，

这恰便是分崩离析各自为政。

让小学教师出差抄写镇政府文告，可以；让他们到教堂里参加唱经，更是无话可说，特别是如果这位教师有这方面天才的话；但在让他们充当政府秘书和唱经班成员的同时，他们首先应该是小学教员。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在学生们中间，任何个人意志都不准把他们随便拉出教学岗位。”

拉鲁斯还认为：“小学教员应该有广泛的知识（我们不说他应该是一个学者），应该热爱自己的事业，因为他如果对这一工作毫无兴趣，那么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好。”因此他最后说：“小学校长或是小学教师，其地位是低下的，其职务也并不高，但从未来教育事业的进步和繁荣看，却没有一种职业比它更为重要”（大百科词典“小学教师”条目）。

词汇学家

在拉鲁斯所热爱的各种专业中，最突出的是词汇学。他非常喜欢“这些纯属特定的、供人们表达自己思想的符号”（见《拉丁语词根苑》）。他这种爱是基于理智的爱，他信奉这样一句名言：“对词汇的认识，可以导致对事物的认识。”

在他的教学杂志上，他写道，这个“语言的魔术师”（雅克·莫罗语）紧紧地占有了他的兴趣：“上星期有一天，我偶尔翻开小词典第123页，目光便自然地落在第二排下面‘旋花’一词上，注解是：‘旋花，旋花科植物的学名。’就在这一瞬间，我的思维便活跃了，词汇学的精灵便附到我身上，只用了5分钟时间，许多有益于开发智力的小练习便在我头脑中形成”（见《师范学校》）。他说的这些小练习，就是给学生一个很大众化的词。比如说“乱坟地”，然后让他们说出相对应的学名（如“大公墓”等）。我们这位词汇学家的词汇教授法有3个主要特点：1. 以词汇表为基础，2. 诱发孩子们的思维能力，3. 在紧紧抓住他们注意力的同时又要使他们的神经放松。

拉鲁斯曾几次提到，法语最少有十万个词汇，在那个时期也仍然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目前我们认为法语词汇大约在80万上下），但这些词在他那里都是些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东西。它们都能经历诞生、演变、转化和死亡等阶段。他在《拉丁语词根苑》一书的前言中，又重申他对词源学的神秘观点。他说：“这里，词的来源经常是与我们目前通行的词汇意义毫无瓜葛的。我们所提供的词汇表不受一般词汇演变规律的限制。对这些词，我们常常是既不知它们将向哪里蔓延，也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就象占卜赛人一样，它们的行踪是神秘莫测的。……”

我们提到这些，其意不在于指出拉鲁斯在了解词源学方面的弱点。这门学科自那时以来已有了发展，我们只是想指出，下面这些话对他是有推动作用的：“要有激情，要活泼愉快，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要有发现和享受它们的喜悦，要有激发学生兴趣的愿望，还要有活的、带有幻想和浪漫色彩的教学艺术。”这里，“幻想”和“浪漫”两个词应当是褒义的。有谁能谱写出这样的篇章，谁就是新型的教育家。他就会亲身感到词汇所具有的魅力，并且愿意使别人也感受到它。

词 汇 学

拉鲁斯对词汇学执著的爱，贯穿于他的全部著作中，特别在他的一套教科书中。这套教科书总题目是《教育词汇学》。一开始，这些作品分别出版时署名之前都冠为“凡尔赛师范学校旧校友”，或者“巴黎语法教师”的帽子，以后就改为“《教育词汇学》的作者”了。其第一册发表于1849年11月，书名是有实际含义的：《词的性质及其关系》，随后又改为《词汇学基础语法》。次年发表的教师手册前言指出，其基本方法是建立在对词的研究基础上：“借助词汇学的手段，学生不仅学到了词汇的拼写，还可以权衡该词的价值，并可以了解词源学，可以学会区别词的本义和引伸意义，可以找出其反义词和同义词等。这种一举多得的学习方法是符合语法学习规律的。它始终只有两个手段：听写和语法分析。我们采用这一方法不是在教员准备室里想出的，而是来自学生的实践。我们认为这是使学生掌握叙述文写法的唯一途径。”

拉鲁斯立志改革法语教学。他认为对孩子们不只教他们拼写，还要教他们会正确地说话和写文章，即是说，要教给他们正

确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要使他们能够明确、简洁甚至漂亮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一句话，拉鲁斯认为法语教学中占第一位的是说话和写话而不应只局限于正字法。另外他还写了一套《法语及法语文体教程大全》。这套教材共三册分三年学完，第一册《词汇学基础语法》，第二册《词汇学文体课程》，第三册《高级语法及综合语法》。这最后一册共写了15年多的时间，即从1852年到1868年才陆续写完。

丰富学生的词汇、培养学生的智力，乃是教学的基本着眼点。“我们始终不渝的目标便是引导学生们写话、创新和‘锤炼’自己的文章，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他们的智能。这种教学方法，激发了一场真正的智力锻炼。这些青年学生们已经在追寻法语的起源。他们研究它，解剖它，他们摆脱了陈规陋习和机械主义的羁绊，由自己作反复的思考、对比、推理和调查。”对于词汇学的作用，拉鲁斯是这样说的：“它揭示了两个相关的词语之间准确的和严格的关系，它促使学生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用本义词并能掌握优美的表达手段。此外，它还避免了语法课的枯燥乏味，并赋予修辞学以准确性，而这种准确性由于修辞本身的含混不清而更显得必要。”

这种课的具体做法是：把名词变成形容词及把形容词变成名词，依据一个指定名词，说出它所派生出来的形容词、动词和副词；用间接宾语填空；布置变单、复数的作业；把所有的分词都写成阳性、单数，然后由学生去变化，等等。此外，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和开发学生的智力，教师手册还应提供大量有关的知识以供教师讲解。……

“总起来说，这种基于词的科学性的词汇教学法，就是要把一种枯燥的劳动变成游戏的形式。当你给孩子们一个词时，必须做到使他们产生要了解和它相近的另一个词的强烈愿望，而且必须

使年轻人具有独立完成这些步骤的能力。这些词应该成为激发智力的兴奋剂。”（马克斯·多罗语）

其他学科

在拉鲁斯的教学法中，法语教学法占绝对统治地位。但他认为一个小学教师应该具有更广泛的文化素养，他们应该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给孩子们的思想开拓，投下缕缕光明。他办的教学杂志就包含各科内容，如代数学、考古学、算术、天文学、植物学、编年学、商品贸易、朗诵知识、地理学、几何学、历史学、圣经故事、文学、音乐、哲学、物理学、诗歌、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拉鲁斯还曾计划和迪尔蓝合作撰写一套算术教科书和科学教科书，由于合作者生病并不幸夭亡，致未能成功。

他的历史观有独创观点并走在时代之前，他对历史的研究独辟蹊径影响颇大，吕西安·费布菲尔以及当代各学派都走的这条路。

拉鲁斯更注重地理知识的普及。他说：“我们对这门学科绝非门外汉，我们的地理学家，作为一个学者，绝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者逊色，但只有当这门学科得到普及时，我们才能占有优势。今天，我们大家都已感到在劳动者阶层普及教育的必要性，增加学校数量的必要性，完善教学方法的必要性。即使我们计划中的改革项目完全得以实现，恐怕在法国也不会有一个人敢说，他已对他的国家有了足够的了解，更不消说对于邻国和对整个世界了。”

最后提一提体育。拉鲁斯十分赞成锻炼身体和做游戏。他认为锻炼身体有助于孩子们锻炼意志，可以使他们身心协调地发展、免受恶习的感染、免遭坏思想的影响，并能保持神经官能的

健康发展。他认为培养一个思想健康、体魄健全的人乃是教育的全部目的。

拉鲁斯的教育学原则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一下他的教学法的基本原则。首先，它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即实践决定一切。凡是被学生弄通、搞透的东西，他们就能很好地掌握它，就是好办法，就能取得好结果。与此并行的，是反复做练习，这可以使学生同时学会运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

我们曾讲过一个理论铁匠和实践铁匠的故事，拉鲁斯反对华丽而空洞的词藻，说“它只不过是把一些响亮的词汇灌输到学生头脑中去，但却是空洞的、抽象的，其派生词是不规则的。”因此，他的教科书都是经过反复修改、删削、增补之后才写成的。他说：“《教育词汇学》基本是练习组成，它是在学生们中间写出来的，它马上就可在实际教学中得到考验，如果说这本书没有别的价值的话，最少它具有基本的实践性。我讲一课书，通常是以大量的练习做先导。一课书，一般我先准备50多个句型或者50多个词汇，待课程结束时，这些句型和词汇只剩下10来个，其它40个已在教授过程中被淘汰。我至少要经过五、六次这样的反复实践，最后才敢把这些练习拿去印刷。我认为这种办法可以说是唯一的好办法。而当一个学生在某一难题面前走不过去时，可以肯定地说，那是因为教科书有毛病，原因绝不在学生。”有几个教育工作者，更能有几个教科书的编写者有这样科学的态度？有这样诚实？又有多少人是这样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

其教学法的第二个特点是，注重兴趣和有吸引力，即让课堂具有魅力和生动活泼。“有用”和“有趣”是我们的作者经常喜

欢用有两个词。寓“有用”于“有趣”之中，也是拉鲁斯—布瓦耶书店的原则。他们出版的许多著作都印有“知识、娱乐、教育”的题词。1881年出版的《图书目录》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们出版物的这一特点。

其教学法的第三个原则，可以用眼下最时髦的字眼来表达，即主动教学法（或译作活动教学法——译者）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都表明了一个原则，即它的大前提是着眼于激发孩子们的创造精神，主动地训练他们的思想，“孩子们的思维一般是直感多于理智，教员的责任就在于发展学生们那种尚处于萌发状态的理智。”这就要求教师要真正地爱孩子，就是用知识的力量来熏陶他们，而不是溺爱。他在算术、历史、地理、古代神话等课堂上布置的练习，其方式近乎游戏，当时拉鲁斯尚未想到“创造性”这个词，但他整个的教学活动却始终都贯穿着欢快、发现和创造。

竞赛法也是激发孩子们主动性的手段之一。拉鲁斯直言不讳地说：“竞赛就象鼓满帆的风，它同时也是帆船失事的原因，人们可以说出它1000条好处，也同时可以说出它1000条坏处。尽管如此，竞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生命和基石。每一位立法者是深知这一点的。致于在我们所有的学校里取消奖励，取消鼓励性的评语，取消年终奖学金，而只引导孩子们完成自己的功课，那只不过是一个出色的乌托邦罢了。……”但关于竞赛法一词的解释，在他办的两种杂志上均未见到，就是在他的大百科词典上关于“竞赛”条目下，也并没作过具体说明。对此我们只局限于推测上。如果拉鲁斯公开宣称自己是“竞赛法”的拥护者的话，那也只能是基于实践的原因，因为“竞赛法的拥护者是实践家”。

基础教学法的第四个原则是：说服而不用体罚。“竞赛和诱导是儿童教育的两大法宝。不错，在书法方面一提起教师来孩子

们就害怕，但这种怕是以爱为前提的。这是一种子女对父母的怕，而不是奴隶对奴隶主的怕。这种温和和诱导的方法是唯一的成功之路。对动物的训练也是如此，特别是对于那些智力较高的动物更是如此。我们已是从事小学教育多年的老教师了，如果有人问：‘你对孩子们使用过笞杖吗？’我们将坦率地回答：‘是的，有时用过。’但是，我们同时也会毫不踌躇地回答：‘这是一种糟糕透顶的制度。’”（见《师范学校》第一卷）拉鲁斯就用这种语言坚决地反对他的同事帕罗兹。此人提倡对学生进行体罚。拉鲁斯进一步宣称：“完美的教育，其精华全部蕴藏在循循善诱之中。”（同上）就是在这里，他讲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苏格拉底的故事。此外，他还引用了许多谚语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说，“大蒜愈捣，味道愈难闻”，“用蜜引来的苍蝇比用醋引来的要多。”他接着说：“你愈是粗暴地对待一个性情怪癖的孩子，就愈会使他无可救药。”（《师范学校》第7卷）

他最后一条教育原则，就是要重视思想品德教育的原则。拉鲁斯是一位道学家，他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方法无一不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出的，即：使人变得更完美，要把人引导到善良的境界。拉鲁斯曾以赞赏的口气引用巴黎大学教授博坦的话：“只管传授知识是不够的，占第一位的是道德品质教育。如果我们不懂得辨别，不懂得爱，不懂得执行正义，那么我们学到的科学将变成一种危险的武器。最主要的是，要使人们诚实而不是使他们成为学者。再没有比那些占有知识、受过教育但同时又是堕落和无原则的人对社会带来的损害更大的了。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主持正义和为社会造福，而道德和善良，它可以拯救我们，它走在科学的前面。有知识而无品德，是人类诸灾难中之最大者。”

他主张教师应教会孩子热爱高尚的品德并摒弃那些使人受到

损害的行为。“通过这些反复不断的练习课，使孩子们发展真与善的情操。通过这种灵活的方式播下的种子，可以得到百倍的收获，而这样塑造出来的心灵，将永远为真理敞开着。这有如天上的清露，只有储在干净的罐子里才能保持其纯洁。”（以上均见《师范学校》第一卷）说到这里，我们便理解了他和奥古斯坦·布瓦耶合办的书店以“我仅藉风力播种”^①作为标记的深意。

最后他总结道：“教育，便是对所有可以使之发展和可以使之完善的人所进行的体育、智育和德育。归纳起来说，自然只创造了野蛮和愚昧者，而教育才使其成为文明者。”

教育杂志

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两本杂志创办的目的和指导思想。在此，谨再做些细节的补充。第一份杂志的对象是小学和中学教师。开始时取名《师范学校——教学和教育报》，随后，从第二年起改为《师范学校——教学实践报》。这就使某些人（比如科安先生）认为拉鲁斯曾当过师范学校的校长。但名称是清楚的，内容主要是讲教学工作中的日常工作，是他改进自己教学工作的一种工具，也是为了给学生上课提供方便。

那么这本“教育性和趣味性并存”的杂志，这块为教育者辛苦耕耘而开的土地，这个教育的前哨阵地有多少订户呢？从搜集到的零星数字统计，其约数为：第一年，法国有3000户，比利时有300户，瑞士也有300户，不久这份杂志便又增加了1200个

^① 这是拉鲁斯书店及其所出书籍共用的著名商标。主体是一巨大的L（拉鲁斯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上面有一少女手持一朵蒲公英，用口吹其绒毛使四处飞散。题词是“我仅藉风力播种”。本书后文将有介绍。——译者

新订户并拥有七名外国记者，第一年共印 6000 册。第二年的第一分册，据广告说印了四万册，其中许多订户是教会学校的寄宿生。

初办时期（1858年）该杂志每15天出一期，第二年开始改为周刊。它是瑞士的《民众学校》杂志的继续。其编辑方针有二：一是采用未发表过的新作，二是同仁来稿可自由发表见解，文责自负。这些人中有教师、作家和拉鲁斯从前的老师等。

在此，不可能把读者写来的赞扬、批评和建议都加以介绍，仅举一例以见一般：“《师范学校》是我们的一个助手，我们相信它以后会越办越吸引人。不管卡尔特隆对它说什么，你们通常都保留一块消遣园地，你们的一小块文章，一小段故事，对语法现象或对文学的讨论，对我们都是有用的和亲切的，在读者中有同感的绝非我一人。”批评意见也常在读者来信栏内发表。拉鲁斯还常用“米克罗梅加”这一笔名作风趣、诙谐的自我批评。

第二份杂志《竞赛报》是学生刊物，专门为 7 至 18 岁在校青年学生所办。前两年（1862~1864）中，每月 15 日出版。其中智力竞赛栏分成三个年龄等级，分别为“蓓蕾”、“花朵”和“果实”。每期都选登三篇获奖作文，作者可得奖品。据有关人士提供，其订户为 9200 户，从未超过 1 万户。第一年亏损竟达 5000 法郎。

拉鲁斯办的两份杂志可称同行业的典范，是坦率、生动活泼的典范，是人们精神生活永恒地享受。

1856 年的词典

拉鲁斯编写词典的时间大致和他的词汇教学法同时。它作为《拉鲁斯小词典》的前身，只是为词汇学服务的一本工具书，1856

年问世，即他的第一套教科书出版以后的第七年。1856年3月19日出版的《法兰西新书目录》上是这样介绍的：“《最新法语词典》主要内容为：第一，对所有特殊发音和难读字词全部注以音标；第二，对法语中最重要的科学词汇、历史和文学词汇及词源都作了注解；第三，对一些拉丁语的词组和句型作了翻译，并指明其用法。因此也可以说，这些经常在口语中使用的拉丁语词组及句型进入了我们的语言，从而在今天已不再是不为人所了解的了。该词典由拉鲁斯编纂，32开本，11 $\frac{1}{2}$ 印张，巴黎波姆莱印刷厂印刷，拉鲁斯—布瓦耶书店发行。巴黎，圣—安德烈—德札尔大街49号，硬封面，每本定价2.25法郎。”其规格为9/14，按现行标准为18开本。该词典有以下特点：难词的发音，非常著名的用粉红色纸张印刷的部分^①。此外，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特点，即举有大量例句，这在同一开本的词典中是一个创新。该词典第一版尚未收入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内容。

在此，我们想就其前言部分多作些介绍，因为它反映了编纂者的用心所在。在前言开始部分，拉鲁斯把词典分为两类：“一类是把所收每个词的限定词义都用例句表示出来。”“另一类则是只把所收词汇的本义和一般意义指出便完成任务。我们一般使用的大量袖珍词典即属这种……但这只不过初具词典的轮廓而已。它的作用只能是提供词汇的写法和标明词的阴阳性。”而拉鲁斯要做的，首先是实用，即指出词汇当前所具有的词义，而不是作广泛的词义研究。语言是活的，词典也应随词义的演变而有所不同。“它不应该走得离现实太远，也不能只学婴儿起步，它应该是一个仆人，手里拿着主人的行囊并紧随其左右。”拉鲁斯随后

① 指该词典里拉丁语注释部分，这一部分在词典中用粉红色纸张印刷。

又诠释了他是如何把三类词汇（即一般词汇、百科知识词汇和拉丁语）熔于一炉的。他拒绝把《法兰西学院词典》一分为二的那种传统编纂法。他认为《法兰西学院词典》是我们美丽的古典语言权威解释者，“但在正字法方面，还需另有权威才行。尽管该词典在这方面还不够完善，但我们仍应始终把它奉为指南。”

关于词典的注释部分即拉丁语词组部分，用粉红色纸张印刷，共68页，这部分页数编码与词汇部分编码相衔接。到1858年第四版印刷时，共14卷又714页。

在第六版（1858年底）的介绍中，作者还详细叙述了他精心选择词汇的经过，和同时期的词典（如拿破仑·朗代和谢居罗尔的《法语词汇小词典》）不同的是，拉鲁斯并没有随心所欲地增加词汇。他把教学法的精神运用到词典的编纂中去，即不把学生的头脑挤得满满的。他的词典对象是适龄儿童，对小龄儿童，他们向他们推荐拉舍尔词典，拉舍尔是一个排字工人，拉鲁斯的同事之一。

随着年代的流逝，新词汇在不断出现，这些词汇《师范学校》第三期上曾予公布。拉丁语词汇部分也已扩大，于是在1860年“应广大小学教师迫切要求”，词典又增加了一批历史、地理和神话词汇。

词典一问世便取得很大成功。印数不断增加。据教学杂志统计：自1859年6月至1860年6月共售出44000本，1863年6月至1864年6月售出数量相同。此外还有人擅自翻印和剽窃。在1867年版的词典上，拉鲁斯忧郁而幽默地抱怨说：“这些增订本一出现就成为那些善于抄袭的先生们兴趣的集中点。这也可以看出那些专爱把别人的财富攫为己有者的情趣。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这种事干，这也是他们的乐趣之一。他们走进我的字里行间来行窃，就象在光天化日之下到一个公共牧场上去拿什么东西一

样。在此，我保留一切权力来反对这些文学上的倒卖商。*

在这一时期，他的字典还曾遭到严重阉割。1869年拉鲁斯还在世时，就有人把他的字典改名为《法语完全词典》。九年以后，由于手工工艺工厂的工程师，拉鲁斯书店经理之一的乔治·莫罗的努力，该词典第一次附上插图，这在法国也属首创。1905年，克劳德·奥热的《小拉鲁斯词典》问世，仅在当年就卖出500万册。

其他著作

拉鲁斯著作十分丰富，特别是收入他的大词典的内容尤其广泛。他的著作可分成三种类型：一类是和他的词汇教学法有直接关系的著述；一类是各种类型的其它教科书；一类是包括各种题材的著作和小册子。

最后这一类，有些已以词条形式载入他的大百科词典。此外还有些与该词典有关的著述如下：《给路易·弗约的信》（1866），《康布罗纳的名言》^①（1862），《妇女面面观》（1872），《古代意大利的奇形饰物，异常可笑、异常著名而又异常生疏的科丹教士的生活》（1867），《造币厂》（1867），《卡摩依安传》（1867），《19世纪万用大词典的纲目、特点》（1869），第一篇文章（共一页）是反驳弗约在《巴黎的气味》一书中对他的攻击的。

还有致鲁什和鲁朗先生的公开信，如1867年致鲁什先生的公开信是反驳他反对日内瓦世界和平大会的。《小学教师进行的法国

^① 皮埃尔·康布罗纳（1770~1842）法国将军，他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老国民自卫军的最后一个方阵作战，被勒令投降，他反驳道：“国民自卫军僵死，却不能降。”他也因这句话出了名。——译者

农业革命》(1861)是给当时的公共教育部长鲁朗的公开信。《就全国小学教师提出的问题向公共教育部长进一言》(1861)也是致鲁朗的公开信。致鲁朗的公开信小册子其主旨是初级教育应该普及。他同弗利克斯·克雷芒合作出版了《竖琴里拉乐典》或称《歌剧的源起》(1869),书中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资料,该书于1969年由达·卡博出版社在纽约重印,取名《歌剧词典》(两卷本)。还应提到的是他和F·萨尔塞合作,出版了《“凯撒传”的语史学及文学性之研究》(1865),和P·布瓦西埃合作,写出了《对法兰西学院历史词典的批判研究》(1866)。

他编的大部分教科书,一部分供学生用,另一部分也是教师指南。《教育词汇学》分三学年,第一学年本共两册,主要讲语法,书名先后是《词的种类和词的关系》(1849),《词汇学基础语法》(1852),这本书到1930年已是第87次印刷。另一册是《语法分析基础教程》(1851)到第四次印刷时改名为《语法分析大全》。第二学年本包括《文体词汇教程》(1852)和《综合语法和文学语法大全》(1868),它是《高级语法》的一部分,此外还有《逻辑分析与逻辑综合大全》。最后,第三学年本包括《高级语法》(1868)和《正字法及句法练习》(1869)。

为教学法做准备的著述有:《幼龄学生小百科》(1853)、《低年级词汇语法手册》(1853)、《词汇教学法读本》(1856),其中《低年级词汇语法手册》到1922年已是104次印刷。

与词汇教学法有直接关系的著作也很多,如《文体和作文入门》(1862),《词位的对调》(1862),《文学语法》(1867),《希腊语词根苑》(1858),《拉丁语词根苑》(1860),《法语诗体新论》(1862),《词汇学点滴》(1863),《拉丁语小议》(1862),《智力测验题目集》其中包括《蓓蕾集》(1870),《叶芽集》(1871),《花朵和果实》(1871)。

与教学法有间接关系者：《德育和智育——苏格拉底教学法》（1859），《法国历史故事听写集锦》（1883），《历史的花朵……》（1862），《上流社会及太太们的拉丁语》（1861），1874年此书改名为《拉丁语在太太们及上流社会中，小学教师及青年人的理想财富……》（1857年与布瓦耶合著），此书在1924年已是第29次印刷。在1871和1872两年中，拉鲁斯同阿尔弗雷德·德伯尔勒合作发表了《男女小学教师们的星期四》，随后，1893年又发表了《卖针的小贩》。

对拉鲁斯特别发行的一些教科书，作者本人1860年9月曾写过如下的话：“我写了两本供学生用的语法书，一本是《低年级学生语法手册》，已印刷了16次，每次印刷44000册。另一本是《基础语法》，刚刚完成第14次印刷，每次22000册。这种教学书籍在瑞士供其年轻的王子们使用。另据大百科全书增订本第一卷记载，拉鲁斯的某些著作有的一年可以出到20万册。

该词典的增订本还说（拉鲁斯本人也曾说过），他的这些教科书“在法国、瑞士和比利时已成为语法教学的基础教材。”这一点已得到证实。

在1886到1887年间出版的一本名为《初级教育的进步》，该书作者仍没有忘记那些剽窃者，他说：“对于拉鲁斯的某些著作，说起来令人惊异，在法国，甚至在瑞士和比利时，都曾是那些明目张胆的剽窃者抄袭的目标。《词汇教学法》一书，竟有人一字不易地大段照抄，幸而他们未能把原书全部抄走，有几千种由拉鲁斯设计的语法练习被抄走，但这些人又不敢全部攫为己有，于是只好剽窃其中的某一部分。”

针对一个比利时的剽窃者，拉鲁斯以他惯用的生动语言写道：“先生，当您想写一本书的时候，请您务必象我这样，也象所有的人那样，熟读拉辛、布封、孟德斯鸠、夏多布里昂、拉马

丁等人的著作。在那些著作里获得的东西才真是您自己的，但您却不然，您的做法，由于用了众所周知的一种手段，就比这大大地简便了。我使用的工具是书，您的工具则是剪刀，当我去图书馆时，您却到磨刀剪的师傅那里去。”（见《师范学校》）

但使用他的教学法的人却没有因此而受骗。从那些大量涌向作者办公室里来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赞扬作者的实践精神，赞扬他的才华，同时赞扬这种方法使学生们取得进步。在此，我们仅举一位小学督学的评价：“我越读拉鲁斯的词汇学，便越感到这一方法的优越性和功绩，正象我曾对您说过的那样，这是一种有理性和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教育方法。它对孩子们的发展提供了一块肥沃的园地。目的在培养他们的判断力和开拓他们的智慧。这本语法书与普通用的语法书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它能使一个学校结出的果实成倍地甚至三倍地增长，而教师的困难却又大大地减少了。它应在我们所有的农村学校普遍推广。”

尽管文明史和教育史专家们始终保持沉默，但拉鲁斯的影响还是巨大的。在为共和和自由时期培养人民的教育者的工作中，他不仅为免费普及教育而英勇斗争，并尽其所能以身作则地发挥一个教员的作用，同时还在教育方法和撰写教材方面彻底地使教学面目为之一新。作为苏格拉底学派的拥护者，他以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尽一切努力来培养学生的智力和判断力，并在广阔的领域内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充实孩子们的思想。在许多观点上，他走在当时教育的前面并进行了摸索和试验。他的观点，他的教学原则，以及他所采取的立场，至今仍没有过时，尤其是当你看到第二帝国时期的种种限制手段和虚伪的态度时，你更会有同感。他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由他和奥古斯坦·布瓦耶创立的书店已换了几代人，但他们都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并继续不断地迈向新的领域。

在教育领域内，他的地位应该得到确认，他的设想应该得到承认并予以研究。他的贡献是为初级教育打下了一个新的基础。他是现代法国所有小学教师的一尊金像。加斯东·博纳尔并没有被历史学家的这种沉默所迷惑，他在1964年出版的《是谁打碎了“苏瓦松的罐子”？》^①一书中谈到拉鲁斯书店时说：“如果说，为纪念小学教师的荣誉而需要建立一尊雕像的话，那么，拉鲁斯的晚年就是这座雕像的模特：他的双目正注视着从他梳洗得整齐的头上一一直向下排列的17大本书。它们整齐地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着。”这些书指的是他的大百科词典。博纳尔认为这要比他的那些融合着新型教学法的教科书价值大得多。

^① 相传公元486年在苏瓦松战役中，法兰克人（十字军东征后地中海东岸人对欧洲人的称呼）在苏瓦松的一个教堂下掘出一个瓦罐，当地主教兰斯要求军官克洛维斯把瓦罐归还。后者声明，这是他的战利品，他的一名士兵反对，并把瓦罐打碎说：“噢！大人，您应该得到的，命运会给您。”一年后，克洛维斯检阅部队时，他停在那个士兵面前说：“这里的人没有一个象你这样把武器搞得这么糟。”说着便把他的战斧扔在地上，该士兵低头拾斧时，他便把士兵的头打碎，并说：“这就像你打碎那个罐子一样。”——译者

第四章

拉鲁斯—布瓦耶书店时期

(1852~1869)

1851年夏季之前，拉鲁斯的生活中发生了一次关键性的机遇：他遇到了一位同乡奥古斯坦·布瓦耶。他二人联合创办了一家书店和一个出版公司。我们说它是关键性的机遇，是因为这两位朋友的才能一旦互相配合并互相补充起来，便足以使他们安心工作而无需担心经济问题的困扰，同时又可以自行出版拉鲁斯的著作和其它教科书。首先粗线条地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当时的巴黎

1851年，朱尔·科拉尔蒂到了巴黎，那时他才11岁。在《我的生活回忆》一书中，他这样描写当时的气氛：“我到达巴黎时，适逢变故之年，当时正是共和国总统和国民议会议长明争暗斗之时……我当时不愿看报，但政治会自动来找你，许许多多政治事件接踵而至。我看到许多漫画，也听到许多歌曲。那时候，几乎天天都有人在大街的十字路口上唱歌。而石印版的《喧声》和《谐趣报》上的漫画都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大家在咖啡馆里议论着贝塔尔的责任并评论着多米埃那支尖刻的画笔。激烈

好战的讽刺画对共和国总统丝毫不留情面。街头的歌曲，小饭馆和俱乐部里的民歌，报纸上的漫画，这些综合起来，给我的印象非常强烈，就是都反对住在艾丽舍宫里的那个人。“当时人们带着宗教的虔诚来歌唱，来祈祷，希望能在1852年，或在下一年，或在大家共同期待着的某一年，共和国总统要把权力交给人民。读者都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1851年12月2日，巴丁盖^①取得了专制政权，1852年12月2日便宣布了帝国的诞生^②。

拉鲁斯在他的大词典里，以仇恨的语气痛斥了这个可诅咒的制度：“拿破仑三世的这个凶险的帝国，在罪行中诞生，在镇压公众的自由中发展，在可耻的屈服下寿终正寝。法兰西在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之后，巴黎便失去了自由，而这种自由恰是人民得以刚强自立的力量。从此巴黎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消遣和商业性的城市。朝廷里权贵们极端的腐败堕落和享乐之风象麻疯病一样蔓延开来，而在这种道德败坏和声色犬马之上，又覆盖着一层宗教的毒雾。光天化日之下，投机活动盛行，坑害拐骗猖獗，已到史无前例的地步。迅速发财致富的欲望，促使人们去干伤天害理的勾当。跑交易所，搞投机，狡诈者扶摇直上，变成了百万富翁、暴发户……”（见大词典“巴黎”条目）。

在朱尔·科拉尔蒂的传记中，乔治·格拉普说得非常之好，他说：“正如同有两种不同的道德一样，这里也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一个是围绕在小拿破仑周围的人，他们从合法的社会地位中走出来，目的是回到权力的宝座上去。在这个集团中，有的是假面舞会，有的是秘室政治，有的是优柔寡断和醉生梦死。一个表面上金光灿灿的朝廷，却是由各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者组成的大杂烩。其中有幸运的战斗，有烧炭党人，有漂亮的夫

① 巴丁盖是拿破仑三世的外号。——译者

② 指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译者

人，有广庭深院里的夜宵，也有纵酒狂欢的高级咖啡馆……”而另一个社会则是一群热情而年轻的共和主义者，他们摩拳擦掌等待着自由的到来。他们朗诵维克多·雨果的《惩罚集》；他们虔诚地凭吊1830年和1848年为争取共和而战的旧战场。他们开始以“同志”相呼。在第二帝国统治之下，“共和国”这个名词是美妙的。站在这后一种社会旁边，拉鲁斯以好奇的眼光注视着它，并以一种憎恶的情绪看着另一个社会，看着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看着各种戏剧场面，看着各式各样的狂热，看着借债，看着经济状况步步走向崩溃。

下面几件大事记可以作为上面那幅画面的补充：1853年，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举行婚礼；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拉芒奈逝世；1855年，国际博览会在巴黎举行，内瓦尔逝世；1856年，皇太子降生，大卫·昂热埃，埃纳，米基维茨，A·蒂埃里相继去世；1857年，为罗萨莉举行安葬礼，缪塞和贝朗瑞逝世；1858年，奥尔西尼谋杀案^①发生，拉合尔逝世；1859年，意大利战争爆发；1860～1861年，米尔热，塞里布，拉科尔代尔相继去世；1862年，《悲惨世界》和《萨朗波》^②问世；1863年，维尼和德拉科鲁瓦逝世；1864年，朱尔·勒孔特，梅埃尔贝，阿歇特相继去世；1867年，国际博览会举行；1869年，拉马丁和柏辽兹去世，同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通航，霍乱重新席卷巴黎，特别严重的是1864年7～8月份，1865年10月份和1866年7月份。

以上便是当时的巴黎和法国情况。就在这一背景下，拉鲁斯和布瓦耶创建了自己的书店和印刷所。

① 费利克斯·奥尔西尼（1819～1858）意大利人。他于1858年1月14日企图刺杀拿破仑三世，未遂，被捕。同年被判处死刑。——译者

② 《萨朗波》是福楼拜的小说。——译者

奥古斯坦·布瓦耶

所有的传记材料都一致指出，奥古斯坦·布瓦耶的境遇和他的同乡拉鲁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出生在罗纳省维里埃-圣·博诺瓦，比拉鲁斯小四岁，即生于1821年4月17日。开始在家乡读小学，随后就读于凡尔赛的师范学校，经过几年的教学生涯，他于1851年到了巴黎，在这时，他与拉鲁斯邂逅相遇。

他于1837年入凡尔赛师范学校，下一年便获得大学助学金。当时这种助学金只有在全国范围内考试优胜者才能享受，是一个受人羡慕并且竞争激烈的目标。拉鲁斯和布瓦耶1837到1838年在师范学校时同学，但当时他们尚不熟悉。

1840年他在师范学校毕业后，便听从了奥古斯特·德迈兹的建议，当了图尔附近梅特拉伊农业感化院的教员。这个感化院后来成为年轻在押犯服劳役的地方。但当时它的名声却很不错，那是一种对年轻的犯人通过感化和劳动进行再教育的地方。

梅特拉伊当时是全国闻名的所在。法兰西科学院于1851年开始，专门颁发“梅特拉伊感化院诗歌奖”，路易斯·科莱经过连续两年的竞争方获得这一奖励。

但有一点我们至今仍然迷惑不解，就是该感化院有500名被管教人员，只有布瓦耶一个教员。这个岗位是艰苦的，它使人想到，可能当时布瓦耶经济拮据，而在这里工作在生活待遇上有特殊照顾（如吃饭、住房等享受优待）。

在这种条件下，对布瓦耶不久便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而辞职一事是可以理解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他走进了商界。随后不久，由于他原来的老师病情严重，他又代替老师重新当了一个时期的小学教师。老师去世后，他便最后脱离教学工作来到巴

黎（1851年）。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为布瓦耶的未来工作打下了基础。又由于他当过小学教员，所以也有教学工作经验。他后来发表的《线条画及丈量学基础教程》到1881年已是第15次印刷。

《图书目录》上对这本书介绍说：“这部著作包括70幅版画（300多幅插图）并附有文字解释。共分四章：第一章线条画的几何学原理；第二章几何图形的定线；第三章丈量学，求积法，水准测量，测绘法，并附有24幅实用而简明的插图画”（原文无第四章介绍——译者）。他后来和拉鲁斯合作出版了一本《诗歌宝库》，供阅读和背诵用。这本书到1881年也已印刷了14次。内容为300首诗选分为故事类、神话类、对话类、戏剧类、描写类；其中有宗教诗、伦理诗以及其它各类诗歌。其中道德伦理和宗教内容在这本“400多页，装璜精美的选本”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他抵达巴黎时，拉鲁斯正在千方百计设法筹备一个印刷所来出版自己的著作。当这位年轻的作家把这计划告诉布瓦耶时，得到布瓦耶的完全赞同。估计，他们的相遇当在1851年夏季之前。也正是由于创办拉鲁斯—布瓦耶书店的诱惑力，使布瓦耶放弃了进若伏莱私立学校的打算。“布瓦耶先生把他教育学方面的知识和他经商方面的杰出才干结合起来，使他成功地宣传了拉鲁斯的著作，并在教育界广为传播。此外，他还围绕《词汇教学法》一书，成功地把所有基础教材的内容汇集成一个整体，深受教育界好评”（见大百科词典）。有一篇悼念拉鲁斯的文章，对他们的合作做了详尽的叙述：“布瓦耶拿出500法郎！……拉鲁斯对这一合作的贡献则是他的活动，他的才智和他的科学知识。他们作了很艰苦的努力才出版了几本初级词汇学书籍和几本供初学者启蒙用的课本。但不久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随后，《初级词汇学语法教程》、《法语词典》、《希腊语词根苑》、《拉丁语词根苑》、《拉丁语小议》等书便相续出版，每年发行量达

到24万册，而《法语小词典》每年发行量竟达40万册。“记者们的目光是短浅的，他们以为既然拉鲁斯享有版权，并拿到了他所出版的教科书的稿费，他可能向这个书店也提供了一些经济支持。但他们却没看到他的困难时期。”

他们俩人合作共事，可说尽善尽美，天衣无缝。拉鲁斯才气横溢，是个著作家，很少过问经济管理及物资方面的事。布瓦耶思路宽阔，思维周密，头脑冷静客观，是处理实际事务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为这个新创的书店向更大规模方面发展运筹自如。书店开业之初，规模很小，1855年5月，该书店只有一名店员，他是布瓦耶的侄子，名叫艾米尔·莫罗，1841年生，当时才14岁，是该书店“唯一的店员。”

两位同乡于1852年获准出租和出卖书籍，到1862年才得到书店经营特准证书。似乎只以拉鲁斯一个人的名义开业，直到1862年11月4日才由一位名叫佩隆的，在名义上接替了拉鲁斯。拉鲁斯和布瓦耶的名字第一次并列出现，见于1852年4月3日《法兰西书目提要》。书店临时设在博马舍大街89号拉鲁斯住地。1852年10月，书店买下了皮埃尔·萨拉赞大街2号的三楼，1856年3月又搬到圣—安德烈—德札尔大街49号，因为原址位于皮埃尔·萨拉赞大街和老阿尔普大街的交叉口，为开辟赛巴斯托波尔林荫大道（即现圣—米歇尔大道）需要搬迁。这就使人们把阿歇特和拉鲁斯书店给弄混了，从而闹出不少笑话。

顺便提一句，阿歇特、拉鲁斯和布瓦耶三人也确有些共同之处。三人都是旧教育制度的叛逆，阿歇特1822年离开了高级师范学校职务，在某些方面成了后两位的代言人，他宣称：“我现在的职务是编辑，但却为教育服务，因此可以说，我还是担任教育工作。”而勃艮第的两位小学教师也是终生从事教育工作。

勤奋地工作

拉鲁斯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紧张的工作。他的一位同事曾说，他一天的工作时间在14个小时以上。1866年，他的一位同乡事先未打招呼便到他在圣—安德烈—德札尔大街他的工作处去访问：

“穿过一间大屋子，里面静悄悄地坐着许多人在写东西，有人把我领到第二个房间里去，迎面便是一个巨大的书架，上面满是书籍，大都被翻阅过，杂乱无章地放在那里，就象头一天晚上在这里进行过一场查检书籍的战斗一般。一位先生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架前边，他看上去还很年轻，一张聪慧的面孔，举止果断，手里拿着几张纸正在激动地和一个似乎前来请示工作的人谈话。”拉鲁斯给他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有点儿粗暴，当他得知来访者是他家乡来的人时，便很快地向他奔来，握住他的双手，请他坐下。并说：“我给自己规定，每天只用一个小时接待朋友。”当得知来访者是他令人请来的保健医生时，拉鲁斯向他表示，自己身体非常健康，并说，今年秋天他准备为父母举行结婚50周年纪念会：“他们两位在一起生活的年数，从岁数看已经一个半世纪了。”他父母的婚礼在1816年11月27日举行，从那时算起，到他说这番话的1866年，俩人年龄的总和是144岁。

但他们的儿子则由于劳累过度，没能象他们那样长寿。拉鲁斯对书籍涉猎之广是惊人的。这只要查一查他大词典上的条目便可一目了然。他不但阅读了大量的古籍和珍本，甚至还阅读了图书馆里所有的手抄本以及当时新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只为编写教科书和大词典，他翻阅的参考书就达几十万本。他甚至对布律内写的博大而精深的《世界指南》都能指出其错误。他积累了大量卡片并作了详细分目。为统计阿尔方斯·费伊埃一部著作里关于

“福隆德”运动^①时期的悲惨事件。他引用了不下34种报纸和杂志的有关报导，其中还包括两份英文杂志。他的著述加起来有几万页，比同世纪任何作家数量都多，还不算他写的大量书信（可惜今天多已散佚）和批改的作业。他同时还要拿出时间来接待来访，解答咨询以及从事各种研究工作……。

有时他也发出告饶的呼声：“审阅和各种竞赛的试卷已使我疲惫不堪，只这一项就足够我编一期杂志的材料，再加上我们还对编写《19世纪大词典》欠着账。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这些竞赛的内容给予一个适当的限度，不得不挑选出在某些方面有特色的文章来。”我们非常理解他的苦衷，早晨一起床就工作，一直干到深夜。阅读各种来信也是他不堪负担的一个重压：“我每天都收到数不清的信件，在信中，我的读者们征询我对他们所选择的新学科的意见。对此我表示加倍的谢意，因为这是一种对我信任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师范学校》杂志使这些读者产生了学习兴趣。但这却使我每天都有应接不暇之感，尽管我非常欢迎这些信件。我收到的信件通常都是很短的，但提出的却都是些大问题。”《历史的花絮》是一本“具有广泛知识而内容深刻并带有批判性的书，它使我们花去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同时需要作艰苦的研究工作。这部著作可使大家对我们一般的教学方法有一概括的理解，它旨在丰富我们小学教师的思维和学识。我们确信，所有的教育改革内容都包含在里面了。因此，《师范学校》杂志的名字并不是随便起的。”由于要出版大词典，拉鲁斯必须以大量的劳动来吸取各方面的知识，因此他“今天不得不向这些青年男女读者们告别，他从他们身上高兴地吸取了那么多的力量，并且祝愿他们把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奥古斯坦·布瓦耶也绝不吝

^① 即投石党运动，指1648年到1653年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

亩自己的精力。仅仅在几年之内，他便自己独立创办并经营了一家印刷所，并办得非常兴旺，不断扩大。他一人身兼会计、广告、与其它书店的业务联系、与法国人和外国人的商务联系、与作家们的联系和行政管理，并且管理得井井有条和非常讲究效率。他堪称这个新办书店得以繁荣昌盛的擎天柱。

剧作家和记者

拉鲁斯的许多头衔，便是他花费巨大劳动和艰苦努力的证明。他的一生相对地说是暂短的（52岁上健康便已受到严重损害，57岁便去世了），但却是一位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出版家、作家”（瓦布罗语）、语法家、词汇学家、字典编纂家，教科书编写家、学者、诗人……此外，还应加上两个新头衔：剧作家和记者。

拉鲁斯对戏剧一直非常感兴趣，在他的一生中，至少他对戏剧的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在大百科词典中写了大量有关戏剧的条目并且还写出了《歌剧词典》一书。象耶稣会的会员一样，他也非常热衷于组织学生演戏这一教育形式。

他曾写过一本两幕闹剧《波罗门参》或称《大人物的烦恼》。此外他还写过五个小剧，其中四个以米克罗梅加的笔名发表。米克罗梅加这个名字是从伏尔泰的一篇哲学故事里借来的，意思是“又小又大的人”^①，他代表一个性格古怪的编辑。拉鲁斯便杜撰了这么一个人来活跃他的那份教育杂志，从而使这个人在订户中名声很大，而米克罗梅加的生动、泼辣和富有情趣的笔调，也

^① 法文“米克罗”（micro-）是词的前缀，表示“微小”的意思，而“梅加”（mégas-）也是词的前缀，表示“巨大”的意思，这是两个意义上相反的词。

就是拉鲁斯本人的笔调，他就用这个名字为自己的《文法学入门》这本书写了序言。

拉鲁斯在他的教育杂志上说：米克罗梅加要到中国和月球上去作一次想象中的旅行，在他准备去月球的时候，他写来信说：

“为了减轻32万公里旅途的寂寞，我在路上将给你们写一个热门剧本，它的名字叫《一盘耳朵》，写成后将通过月球上的电报局给你们发回来。”剧本《一盘耳朵》或称《裤子的晚餐》正文前的编者按是这样写的：“这个剧本由于地心吸力的关系，以极大的速度从月球飞到地球上来了，于是我们马上便把它发表出来，目的是想把它和米克罗梅加给我们写来的宣布这条消息的信在同一期发表。拉。”

下一年即1862年，《师范学校》上发表了一个“独幕闹剧《帕特兰律师》是一个附有歌词的剧本，供寄宿学生演出之用。米克罗梅加著。”

《抱怨者》是米克罗梅加——拉鲁斯写的第三个剧本，它是根据布律耶和帕拉普拉的喜剧改编，曾于1691年2月3日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并因之使这两位作者名声大噪。其风格颇受莫里哀的影响。

《四只李子》是一出只有两个人物的闹剧，系米克罗梅加得意之作，发表在《师范学校》第四期上。

有如此一支活泼的笔，新闻事业对他不会没有诱惑力的。应该说，他首先就是一个记者，因为他曾主持两份教育杂志达数年之久，并为其中的一份大量撰稿，与此同时他还为当时的几十家报纸和杂志写过稿，可惜已找不到线索了。只在大词典“会考”条目下，我们看到1868年他曾在《法兰西信使报》上为年轻的卡劳维克辩护过。这家报纸当时颇带社会主义思想倾向。

他也确曾做过新闻记者的工作。据皮埃尔·吉拉尔说，当时

有一份名为《大报》的刊物，发行于1864年2月14日，开张很大，是个名符其实的“大报”。它大量转载各类文章，可以说集国内外各种小报文章的大成，并且每期都有一栏24直排的连载小说，其合作者之一就有拉鲁斯。

还有一份名为《小报》的刊物，创办于1863年2月1日，这是一份大众化的十分便宜的报纸，开张很小，每份售价只有五个生丁，不带政治色彩。拉鲁斯也是这份报纸的投资者之一。

专题作者和研究人员在研究拉鲁斯著作时，新闻事业是他们面对的几十种课题之一。比如他自己写了哪些文章，他对这些报纸和当时的自由所持的个人见解，他和当时的报纸、记者们之间一些饶有兴味的和富有情趣的轶事等等。这些都是丰富的、活生生的、但却是没被我们发现的材料……。

闲逛巴黎街头

在拉鲁斯眼里，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到底是个什么形象，仍是需探索的一个方面。为消除工作疲劳，丰富想象或者调节思路，他喜欢在巴黎街头闲逛，观察大街上的一切景象。大百科词典里“闲逛者”条目，是该词典里最有光彩、最为成功的条目之一。拉鲁斯是这样开始写的：“闲逛者，系属于懒汉者流的一类人，就这一意义讲，我们无需向大百科词典的读者们描述这类无所事事的人令人厌恶之处。这些人终日充塞于大都会的街头巷尾，并造成交通障碍。尽管如此，游手好闲的闲逛者，在本质上却包含着艺术价值，大街上有闲逛的人，正如烤肉店里有老板、文坛上有诗人一样，对此，我们无能为力。还有，并非所有地方都有闲逛者。”他说，大都会和象巴黎这样的城市，才是闲逛者的温床。

他接着以幽默的笔调明确指出，闲逛者分几种类型：有专门在大街上闲逛的，有专在公园里闲逛的，有专在河边上看钓鱼的，其专心致志不下于垂钓者本人。也还有专逛旧书摊的。此外，也还有专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的，还有为仰慕某几位教授的大名而去法兰西学院听课的。“在那些看来毫无目的的闲逛者中间，有一种是作学问的人，对他们来说，无目标地散步，悠然自得，实在乃是工作之余一种必要的休息，神经的放松。当你看见他们时，一定会觉得奇怪，这些人何以对当街卖艺者玩的把戏，对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竟无多大兴趣？其实他们的思想却离此甚远。他们大都是些艺术家、诗人、哲学家。他们通过这种闲逛的方式，用遇到的新鲜事物来焕发已经颇见疲劳的想象力。或者他们正在进行一个新的构思，而这些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些街头的喧闹，却可能有助于激发他的灵感。他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们的耳朵张得开开的，但他们要寻找的却与大街上发生的事情毫不相干。他们这时或许偶尔听到一句无意义的话，这句话就有可能唤起他的灵感。这些灵感是在室内无法找到的，必须马上把它们抓住。即使对那些自己的思维正在冥想中驰骋的思想家或哲学家，这种街头的喧闹场面对他们也是有用的，因为这种喧闹打进了并且动摇了他的思路，正象暴风雨搅起了大海的波涛，可以动摇他似乎已经凝固的神经。多数有才气的人都是伟大的闲逛者。他们往往在漫步中丰富着自己作品的内容，并使之成熟和发展。因为思想也和动植物一样，在不知不觉地发展中成长、壮大。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位艺术家或者诗人，当他似乎已经不再专心致志于他的作品时，反倒能更深入地走进作品中去。”通过这些叙述，我们便可得知拉鲁斯经常在巴黎街头漫步的秘密。他在积累大量的街头见闻，同时头脑中又在积极思考，并以此为作品的大厦添砖加瓦。

他对一切很大众化的东西都很有兴趣。如群众联欢、交易市场，各类游戏等等。“《师范学校》杂志的印刷所就在巴士底监狱的旁边，因此，一星期我们总有几次要到七月圆柱广场去逛逛。我们天性好动，所以从不放过去观光这个圣迹所在地的各种杂耍摊。加布里埃尔表演的魔术，直到现在我们还非常爱看。”

（见《师范学校》）

公共马车的顶层，是他最喜欢的观察阵地之一。巴黎人喜欢爬在窗口闲眺大街，而他却喜欢直接到大街上去闲逛。他不止跑大街，他还逛码头，逛林荫大路，逛塞纳河上的大桥，逛公共娱乐场所，看卖艺人的表演，看杂技，看木偶。他更喜欢乘公共马车逛大街，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到处跑，这种方式颇有点“逍遥皇帝”的派头。这时，各种风情尽收眼底：各类招牌五颜六色，各种商店栉次鳞比，马路上行人如织……。马车的顶层就是各种事物的大看台、各类观察的发源地。

他对街头巷尾的群众语言，民间习语和俚语行话都非常感兴趣。他常常把这些听来的街谈巷议加以改造，以一种崭新的口语形式运用到他的著作中去。有两个叽叽喳喳的妇女正在他窗下谈话，他也注意谛听，有时他陪女厨师到中央市场去买东西，也要把她乡音很重的话记下来。上至学者，下至卖浆者流的各种语言，三教九流的各种风习，他都认真地加以记录。还有他平时积累的巴黎各种场合，各名胜区以及大街上、广场上各类小摊贩形形色色的叫卖声，再加上他细心观察的各种商店招牌的式样和内容，各种咖啡馆的别名，各类戏院的名称和各阶层人物的特点和习惯，这一切堪称对全体巴黎市民、乃至整个时代的全面而宝贵的历史记录。

旅游和消遣

他不仅对各种事物有广泛的兴趣，他还喜欢旅游。1857年他到过德国。1858年9月，他到了比利时，在布鲁塞尔看见有人用狗拉车。瑞士曾数次接待过拉鲁斯的访问，在生病时还曾前往就医。第一次赴瑞士大约在1858年。他在那里攀登过终年积雪的登德雅麦山，欣赏过风景秀丽的莱芒湖。“当我登上常年覆盖着白雪的著名登德雅麦山峰时，我的向导向我讲了下面一个故事：1842年6月，一个瑞典青年想为他母亲采一朵阿尔卑斯山里非常著名的花，名叫蝴蝶花。不幸他累倒了，并且死去。他母亲得到噩耗便亲自赶来，在向导的帮助下，她采到了这种花，当天她就带着两样神圣的东西返回瑞典，一件是这朵花，另一件就是她儿子的棺木。”

他也可能去过英国和意大利。因为他在大词典中“伦敦”条目下，描写之详细使人相信他是去过那里的。去意大利无疑是古罗马的遗迹在吸引着他。我们知道得比较详细的，是他在自己的国土——法兰西的旅游。里昂给他留下了明快的印象：“就是在去过巴黎、罗马和伦敦的人们眼里，里昂也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大城市。凡是第一次去那里的人无不对这座城市的风光留下美好的印象。它座落在两条河岸上，并被两座山脉分成好几部分（作者原注：原文如此）。

拉鲁斯也喜欢徒步旅行。他不知疲倦地走遍了巴黎各郊区。他特别喜欢帕莱字，也喜欢维尔博、拉罗什、奥尔塞。他在这些地方还是忘不了欣赏招牌和标记。特别对小客栈的招牌尤感兴趣。例如在帕莱字“上磨坊大街”的尽头，有这么一块招牌：上面画着一个女人的身体，却没有脑袋，上面的题名本来应该是

A la bonne femme(向老年妇女祝福)但却被写成了 A la bonne fame^① 这就变成“祝你名声好”了。在另一处,他又为一个招牌吸引住了,上面写着:“O deux amen”(哦!两个阿门),实际上老板的意思是写 Aux deux amants^②(向双双的恋人们祝福)。此外,他对枫丹白露也很欣赏。

旅游,它可以锻炼和开拓我们的观察力。“不论谁去旅游,那么,一切都是他比较、鉴别的材料。”

友谊和政见

尽管他专心致力于工作,但拉鲁斯心中却有着真挚的友情。在他给一位同事的信中,有这样热情的语句:“《师范学校》自今日起把您看作它许多最具才干的合作者之一。冬日夜长,请您不时向它提供一些您深夜提笔疾书的成果,特别请您不要使我们的友谊之路上长满荒草。”

拉鲁斯有许多朋友。首先是他那些合作者。其中占第一位的,工作最有效率的,当推奥古斯坦·布瓦耶。

他也经常带着赞扬的口气提到那些当小学教员的朋友。其中一位于1864年8月15日被授予荣誉勋位勋章。拉鲁斯对此十分高兴,他说:“我们终于给一位普通的小学教师授勋了。他是我凡尔赛师范学校的老校友,20多年来非常要好的老朋友,他名叫吉米诺,现任圣德尼市小学教员。”

还有一些朋友则由于他们的政治倾向而为当时人所瞩目。如

①、② femme和fame发音相同,字形也差不多,故两个字弄混了。Aux deux amants和O deux amen 发音大致相同,写法也有相同点,也弄混了。这里主要讲郊区的小客店和小商店,人们文化水平很低,发音也不准确,故招牌经常写错,经常出笑话。——译者

朱尔·雅南(1804~1874)是当时有名的作家,1870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友谊的纽带一直把他和拉鲁斯联结在一起。朱尔·雅南曾为拉鲁斯的《拉丁语小议》写过前言,为此,拉鲁斯曾写过一封谦逊而又风趣的感谢信。

其他作家如朱尔·勒孔特(1814~1864)是小说家,尤善文学和撰写社交专栏文章。对他的逝世拉鲁斯曾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莱昂·比依安沃努(1835~1911)是一位讽刺作家,一有机会就嘲笑拉鲁斯。但他仍不失为拉鲁斯的朋友,他曾参与《激进报》的部分编辑工作。这是一份政治性很强的报纸,在编辑部里有拉鲁斯许多朋友。德勒克吕泽也是他的朋友,此人后来成为巴黎公社社员,1868年他创办了《觉醒》报。

学者、目录学家凯拉尔(1797~1865)与拉鲁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大词典中有他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此人酷爱书籍。

但有些迹象表明,这位《师范学校》杂志的主持人,是一位波拿巴主义的信仰者,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在他的办公室里挂有波拿巴的画像,他并且很认真地执行着当时那位亲王的一切指令,但在他内心里却是另一回事。他曾为1867年的日内瓦世界和平大会辩护,这次大会曾受到公共教育大臣鲁什的攻击。此外,我们知道,他也曾为年轻的卡芬雅克进行过辩解^①。拉鲁斯的大词典完全可以证明,他具有战斗的共和思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第一帝国专制制度下,他曾冒一切危险为共和制度进行过英勇斗争。

^① 法国自18世纪~19世纪有三个卡芬雅克。一个是让·巴蒂斯特·卡芬雅克(1723~1829)国民会议员。另一个是他的长子哥德弗罗侯·卡芬雅克(1801~1845)在查理十世和路易-菲力普时代是民主党领袖之一。第三个是他的弟弟路易·欧仁·卡芬雅克(1802~1857)是法国将军,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并曾被提名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但被路易·拿破仑击败。看口气,拉鲁斯可能当时曾为这个卡芬雅克进行过辩解。——译者

书刊发行人

在很长的岁月中，拉鲁斯和布瓦耶的事业是蓬勃发展的。他曾立志要作自己著作的发行人，这是一点不错的。

书店不只出版发行拉鲁斯个人的著作，它还出版其它书籍。普通读物有《怎么做和怎么过》(克拉里斯·朱朗维尔)，农业方面的著作有L·特尤赛的《直观法和自然法》，还有孩子们写的关于德智教育的散文集《新法兰西》，其它还有《一位老战士，拉丁语教学专家》，《学校和家庭文学及科学文章集锦》。关于正字法方面的有《合理教学法讲座》、《大壁报》、《动词手册》以及《简化改良速记法》等等。语法书籍当然有拉鲁斯的语法书，同时也出版了勒普蒂、卡伊安、吉拉尔等人的语法书，也出版过许多人写的拼写和听写练习等方面的书籍，关于文体学和文学方面的也出版了不少作者的书，如A·阿布朗、戈农小姐、P·居莱尔等等。

外语教学书(如英文、德文、拉丁文)有克劳德·马赛尔的教科书。此外还有算术书、会计学、度量衡、图画、几何、测量、物理、卫生保健、农业、自然史、历史、地理、音乐等书籍。随后又出版了诗歌、戏剧、教育、教学法等专著。

其出版内容之宽、著作之多，说明了奥古斯特·布瓦耶的活动能力和他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些努力大大加快了书店资金周转和出版经费的增加。书店创办之初是靠出版拉鲁斯的著作积累资金，后来便扩大了出版范围，这常常使它取得很大成功。在这些书目中，拉鲁斯的巨著大百科词典独占鳌头。

第五章

大百科词典

在雷蒙·凯诺主持出版的一部著作（即《名作家录》，三卷本，马札诺书店1966年出版，共487页）中，我们读到了对这位词典编纂家这本巨著的介绍。尽管语带讽刺但颇准确。介绍在该书中列入“证实主义者和天主教徒”门类，“对于拉鲁斯（1817～1875），我们这部《名作家录》应该给他一席之地，这样做也出于这一考虑：让著名的旅游家同火车司机握握手也未尝不可。他的《19世纪万用大词典》（1864～1890）共17大卷，对开本，是一部巨型百科词典，也是独一无二的巨著，并且永远也无需重新修订。他是一个天真的伏尔泰派，故偏见和玩世不恭之笔随处可见。该词典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加之这部作品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作者的个性，遂成为一部真正有独特风格的著作。该词典在‘巴拿马’条目下竟是这样注的：‘法国将军，于共和历8年雾月18日死于圣—克鲁。’在词典里能这样注的只有他这唯一的一本，而且敢于对波拿巴使用如此惯用而粗俗的话语者，这本词典也是唯一的一家。……”这种“粗俗的话语”在《利特雷大词典》里也出现过。关于著名的波拿巴的简历，似乎那些新闻记者们也就只记住了这几句话……。

为自己规定这样一个宏大的任务，要有超乎常人的勇气才行。拉鲁斯就把自己称作“勇敢的词典编写者”。他还说，这是一个“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大家不得不承认，在他身上有着一股一般人所没有的旺盛精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有一位同事曾说：“凡是看过该词典刚刚出版的前4个分册，而又不是胸怀偏见、利欲薰心的人，都应该看到一个不可争辩的真理，这就是拉鲁斯先生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他以一天14个小时的工作，不倦地同各种困难作斗争，而这些形形色色的困难很可能会使一个对自己的明智决定犹豫不决的人半途而废。”

这一巨著的后继者曾这样向他致敬：“我们现在才刚刚把这一纪念碑的最后一块基石放妥。当我们想到这一丰碑的设计者曾为此做出了令人尊敬的努力并为此献出了生命时，我们就只有一个念头，即努力使这一丰碑建得更好……他从事的工作是要把人类活动的成果和思想上的成就熔于一炉，这是一个宏伟而高尚的事业。他称得上一个勇敢而大胆的人！凡是见到这部大词典的人一定可以理解，这一重大的使命能使最坚决的人望而却步。但拉鲁斯却把它完成了。”

事业的起源

编写词典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很远的过去。拉鲁斯在《师范学校》第九期上向读者透露过：“朋友们，请你们再耐心点，我不会把白天织出的锦缎晚上再剪掉^①，我向你们保证，我所惨

^① 这是希腊神话中指珀涅罗珀织锦的故事，意指永远也完不成的工作。珀涅罗珀是于利斯的妻子，在于利斯外出的20年中，她拒绝了所有向她求婚的人，但她也有个条件，就是等她织完那匹锦以后，她可以在他们之中选择一人作丈夫。但她白天织了晚上便剪掉，这样她那匹锦便永远也织不完。——译者

谈经营的大词典的编写准备工作已经有20年了。这一工作比珀涅罗珀的织锦还要艰巨。”他说这番话时是1863年7月，按上面说法，这一工作开始筹划该是1843年，那时拉鲁斯才26岁。

正式提到这本词典的日子是1863年3月8日，是在一份向读者的呼吁书中，当时定的名称是《19世纪历史、地理、神话、目录学、文学、艺术、科学万用法语大词典》。下面一段话值得特别注意：“我们马上将出版一部著作，其书名已如上述，自今日起，这一书名的所有权便属于我们。我们无需对在此之前所出的各种类似著作表示意见，我们也不认为从事这一工作是轻率的。《19世纪大词典》具有大量新观点而不同于戴朗的、普瓦特万的和贝什莱尔的，它也和利特雷先生的和法兰西学院的词典不同。这部词典目前正在临盆过程中，对19世纪的文学、历史、地理、科学和艺术，这部词典里都有一概述并介绍其全貌。这部‘词汇大全’将印成开本200余册。各位读者，在你们各自辛勤工作的岗位上，必然保存有各种笔记，发现有在词典上找不到的词汇和词义解释，那么请你们把自己所占有的这一方石料添加到我们将要建造的美丽的法兰西语言的殿堂上来吧。由于你们智慧的光芒，法兰西将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逊色。在这方面，用本民族语言写的一部首开记录的大型著述自然会显得比较单薄的。”

不错，利特雷词典的前几个分册发表于1863年2月，作为拉鲁斯词典轴心的词汇部分这时已搭好了大架。所有的百科知识都将围绕这些词汇来安排。

4月16日原稿交付印刷：“它总量不下3000页，大四开本，四直排，每排120行。如印成八开本可印200个分册。该词典在浩繁的题材中提供了大量必要的资料，这为当时任何一部词典所没有，甚至在任何一本书籍中都难以找到。这部词典将以25印张（200页）为一分册，分批出版，共15个分册。每分册售价5法

郎，全套为75法郎。预订本词典的前1000名订户予以15法郎的优惠，另外还以奖励的名义每人可得到一本《拉丁语小议》或《历史的花束》（由订购者任选一本，每本售价10法郎）。这么一来，一部大词典只有50个法郎了（15法郎的优惠再加10法郎的1本书）。作者原设想，他的这部著作可能有4000页。然而全15卷大词典最后印成共20700页，于是第一批订户就捞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大便宜：只用50法郎就买到一部不久要用650法郎才能买到的大词典！大家知道，采取这些办法，奥古斯坦·布瓦耶是不以为然的……在另一本私人笔记中，拉鲁斯讲出了他的想法，即他希望这头1000名订户都是他杂志的老户头，这部大词典又是他一生辛勤劳动的检阅，而且很可能这就是他最后一部著作，他认为能够从他的读者中得到这一热情的表示。他在这一笔记中说，八天以前上述讲的优惠内容便在欧洲各大报纸上登了出来。

5月3日，事情已经到了必须改弦易辙的地步：第一批预定者由交付60法郎改为80法郎。因为他在宣布60法郎的价格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我对手稿作了仔细地检查（这些手稿码起来，有巴黎圣母院的两层塔那么高）我才发现，这个价格刚刚够我买纸和排字的费用，但是它又要出10000套之多！”尽管如此，他还是向订户声明，5月17日以前的订户仍维持60法郎的价格不变。这里拉鲁斯表现了他正直无私的品质。一个没有私心的空想家和一个江湖骗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5月10日，作者明确表示，法兰西语言不能因他的作品而降低身价，语言部分是他作品的基础。他举“朋友”一词为例，并与朗戴词典、贝什莱尔词典、普瓦特万词典以及利特雷词典中的这个词作了比较。他说：“一部这样的著作，有如一间屋子、一块土地、一件家具，要获得它自然要付出某些代价。”他的结

论是：“这是20年辛苦的结晶，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清晨一起床就工作，一直到很晚才休息。今天，我们的工作已经就绪，20余位工作人员正在对词典进行最后的加工，他们当中有巴黎市最权威的校订家，他们正在为这部作品涂上最后一道釉彩。”他对被他称为朋友的那些人给予最后的优惠：60法郎可以分四次付清。仅为写“蒂莱姆”^①这一条目，他就查遍了戈蒂埃、奈特芒、蒲鲁东、尚弗尔特等人的著作。类似的条目在词典中就有1000条之多。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啊！当时（1863年5月）词典的订户只有300人，“其他人都象一支胆小怕死的军队，他们都匍伏在河岸上观望，不敢参加夺取耶里科^②的战斗。”预订价格不久便实行前5000名每人付100法郎，预订工作将于10月10日结止。随后又改为“到第一分册出版时为止”。

10月4日，他在《师范学校》上向妇女们呼吁：“各位女士！今天我要给你们一些行话和土语，就是说，它是下层语言，是大众化的、粗俗的、大杂烩式的、随时都能听到的语言。但是请不要害怕，请放下你们的扇子，我知道《师范学校》承担着何种义务，并且，为不使你们看到剩牛奶，我将把奶罐刷干净。”随之他便介绍了他大词典里有关的词汇。比如，什么是“美国式的盗窃”，什么是“贵族气派”，什么是“女才子”，什么是“装烟草的小荷包”，什么是“加勒比海地区的薰肉”，“鸭子”这个词有多少种引伸意义等等。就这样，他“把最严肃的东西和最富戏剧性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把笑声和眼泪结合在一起，

^① 蒂莱姆 (Théleme)，拉伯雷小说《巨人传》中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性质的社会团体。——译者

^② 耶里科，公元前7世纪时约旦的一个城市，在此曾进行过数次激战，数次被毁又重建，最后一次被敌人围困于公元前1400年至1260年之间。——译者

把福斯泰夫^①的滑稽诙谐和布鲁托斯^②的尖刀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拉鲁斯的风格：不拘礼节，带点莎士比亚味，单刀直入，大胆又非常通俗。然后，他号召大家多向他提供一些俚语行话及有助于词典编写方面的资料。

尽管他做了这么多努力，但词典的预订者始终不甚踊跃。

1863年12月27日，终于发表了所谓“奥斯特里茨内部通讯”，该“通讯”用大字标题写道：“《19世纪万用大词典》第一分册今起（12月27日）出售。”据《师范学校》介绍：“第一分册售价1法郎，外地订户免费邮寄。本分册不少于23000行相当于八开本三卷的容量。本分册最重要的词条为‘科学院’一词，释文有1200余行。不仅《师范学校》的老订户们乐于订购这一精美著作作为自己的工具书，它还向男女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普遍的机会，因为他们也喜欢买些新颖而实用的东西向父母们炫耀一番。本杂志这一消息宣布以后，便被普遍认为是一可靠的报导，因之自1864年1月10日起，巴黎各报，外省报纸，乃至国外报纸便开始报导和评论有关这部词典的事。在字母A的部分，这部词典在各种动物图像中^③加进了一幅精美的亚当画像^④，是当时首都第一流木刻家的杰作。”由于当时的报纸和《法兰西图书目录》在1864年才开始报导，我们认为可以把这一年定为该词典正式诞生的日子。至于说1863年12月27日开始出售，尚属内部消息，只供“朋友”们购买。

1864年1月17日，又出了新公告，这部词典将分100到130分

①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一个肥胖、诙谐而欢乐的滑稽人物。——译者

② 布鲁托斯，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一剧中的角色，是他带领一些人用利刃将凯撒刺死。——译者

③ 法语“动物”一词（Animal）字母开头是A。——译者

④ 亚当（Adam）字母开头也是A。——译者

册陆续出版，“首先每月出一分册，以后每半月出一分册，最后每周出一分册，在四年之内整套词典印刷完毕”。作者并公布了一份订购者名单，声明第一分册将免费邮寄。实际上词典印完共出了524分册，1875至1876年间才最后印完。其时作者已经逝世。1864年4月17日前四个分册开始出售。“这是唯一的一部万用词典，其内容比目前最完备的词典要多三倍。这又是一部号称可以代替各类书籍的巨著，资料之翔实，内容之广泛，目前任何一部词典都无法与其相比，甚至任何一本知识书籍都没有它内容完备。每页用新体字排四直行，每行120行。相当于八开本400册的容量，每分册40页。”实际上它相当于850部400页的小说，有48300万个印刷符号。

1866年，《声誉报》杂志发表了拉鲁斯的两份呼吁书。第一份有他一贯的文字特色，题目是《向杰出的艺术家们呼吁!!!（三个惊叹号是原有的）向善良的艺术家人呼吁》，内容是为他词典里两幅插图提出征选要求，原文值得引用，因为它是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发表的：

“大词典的作者拉鲁斯敬启：本人刚刚写完波拿巴传略（波拿巴是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也是最光辉的名字，但拿破仑除外），为丰富词典释文内容，作者谨掏心香一瓣，吁请海内艺术家制作两幅版画插图。一幅是《在博盖尔的晚餐》，一幅是《梅乐里的岩洞》，因为年轻的波拿巴当时还不满19岁，就喜欢在这两幅画前沉思。凡草稿入选者，每幅敬奉500法郎。评选委员：法兰西美术学院前校长布朗、法兰西研究院士热罗姆、大词典艺术门类编写参加者马里尤斯·肖梅兰……”。一幅画500法郎，试想，开始时作者只要60法郎便把大词典售出，就不得不承认作者是慷慨的。

1866年8月25日，星期六，《声誉报》杂志上又登出了《再

向当代著名人士呼吁书》：“《19世纪万用大词典》由于编者的疏忽，甚至令人遗憾的错误，其中一小部分目前正在加工修订中。本百科全书的作者并非没下功夫，十年来，他采取必要措施以避免错误或笔误出现，不幸，目前并未全部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而要求早日出版呼声强烈，为此作者谨吁请海内作家、艺术家、政界人士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凡其大名可列入本百科词典者，请把生平、著作、及贡献详细写出，惠寄本作者。关于个人好恶及门阀观念，本词典一律不予介入并为本词典所不取。本作者重申忠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不朽原则，而对于历史的真理，本词典将给予完全地尊重。本呼吁书也已发往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的著名人士并已收到大批资料。而在我们法国，既然本词典的出版被认为是最引人注目而轰动一时的大事和最有用的书籍，那么我们就应该收到更多的资料。时至今日（1866年8月20日），本词典已进行到字母B的一半，作者以万分感激的心情开门以待，企望着大批资料的到来……”

这两份呼吁书当然要由作者按启事声明规定付款。第二个呼吁可谓别开生面，拉鲁斯坦率地承认一开始就有疏忽和错误，而且毫无顾忌地亮出了他的政治色彩。他收到的各类信件可惜保留的不多。其中有些就是有关人士写的这类简历。其中不乏生动有趣之作。如果《小拉鲁斯词典》开始时也发表这类呼吁书，那它会被这些文章所淹没的。

就在这同一年中，发生了一个颇有意义的故事：“大百科词典在1866年已进入字母B的撰写工作。当时弗勒雷将军 *l'alter egr de Napoléon III*”^①到圣—安德烈—德札尔大街的工作室去见拉鲁斯。在场的许多文学家都认识此人，他径直走到拉

① 拉丁语，意为“拿破仑三世的另一个我”，意指他是拿破仑三世的近人。

——译者

鲁斯面前问：将在什么思想指导下编写“波拿巴”^①条目。拉鲁斯把手稿拿给他看，这就是那个曾受到许多人非难的条目，特别是别开生面的开始那几句。波拿巴家族的传记是一篇颂扬文章，而且材料翔实可靠（这个条目最少不下于125直行）并没有使上流社会人物看了不满的地方。于是弗勒雷将军说：‘非常好，可你打算怎么写拿破仑呢？’拉鲁斯回答说：‘哦，那我会非常严肃对待。再说，我是喜欢自由地工作的，如果有人为我制造困难的话，我已经作好到比利时去的打算，我将在那里按我原来的意图，安安静静地完成我的写作计划。’他对自己的这个回答非常满意，弗勒雷将军也没有再问下去。后来他又来访问拉鲁斯，竟然说他已经建议给拉鲁斯发一枚十字勋章，但拉鲁斯为了不使自己的手脚被束缚，拒绝了这一荣誉。当词典编写到字母N时^②，他已经无需去比利时了，其时第二帝国已经寿终正寝。”但在荣誉勋章档案记录中，没有留下任何关于拉鲁斯拒绝受勋的记载。

我们综述一下词典进程的具体时间，以下日期是准确的：1866年第一卷装订成册，1876年最后一卷完成。其时拉鲁斯已逝世一年了。1878年增订本第一卷出版，1890年增订本第二卷出版。该词典从第一分册的出版到最后出齐是自1864年起至1876年止。增订本第二卷（共2024页）在1888年起到1890年完成。拉鲁斯于1875年1月3日逝世，因此，他死后又出版了三卷，而不是如有的人说，他死后出版了一卷或两卷。

自头几个分册出版后，一些心怀嫉妒或是别有用心的人便把谣言扬得满天飞，说什么这部词典永远也不会完成，说什么作者的胃口太大了等等。大家明白，这攻击的目标自然不是作品本

① 拿破仑三世属波拿巴家族，开头的字母是B，当时大词典正在编写这一部分。——译者

② 拿破仑法文字母开头是N。——译者

身。因此，1864年12月18日，拉鲁斯便以他特有的笔法起而自卫，可以说是穷追猛打，毫不容情。他在一份自由主义的报纸《时代日报》上写道：“这一工作能完成吗？……”，“我不敢说，老是纠缠能否完成是没有意义的。我在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之下，曾对本报编辑舍雷先生说过，为编写本词典，我花了20年的心血，而且我还要理直气壮地对他说，该词典的编目部分、历史部分、传记部分、地理部分、神话部分和文学部分都已完成。依据字母排列的顺序，我已经从17世纪和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各类作家的作品里摘录了100多万条有关的词语。舍雷先生（我绝不否认他的天才）也曾从这些作品中抄录了许多有关的资料用于自己的著作中。”接着拉鲁斯便严厉地痛斥了某些文学评论家：“批评家这一职业，千真万确是个美妙的职业，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作家们，他可以凭自己的好恶给他们穿上漂亮的服装，也可以把他们扒得赤条条的一丝不挂。他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在他们身上涂上各种颜色，也可以为他们的作品修枝剪叶，还可以把这些作品肢解，并且是随心所欲、不负责任。但是也应该允许那些不幸的人有叫喊两声的权利吧！？不错，作家们容易激动，这是任人皆知的，难道因此就连他们辛苦种植起来的作物也被看成一钱不值的東西了吗？”就在这篇文章中，他顺便指出了利特雷大词典的不足之处，即它对一个词的多重含义缺乏详细的分类：“只要一个词的引伸意义和转换意义与该词的本义稍有接近，利特雷先生就把它各种例句放在本义中去。”舍雷先生对自己的做法后来曾公开认错。并且是第一个对拉鲁斯这部巨著给予热情赞扬的人。

维克多·雨果和蒲鲁东的支持

1864年7月2日《声誉报》发表了一封信，其按语如下：

“我们以极其愉快的心情向读者推荐下面这封信，它是维克多·雨果写给《19世纪万用大词典》的作者拉鲁斯的。”全文如下：

先生，您所寄大词典前四个分册已收到。您的计划是宏伟的，您的理想是崇高的。就我收到的这几个分册看，堪称尽善尽美。您为19世纪建立起一座名符其实的丰碑。集19世纪人间智慧的结晶于一书之中。这是一个美好的和伟大的创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经过反复地、艰苦修改，经过数不清的对新旧书目的翻检和探索，您终于拿出了足可与狄德罗宏伟的大百科全书相媲美的一部巨著，甚至比他的更全面、更宏大。这部巨著的完成，对出版者来说，无疑将是一笔财富而对作者又是一个荣誉。在此我谨祝愿您更多地吸取新鲜思想而不要顾惜旧的残余。当然，要完全摆脱这种旧思想的束缚是困难的，特别是进行这样一种工作，要摆脱它尤其困难。先生，毫无疑问您将是这笔财富和这种荣誉的享有者。我们目前几乎所有的人名词典和大百科词典都是在一种与本世纪对立的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因此，它们的成就很小，而未来将对它们不屑一顾。而您，却是在为人类的进步服务，您是在创造新的成就，您一定能成功的。只要您和当代联系得愈紧密，您的成就就会愈大。愿您再接再厉！

我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您的工作。请接受我的祝愿和祝贺，并向您表示真诚的慰问。

维克多·雨果

——4月20日

这封信是对这部新诞生的词典一种有效的保护，也是毫无保留和极端热情的赞扬，因为这位伟大的诗人是当时一代青年思想上的导师。这证据可以在同一期《声誉报》弗雷德里克·莫兰的文章上看出。作者提到当代新文学青年的思想时说：“现在我们将谈谈大学生的文学观点，他们最喜欢的作家是维克多·雨果，

即真正的维克多·雨果，亦即是说第二种意义上的雨果。这位诗坛上的皇帝，他不仅完成了一次永远令人纪念的文学革命，而且最终达到了在他社会影响所及的范围内，使人们对这一革命得以充分理解。”这篇文章经常使用“革命”一词，这是在文学领域的各个部门里都已完成的革命，而维克多·雨果则是这一革命的象征。拉鲁斯的大词典也已在这一普遍的和具有共同性的事业中取得了它自己的席位。

1864年8月20日，蒲鲁东也给这位词典发行者写了一封信，此信发自帕西，如下：

先生，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D先生的转达，我收到了您这部巨型词典的前7个分册。第一分册我早已有了。我不仅对您的成功表示祝贺，我更为欣赏您的勇气和您对科学的献身精神，这就是拉鲁斯精神，它没有在这一事业面前踌躇不前。在我病体康复期间，我对词典中几个条目大致浏览过一番，越看我越惊异于您竟能把如此浩瀚的材料收进您的词典。我并且怀着真挚的喜悦之情获悉，您已解决了这些分册印刷的经费问题。这使我不止一次地感到，我们的民族绝非死气沉沉。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民，一个渴求科学，并且想利用各种渠道来获取它的人民，绝不会放弃其肩负的责任的。

您寄给我的“克制”和“无政府主义”两个条目的释文我已拜读。您在这两条中提到我，在此谨致谢意。遗憾的是，您写这些条目时我未能亲自做些解释。关于“克制”一词，我好象对您提到过我在字典里查到的某些比较肯定和比较有决定性意义的解释。至于“无政府主义”条目，我认为您写得非常之好，是第一流的。我原想通过这个词来表示政治进步的终极界限。“无政府主义”，不知我这样解释是否正确，即它是政府的一种形式，或者是一种政体。在这一政体中，公众的和个人的信念（这种信念

是通过科学和权利的发展而形成的)能够维持社会秩序和保证各种形式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当局的权威、警察机构的各种预防手段或镇压手段、官僚制度、税收制度等等,都被压缩到最简单的形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极权主义的各种形式和高度的集中都被一种联合性质的机构和公社化的道德观念所代替,从而导致消亡。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将受到同化;经济问题的解决、社会的和个人的利益将予以平衡并被视为一体。很明显,各种强制手段将会消失。那时我们将会得到完全的自由,或者称为达到了理想的境界。社会法令将会自动地通过普遍的自发性来完成其使命,无需由人监督和施以行政命令。当您以后编到“上帝”和“财产”条目时,请您务必事先通知我。现在有些这样的命题:“上帝,就是邪恶”,“财产,就是盗窃”。到那时您将会收到我与这些有悖于常理的命题不同的意见。我坚持这两个条目的释文应按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我决不为这样一件事便去亵渎上帝,也不想为此而废除私有财产。

先生,请接受我真挚的敬意。

信中说的“共同的朋友”可能指的是阿尔弗雷德·德贝尔勒,他是后来大百科词典的主编。

维克多·雨果和蒲鲁东的信发表于1864年,正是大词典的出版时期,这两封信无疑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荐作用。

拉鲁斯的宏图

大词典有几句题词对我们了解拉鲁斯的意图有重要意义:“词典是一个民族的文学成果,其基础,包括各种坚实的基石,乃是伟大建筑的一部分。”(迪庞卢),“任你说东道西,我自安之若素”(法国格言),“要诚实,一切都要诚实,诚实就是

一切”（刑事法），“这就是我骨骼的骨骼，我肌肉的肌肉”（亚当）。最后这一句，拉鲁斯经常引用，（勒南也曾引用过），特别是在大词典编写过程中，但在以后的版本中（他逝世以后）却被删去，可能因为它太古老了吧，这句话被认为不太得体，颇有亵渎圣贤之嫌。总之大家对这些题铭是很严肃的。

在前举维克多·雨果的信中曾提到拉鲁斯的作品“足可与狄德罗宏伟的大百科全书相媲美”，“甚至比他的更全面、更宏大”。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部著作是勇敢地接近了这一评语。就其百科全书的特点来说，其接近程度比利特雷词典更近一些。拉鲁斯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是狄德罗之后的第一人。

在词典前言中，他无保留地赞扬了两个人：培尔和狄德罗。他赞扬前者面对哲学和宗教体系，敢于持批判的怀疑态度以及其独立见解和胆量。拉鲁斯针对培尔的诽谤者起而保卫了他，并认为他做了建设性的工作：“他的词典是1789年大革命光辉的预兆。”培尔以热爱工作和具有宽容的态度而受人尊敬，他也以其高尚的品德和不受任何宗教信仰的束缚而被人们所称道。“培尔的怀疑，是宗教信仰在理性面前的屈服，是超自然主义的溃败，是神圣的控诉书，是神职人员必不可免的结局。”《19世纪万用大词典》把《历史和批判词典》看作是自己许多光荣的先辈之一。

前言还以高度的热情介绍了狄德罗和阿朗贝尔的大百科全书：“该书包罗万象，但标题却只用《百科全书》这样简单的几个字表示，正如罗马曾简单地被称为‘城市’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只简单地用大写‘革命’二字来表示一样。我们向这部不朽的作品表示敬意。正象我们第一次瞻仰先贤祠，第一次瞻仰罗马的圣一皮埃尔和巴黎圣母院一样，我们也在这一人类知识的宝库面前脱帽致敬乃至顶礼膜拜。请大家谅解我们这一出自内心的纯朴感情吧。以

我们这些小人物（天才人物当然除外）而言，这个被称为“18世纪百科全书的每一行字，都能使我们头脑清醒，每一段落都能为我们指明方向。这样一部巨著的产生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拉鲁斯通过自身的经验深深懂得，狄德罗的工作意味着什么：“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凡是写过这些东西的人都知道它的分量。他经过20多年的个人努力才写出这样一部大词典，在这20余年中他每日每时都在为这一工程添砖加瓦，尽管如此，它仍然未能尽如人意。”

他用了整整一页的篇幅来赞扬狄德罗这位“强有力的思想家”。“他与任何其他人都不能相比，而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和他相比”。他详尽地描绘了狄德罗全面的才能，高尚的品德和善良的心灵。他甚至还仔细地描绘了这位理想人物的外貌。无疑，他是以第二个狄德罗自居的。而这两位相距一个世纪之久的百科全书作者也确实有许多共同之处。“本文作者完全了解这位伟大的百科全书作家所经历的艰险路程。他在对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出现各种意外和困难做了防范之后，才敢向着这块险地迈出他的第一步。尽管做了防范工作，但在他的头脑中却也从未犹豫过要承担一个发行者从未遇到的沉重责任。而支持他的精神力量，则出自他称之为尽‘义务’的信念，即要在人世间接一点好事，而要做成这一点好事，又必须有坚强的和诚挚的信念。此外，请大词典的订购者们尽可放心，他们绝不会有作者这种类似的灾难。词典的作者对于自己便是‘印刷人’一事将予慎重看待、谨慎从事。铅字是他自己的财产，印刷所是他自己所办，他每周都亲自为印刷工人发放津贴，当他签上‘可以付印’字样时，任何人也不敢改动一个标点，更不消说更动整个段落了。”这一说明使我们明白了在他搬到圣母广场大街（1869）以前，他已经有了自己的铅字和印刷车间。在这里工作的20个印刷工人都是由他本人来发工资。我们保留的

该词典第一次印刷本是在科贝尔出的，那么是否可以设想，拉鲁斯每周都要到科贝尔去为那里的印刷工人发工资呢？……

在词典里“吊刑”条目下，谈到“老吊刑街”时，拉鲁斯说，狄德罗曾在这里居住了很长时间，因此他坚持改名为“狄德罗大街”。

对伏尔泰的《哲学词典》，其赞美之词便见得少了。在拉鲁斯看来，伏尔泰缺乏深度，由于过分地强调反基督教便使他显得肤浅，并因而受到局限。他说：“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人们承认具有渊博知识的人为至高无上的天才。根据这一说法，伏尔泰算不得至高无上的天才。他的过分讲究分寸和讲求绝对准确排斥了渊博、广大和深刻。对他来说，广阔只不过是影子和神秘莫测的东西。”“不能要求他对基督教有一个公正的和不偏激的态度，也不能要求他对所有或多或少与圣经和教会有关的事物持这种态度。面对基督教，伏尔泰已失去了一个批评家的风度，失去了哲学家的风度，甚至失去了艺术家的风度，而变成一个活动家、一个好战分子、一个攻击文章的作者。他可以把任何东西都拿在手中当作攻击的武器。到这种地步，他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他的致命伤。正因如此，他便常常招致物议，引起各种笔战。他为能找到强有力的论据而不顾其价值，为取得笔战的胜利而不顾真理。”

词典的长篇前言（大四开本，共76页）并不只限于对培尔、狄德罗和伏尔泰的论述。“要了解和评价拉鲁斯本人和他的作品，仔细研究那篇72页（作者原注：原文如此）的前言是最好的途径。”（见莱昂·诺埃尔“在纪念拉鲁斯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前言在回顾了历史上各类词典以后，接着便列举了当代各类词典。拉鲁斯对《法兰西学院词典》是有保留的，还提到了弗尔蒂埃尔词典和利什莱词典，用两页的篇幅介绍了利特雷词

典，他对这本词典词语的顺序和版面的安排提出了批评。随后又介绍了培尔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接下来便是对《文学的法兰西》一书的评论和对皮埃尔·勒鲁和让·雷诺的《新百科全书》的评论（对这本书，拉鲁斯的大百科词典并不承认它是自己的先驱）以及对布耶等人的许多著作进行了评论。随后前言又介绍了大量的传记著作以及外国（英国、德国……甚至还有中国）有关这方面的著作。

在本前言中，拉鲁斯明确地解释了他原来的意图。法兰西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摸索之后，重新恢复了自己真正的政治和哲学传统。在这一时期，科学和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于是他便起意把这一时期有关的言论、活动和著作等等浓缩在一本书中。他解释说，他的词典首先是一本语言词典，和利特雷词典相反，它优先大量容纳本世纪作家，重视比较语法和语言学的新发现，随后才是比较神话学、历史学（“这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独立撰写的传记、旅游、各种科学知识、以及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等学说。这部词典有极大的新颖性，别具一格。最后词典前言又以数页的篇幅提到了“地位低下的工人”，词典出版的公证人，他的许多合作者，以及对蒲鲁东进行了最后的赞扬（因蒲鲁东于当年即1865年1月19日逝世），他还起而对那些不公正的攻击进行了自卫：“我们的奢望仅仅在于证明我们对这部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并非是工业主义，同时也旨在坚定我们订户头脑中一度动摇了的信念。我们的法令和道德风尚（愿上帝祝福！）始终都赋予受到不公正攻击的人以豁免权并允许他进行自卫。在此我们大声疾呼要求享有这个越发显得神圣的自由权利。我们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做法却受到怀疑。今天，这个大都会的大街小巷都充满了唯利是图的气息，在这一气氛中，在这个不健康的时代里，作品的出版完全变成商业买卖，道德情操不值一文，招摇撞骗却大行其

道，在这种情况下，在这19世纪的今天，人们就很难相信会有那么一个傻瓜，竟把自己的一生贡献出来，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甚至把自己的健康也牺牲掉来完成一部诚实的和自信的著作。对这种作法，那些人既然不能把他看成一个禁欲主义者，于是便千方百计把他说成是一个文学上的江湖骗子。一个把自己的饭碗放在别人的轻信上的江湖骗子。于是，我们的心头便经受着沉重的压力。但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将为我们个人的这些琐事恢复名誉。到那时，即使在最挑剔的人眼里我们也是无辜的，但在今天，我们受了损伤的自尊心却强使我们不得不对此进行追究。”

如果想用几个字把这部刚开始的著作的特点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它力图做到多用、民主、诚实、自由而且新颖。

“万用百科”，是该书的宏旨。在前言中列举了该书所涉及的学科和门类不下76种，而且还在后面加上了三个“等等”！

“一部万用词典，它包括了所有被提到的、被使用过的、被写成文字的、被想象出来的、被发现的和被发明的各种科学，它当然是十分有益的。它的目的在于适应多种需要，如果各学科的研究者每人手头都有这么一部，那将是很实用的。”我们后面还将会看到，这部包罗万象的万用巨著的出世曾轰动一时。

写这一巨著的另一意图，就是使其具有民主性^①。因为它的对象是所有的人。“我们的读者包括各阶级里面的人，不论他们年龄大小，也不管他们的趣味高低，我们一视同仁。我们的愿望是，不论是学者还是白丁，不管其严肃还是轻浮，不论是老人还是孩子，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参加这本《19世纪万用大词典》为他们举办的巨型宴会。”拉鲁斯为人民做好了民主和真正自由到来的准备。

^① 这里讲的民主性，实际上是指人民性。本书作者和拉鲁斯本人在谈到“民主”一词时，有许多地方都表示了人民性这一含义。——译者

他特别强调，他的词典应有“善意的真诚”。崇拜真理、公正、尊重和容忍，是他经常用的词汇，尽管其词典的内容同这些词汇的含义稍有不符。“唯有信念才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我们没有篡改历史，我们只是把历史如实地反映出来，而不去考虑该历史事实是否应由某一党派承担责任或为某一党派所利用。‘我们的生命为真实负责’，这就是万用大词典的格言。”

谈到自传时，他引用了伏尔泰的名言：“人们欠活人的债是尊重，而欠死人的债则是真理。”拉鲁斯在词典里绝对服从历史铁面无私的公正。“我们是为那些想学习，想受教育的人而写作。我们出版这部《19世纪万用大词典》绝不是ad usum Delphini^①。”此外，他在另一个地方还说，这部词典“有那么多卷，因此，没有一位读者想把它买来作为做弥撒时用的经书。”

与此有点矛盾的是，拉鲁斯声称不愿意把自己的旗帜放在口袋里作手帕用。他是一名保卫大革命的思想战士：“大家肯定会承认，本词典的问世，如果不是天才所结的硕果，起码也是对科学和进步努力不懈地探索的结果，因此，也就无需多说是什么思想在始终指导着并鼓舞着我们对词典的编写工作了。……我们是这么一种人：目光始终向着未来，善于给过去以正确的评价，绝不抱怨，但对那种不择手段企图把已推倒的废墟重建起来的人，他们是反对的……1789年培育出的幼芽是扼杀不了的，如果它能够被消灭，可能早已被连根拔除了，它正象那些灵活的弹簧，你向下压这一边，那一边又弹了起来。它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受到隐藏在乱草丛中的强有力的增殖体的侵害时才会被扼杀。这种增殖体总企图在几天之内夺回失去的几年的光阴。太阳有时要被月

^① 拉丁语：“为路易十四的皇太子所用。”这句话出处如下：人们为路易十四的儿子出版了许多最有名的拉丁语经典著作，供他学习之用。但在这些著作中删去了某些过于粗俗的段落。后来人们使用这句话来挖苦那些为了某种需要而经过删削和改写的出版物。——译者

亮挡住，自由也有这种现象，只有到彻底摆脱一切羁绊之后，这位伟大的流放者才能大放光明，从而驱散一切在黑暗中活动着的牛鬼蛇神。”在第二帝国统治之下，在一部巨著的前言中敢于写下上面那些话，没有足够的勇气是办不到的。正如他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要勇敢地去争取‘思想的权利’”一样，同样需要勇气。在大词典最后一卷即第15卷的后记中，他用一句话来概括该词典的指导思想，写的仍然是那句话：1789年的幼芽是扼杀不了的。

拉鲁斯特别注意突出词典的新颖性。标题开头“19世纪”这几个字便指出了它的“新”。其内容有许多新增加的部分如各种文学形式和各类文化名人，当代英雄人物及小说，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漫画，各类传记，法文的、拉丁文的寓言故事及神话，各类艺术作品及其评论文章。至于对新颖性的解释，在“趣闻”条目释文的最后，可看出大意，但拉鲁斯却没有来得及把它尽善尽美地搞完。

为归纳拉鲁斯的编写意图，我们不妨引用乔治·莱格1894年在土西纪念碑落成典礼上的讲话：“先生们，大百科全书尽管有许多人参加编写，但它绝不是没有个性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始终贯穿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作为孔特和蒲鲁东的信徒，拉鲁斯坚持以事实为灵魂，并以事实来作科学研究和科学问题争论的是非标准。它是连接这座科学宝库的各个不同结构之间的水泥。这一标准使拉鲁斯取得了他一直在追求的整个著作的统一。”

合 作 者

参加大词典编写的人以数千计。其中的一位便是阿道夫·拉科（1840～1887）他在拉鲁斯的一份传记（收入《昨天的人物》）

中证实了这一点，并且说：“在今天巴黎报界的大量记者中，可能不下50名都向大百科词典提供过文章。”对这些合作者在此役有必要一一提名。拉鲁斯准备编写全部完工后再一并向他们表示谢意。他曾在一篇文章中以他特有的坦率和真诚提到过此事：

“即使一位将军已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即使他在战斗之前仔细地检查了所有的前沿哨所，即使他和士兵们吃的是同样的大锅饭，也不能就说，胜利的夺得是他一人之功。那些上尉和中尉的名字将和他的名字一起写在第二天的战报上。同样，象这样一部大词典也绝非一人所能完成。诸如历史、哲学、政治、科学、美术、语言、文学等学科，由一个人依次写下去也是不可能的。同样，拿破仑一个人也绝不能赢得奥斯特利茨战役。不错，在另外的情况下，他可能一个人能输掉这场战斗，但逆定理往往是不适用的。因此，在我们这份战报上应该写上我们那些辛勤而博学的合作者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现时的编写工作距胜利到来的日子尚远，我们只不过处在那些热烈的日子开始的第一个小时，因此我们只能简略而空泛地提一下。待最后一卷完稿时，我们的敌人将全线溃退，也就是说，所有的障碍都被我们克服之日，我们将重新把参加这一工作的每个人的名字写进已完成的著作中去（这也是我们非常乐于完成的一项义务）。在这一工作中狄德罗将是我们所遵循的样板。我们的才华远远没有他高，但我们却羞于在正直和无私方面甘居其后。”下面便列出了27个人的名字。当然还应该再加上第15卷和增订本第二卷的后记中提到的名字。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大词典名人条目下占了一席之地。

参加编写的人员中有一些是医生和兽医，还有许多教授、学者、古物收藏家、作曲家、东方学学者。一般地说名流不多，但他们大都是学识渊博、工作勤奋、严肃认真的人。他们当中有一开始就参加工作的同安德里厄一样后来成为公社社员的路易·弗

约、瓦莱斯、韦莫雷尔，还有一些优秀的词汇学家如布瓦西埃，著名的音乐家（克雷芒、布冉）、教育界人士（里亚尔、布伊松）、一位相当著名的哲学家（皮隆），此外还有那位有才能的合作者奥古斯坦·布瓦耶。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

在前言中，作者把弗朗索瓦·皮隆列于榜首，“这位同乡和朋友与我们之间的合作是珍贵的，特别是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尤其如此”。皮隆是一位记者兼医生，又是个哲学家，他是一位全面而博学的人，1830年生于荣纳省的枫丹，1914年12月9日在巴黎去世。他有资格在大词典中占一席之地。他是勃艮“第三圣人”（他、拉鲁斯和布瓦耶）中的第三号人物。这一顶桂冠是乔治·莫罗在1894年土西纪念碑落成典礼上送给他的，当时莫罗还说：“大词典从第一个字母A到最后一个字母Z都贯穿着他客观的和纯真的思想。在土西高级小学时他是拉鲁斯的学生（作者原注：原文如此）不久他们便成了朋友，随后便成为莫逆之交并成为忠实的合作者。精神科学和政治科学学院最近因皮隆的工作成就而两次举行授奖仪式，授予他热尼埃奖金。”

1848年革命时期，他是个记者，1851年政变之后便来巴黎行医，一段时间以后，哲学又吸引了他。他研究了康德和蒲鲁东，后来又遇到了查理·勒努维埃，便致力于发展新批判主义哲学。后来他又创办过杂志，著述颇丰。

阿尔弗雷德·德贝勒（1835~1877），撰写的政治条目最多，也是拉鲁斯亲密的合作者之一。他们合作发表过不少作品。1875年1月他和朱尔·奥里埃一起发布了拉鲁斯逝世讣告，并在其死亡证书上签了名，他的头衔是大词典主编。他曾于1868年被捕，并在圣—佩拉吉坐了一个月牢，次年再次被捕，由于他患有严重的疾病，才得以免受几次铁窗之苦。巴黎围城期间他是第十四区副区长。1871年2月任科贝尔专区区长，1874年11月任巴黎市

会议议员。

另一位大革命支持者是路易·孔布(1822~1881)。他是法国大革命条目和与此有关的人、事等条目的主要撰写人之一。因政治观点与当局不合,曾在贝尔岛坐牢五年。甘必大于1879年任命他为内政部图书馆馆员。据贝特洛百科全书记载,“教权主义就是敌人”这句话是他的首创。我们不妨听听拉鲁斯以其特有的激情对他的介绍:“路易·孔布先生是一位‘严肃’的合作者。‘严肃’一词用在他身上,应该包括着该词最广泛的内在涵义。他不是那种按件计工,按日领钱的那种文学上的勤杂工。这种小勤杂工手里拿着自己的稿子跑遍各报馆、各杂志的编辑部,担心着自己的稿子不被采用。

太阳出来了,他高兴地喊一声早安。

太阳落山了,他遗憾地道一声再见。

不,路易·孔布不是这种人,他很久以前就是我们大词典历史和传记部分的忠实合作者。他参加了我们这座大厦第一块基石的安放工作。他和挪亚一起进入了方舟,象一只鸽子一样,他将一直等到大词典完成了最后一个字母Z时,才走出这座由字母组成的阿拉拉火山①……”

在数学方面应该一提的是马克西姆里安·马利(1819~1891)他直接为大词典写了13万行。自1863年起,他就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辅导教师。大词典在他的条目下,赞扬了他在数学方面的功绩和为共和制而做的贡献。他和拉鲁斯也有个人交往。

在1901年6月22日出版的《通用杂志》上,拉鲁斯书店发表了一篇瓦莱斯的文章,文前的按语写道:“拉鲁斯曾要求朱尔·瓦莱斯为《19世纪万用大词典》写一篇有关滑铁卢战役的文章。

① 相传挪亚方舟和其后载着圣经的船只就停在阿拉拉火山旁。该火山在现土耳其境内。——译者

该文没有被收入大词典，却一直存在书店的档案里。作为历史和资料来看，据瓦莱斯自己说，可以取代梯也尔、夏拉、基内和维克多·雨果等人写的那些已经家喻户晓的文章。该文绝无出众的文采，当时只作为大词典资料使用。但到现在却象奇迹一般真的显示出瓦莱斯自己所说的那种价值。当此滑铁卢战役86周年（1901年6月18日）之际，我们谨发表此文，以资纪念。”在手稿最后一页的背面，有拉鲁斯的手迹，写的是：“我看这篇文章只不过是说大话而已，读来使人疲倦。”这篇文章的最后，用比通篇文章更为时髦的话说：“与其搞这些小摆设（我已经被这些老玩意儿搞厌了，我渴望着新事物和新生命），倒不如打开窗户看看放牛的女工，她腋下正夹着一支纱杆，手上在摆弄着纺锤……我憎恨战争！我绝不向死去的英雄们默哀，但我却对活着的劳动者致敬……”

既然拉鲁斯有这么多的合作者，人们不禁要问，他自己在这一工作中的作用何在？又怎能保持作品的平衡和统一呢？在前言的最后部分，作者回答了我们：“还有最后一句话，却是很重要的，因为本词典特别使那些严肃认真的人感到惊奇。提到这件事，也是因为我们很理解那些惯于认真体味自己读过的文章的人的心情，理解那些惯于打开杏核来品尝杏仁滋味的人的心情。这话意味着本词典各个部分贯穿着一种观点，即一种带有强烈的个人特色的观点。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表现出与历史哲学的不协调，各种科学也向文学和美术伸出了友谊的手。资料部分的协调也是如此。这种统一并非偶然现象，因为我们所做的就是这种工作。更不消说新补充的部分使得本词典不同于任何其它同类著作了。本词典的作者绝对地承担了一个作者应负的责任，我们所进行的具体而细致的工作证明了这一意图并非没有基础。”大词典整个的安排是经过拉鲁斯精心构思过的。在作了许多具体规定的

同时，他对所有的内容和编排都进行了组织与协调。他的工作还不止此，词汇的编纂和有关语言的部分是出自他的手笔。此外如巴黎、时事新闻、书目分析等大量条目也是他自己写的。他还重新审阅了大词典的全部条目并随时补充进去自己的释文。

同时代的一位当事人向我们提供了这位集中统一领导者的工作情况。拉鲁斯逝世不久，都什博士在《政体》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几年以前，我们有机会在拉鲁斯的工作室里见到了他。当时我们穿过几间比较简陋的大房间，里面坐了几乎有一营人，正在静悄悄地工作。有的正在翻检着新出的或者古旧的各类图书，有的在查看各种报纸，有的在审阅原稿和版画，大家都象蜜蜂采蜜一般，一点点地搜集着各种资料以供这位出色的蜂王来吸收和使用。最后在一个满是活页资料但却堆放得整整齐齐的大房间里看到了这位主持人。他正在审阅根据他的命令搜集来的资料，一边看一边根据需要进行修改。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速度把它们分档归类。就象一位将军在指挥一次大的战役，一边听取副官们的报告一边给他们下达命令。这一工作既繁琐又复杂，但却不影响他热情地接待来访者。客人们络绎不绝，一边自我介绍一边同他握手。他就同他们交谈着各种问题而同时还进行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工 作，并且绝不放过从这些不速之客中吸取于他编写工作有益的东西。从最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到最严肃的命题，他都能处处留心以便找到满意的合作者。而他每走一步都能发现这样的人。似乎他随时都在估量你能为他的编写工作做些什么贡献，并且总是千方百计地让你给他寄点什么来，而绝不会白白地放过你。因此，凡是乐于和他接近的人都从内心里希望他的著作能取得成功并乐于在自己专业范围内对他的工作有所贡献。他最大的功绩就是把这些分散的，不成系统的材料予以协调和统一，把它们融于整体中去。这工作主要是拉鲁斯的任务。”拉鲁斯把全副

精力和全部才能都贡献给这部大词典，这是他生命的结晶，正如题词中所说，“是我骨骼的骨骼，肌肉的肌肉”。

因此，我们说，尽管有数百人作他的助手，整个大词典从字母A到E都真正属于他。一个人为一部作品拿出了他的全部财产，牺牲了他的健康，贡献出他的全部才智和体力乃至他的生命和灵魂，这样的作品是不多见的。……

钱财问题

编写这部词典绝非出于金钱观念。这在前言中已经声明。一位名叫雷昂·埃斯居迪埃的音乐编辑在谈到委托拉鲁斯重印他的总谱和歌词时说：“在此，我们愿意公开地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那些令人尊敬的同事（也是我们的同事）其心肠之善良并不比他差。在法国，大家已经了解编写大词典这一艰巨事业完全与工业主义背道而驰。它需要献身精神，精明干练和热情，这也正是拉鲁斯所要求的品德。”

这确是一项不计个人得失、不计报酬的事业。这从拉鲁斯笨拙地掀起那场预订高潮和他慷慨大方地为木刻画付钱一事上可得到证明，或从瓦莱斯那样古怪的一些编纂者们身上看出一些迹象。自由和慷慨，是这位主持人和他的同事们共有的特点。尽管有时他也抱怨按工作量计酬未免太麻烦。“百科全书或字典条目的编写，付酬办法是按页数，更多的时候是按直列或是按行数计算。因此大词典对于凡不是出自领导人手笔的条目都按这一办法付酬，而领导人则尽其所能不使自己为把文章拉长而在酒里掺入大量水份。Multa paucis^①这两个词时刻都在我们所有同事的

^① 拉丁语，意为用尽量少的文字表达尽量多的内容。——译者

耳际回响着。”

在此，我们想多引用一点阿道夫·拉科在《昨天的人物》一书中有关这方面的描写：

……所有靠卖文糊口或喜欢写点文章的无名作家都乐于到拉鲁斯那里去。其原因很简单：这位令人吃惊的编纂家就开着办公室的大门给作者付酬，并且是现款。但稿酬标准不是对任何人都一样的，其中有颇有名气的学者，也有地位低下的普通人。一行字（按手稿行数计）一个苏，1000行就是50法郎^①就可以糊口了，如果每月写上4 000行便足可维持生计了。在此我想提一提我自己的情况，我并不觉得有何难堪之处。有一次我为拉鲁斯写了一篇1 800行的文章，从头一天下午2点开始，写到第二天下午4点。在这26个小时内我什么也没吃，却喝了特大号的大肚子玻璃瓶一瓶咖啡。我的上帝！这次可嚐到滋味了！那个坐在敞着门的办公室里为你的稿子付现款的人，为这1 800行文章付了90法郎。这真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而这样一笔薄酬，并不代表我26个小时的劳动，因为我在写之前还用了五天时间来研究资料，查找文件，摘抄笔记，跑黎赛留大街的图书馆，有时还要到军器库大街图书馆。

他十分热衷于出版一部万用百科大词典，那里面应有尽有，包罗万象，什么也不缺。他自己也是什么都想搜集，有时他可以花钱买十篇同一条目的释文，到第十个人来卖文时他才发现。这时他便面带失望的神色两臂举向空中，带着一种怜恤加焦燥的口气喊道：“够了，先生，够了！”

这时作者低下头来喃喃地说，因为年关已近，他指望用

^① 苏是法国货币名，相当于1/20法郎，即5生丁。1 000行即合50法郎。

——译者

这100行的文章为他小女儿买一个布娃娃。拉鲁斯打量了他半天，然后突然说：

“好，我可以收下，喏，这是10法郎，下不为例！”

他的词典，他的事业是他始终萦回在心头的主题。就象他血管里的血液，头颅里的脑汁一样始终处于火热状态。这位不知疲倦的劳动者唯一的寄托就是他的家人，他唯一的欢乐也是他家庭的欢乐。和孩子们一起度过夏日的星期天是他最大的乐趣。善良是他性格的主要特点，他曾不止一次地成为这种善良性格的受害者，下面便是一例：

1869年的某天清晨，一位失意人前来拜访拉鲁斯，从发式上看，此人属于当时那种反政府的空谈派人物，显出一付热情的共和主义者派头，并以这一资格要求参加大词典的编写工作。拉鲁斯高兴地表示乐于为这位失意人尽力，并进一步向他建议说：

“每天都有人给我送来大量手稿，但我没有时间看它们。我知道，我用的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也无法欺瞒我。但我希望在这些文章付印之前，除进行一次总校外，还能有个有眼光的人作为初读来检查一遍，您愿意承担这一工作吗？”此人便接受了这一任务。拉鲁斯便交给他一箱子手稿。三天以后，这位新任检查员又来找他，并带着傲慢而轻蔑的语气说：

“拉鲁斯先生，所有这些手稿都没有什么价值，一方面残缺不全，另一方面又写得很差，我想把它们重写一遍，不知您是否同意？”

拉鲁斯抓了抓耳朵，非常不高兴。但他对此人十分相信，再加上他心地善良，于是便说：

“那么您就重写吧，我把这件事委托给您，但希望您把

还能用的部分保留下来，因为，您知道，这些文稿都是用现钱付了稿酬的。”

于是此人又把那些原稿拿了回去。几天以后他便把自己的稿子交了出来并取得了报酬。不幸的是，有一天他把自己的手稿和被他称为很糟糕的稿子一起忘在拉鲁斯那里。拉鲁斯有意对两者作一番比较，以便看一看这位亲爱的审查员改写的部分到底如何。不看则已，一看之下把他吓了一跳。两份手稿竟是一模一样。原来这位审查员回去以后便认真地大抄其原稿，然后再把自己抄的带来，并且领取了全稿酬。拉鲁斯本可令人把这个放肆的剽窃者抓起来，但他只是简单地把他辞退了事。但这件事对我们这位杰出的好人是一个无情的打击。以后，便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检查制度。

无论谁来登门要求工作，只要他证明这些人确有才干，他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有一天上午，他接待了一个高个子年轻人，此人又瘦又长，一头长发，行动腼腆，从衣着上看，他可能是个遭遇极惨的人。在此，我只能称呼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M，亨利·罗什福尔与他很熟悉。他原是神学院的学生，后来在巴黎公社经受了锻炼，随后便被流放。奇怪的是，他后来竟拒绝对他的赦免令，宁愿留在努阿美^①干他舒适而有利可图的拍卖估价员的职业，而不愿回到前途未卜的法国本土来。

那天早晨，这位大个子青年费了好大劲才张口说道：“先生，我名叫M，从神学院毕业已有好几个月了，职称是天主教教士。由于巴黎方面的某些人事关系和我思想上的转变，我决定还俗不当教士了。但是我却没有饭吃，您是否愿

^① 法国海外领地新克里多尼亚的首府。——译者

意交给我几个条目写写呢？我将尽最大努力去完成。”

拉鲁斯同意了他的请求，这位可怜虫从此便有了饭碗。M是非常勤奋的小伙子。他早晨10点钟便走进帝国图书馆，在那里精心钻研各种古籍，直到下午4点才出来。常去该图书馆的人都能记得起有那么一位干瘦细长的年轻人。当他埋头工作时，那一头长发便把他整个面孔遮住，那是因为他极度近视的缘故。看书时他不得不把眼镜“贴”到书本上。拉鲁斯对他的细心和钻研精神非常满意。一天早晨8时左右，编纂家已经坐在他圣母大街的办公室里，突然他万分惊讶地看到，脸色苍白的M在三个保安人员的押解下走了进来，拉鲁斯大声喊道：

“可耻！你干了什么事啦？”

M带着眼泪说，他刚刚被捕。原来他竟愚蠢到允许当时拉乌尔·里戈家族的某一份报纸借用他的名字，作该报的代理人。此外，好象在他家里还藏有几张违禁报纸，也使他受到牵连。尽管这一件事与其说是参与叛乱倒不如说是他的愚蠢造成，但最后警察终于逮捕了他。“那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拉鲁斯说。M接着说：“我有一个小家庭，如果我没有工作收入的话，他们就会饿死。因此我来请求预先支给我一笔稿酬，以便他们能支持到我出狱。”

拉鲁斯给了M200个法郎。的确，M在这里得到的是不甚热心的关怀。……M终于进了监狱。在狱中他结识了亨利·罗什福尔，出狱后他们联系日趋密切，终于合作办起了刊物……

这就是拉鲁斯。无疑，有许多时候他是错的，但由于他的好心，人们总是原谅了他。比如1830年伏尔泰儿子事件，贝朗瑞的歌曲事件，复辟王朝最后几年狂热的反教权事件和

共和党人运动等等。但这些错误是一代人的错误，而他的品德则属于他自己的。愿上帝保佑他安息！

拉科说拉鲁斯有孩子一事，是他搞错了，大家知道，拉鲁斯只抚养着他的一个侄孙女安托尼娜。至于那位大名鼎鼎的M，可能是（但不敢肯定）让·巴蒂斯特·米利埃尔。他是亨利·罗什福尔的合作者，但拉科却把他的结局闹混了，他不是终老在努阿美，而是1871年5月26日在巴黎被枪决。但总的说，拉科的这些叙述是最生动、最具体地描绘了当年拉鲁斯的形象。

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拉鲁斯既不善理财，又不是一位严谨而深思熟虑的行政事务管理家。他的财产几乎全部用在事业上，而他的合股人则始终与他保持一段距离。再举一个当时的例子：维克多·莫尼埃曾不止一次生动地描绘了他在圣—安德烈—德札尔大街办公室里的情景。拉鲁斯坐在办公室中央写字台的后面，他的同事把统计出的文稿行数连同手稿一起交给他。他一边看统计出的总行数的数字，一边把右手伸进裤袋里抓出一大把金币、银币和铜币，然后按行数付款。什么手续也不要。他就是这么一个简洁而爽直的人。但另一面，他又是一个知识广泛、有创见、有多方面理论修养的人。这种直爽的做法当然有时会出现弊病，但拉鲁斯却善于把同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也就是为什么一部足以耗尽一生精力的巨著，能在有限的几年内完成的原因。

大词典的语言内容和思想内容

在《法兰西语言简史》一书中，作者查理·布律诺写道：“万用大词典不仅仅是一部单纯解释词汇的工具书，它每一词汇的含义都用例句来说明，同时它还是一部百科全书……而这本万用大词典之所以具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同时又是一部词

汇字典（它几乎把所有的词都收了进去）和“事物”字典；它有丰富的插图和各类地图。万用大词典的出版和利特雷词典的出版一样，标志着法兰西词汇学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于版面不断改进和定期修订再版，拉鲁斯的万用大词典到目前为止已是几经翻新了。”“词汇学字典和事物字典”（尽管不象布律诺所说的有那么丰富的插图和各类地图）正是这部词典特点的写照。但它又不同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正如大家所看到的，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只是有选择地收入了与文学、艺术、科学或者与各种行业有关的内容。对这些内容该书只作一般的介绍。从科研工作的深度看，尚嫌缺乏实用价值，从一般群众的角度看，又似不易为一般人所接受。（见1932年11月10日《时代报》专栏文章）

拉鲁斯的计划是编一部普通适用的大词典，“亦即一部包括各种专业词汇并面向所有法国人的词典。这些人不管社会观点如何，也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能使用它。法兰西学院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编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词典，也没有想到把一般人使用的语言同某些专业术语和某种职业的行话合编到一本词典中去。”

（见大词典前言）因此，他把法兰西语言的各类词汇都搜集起来了，有文学词汇、通俗词汇、大众词汇、技术词汇和科学词汇，以及俚语行话、方言土语等等。这部词典词汇比利特雷词典收入的要多得多（利特雷词典只把医药词汇作为技术词汇）。其总数从来没有人统计过。据大致估计，约有30万条。而拉鲁斯当时在他撰写的教科书中屡次说，法国语言的词汇只有10万个左右。如果不把这部词典称为“法兰西语言宝库”的话，起码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法语词典在词汇的丰富方面可以与之媲美。在选词上，它在某些方面比利特雷词典要放得宽，在语言学词汇和科学词汇方面远远胜过同类其它词典。

这部词典的历史和地理资料也同样丰富。有时拉鲁斯带着

骄傲的口气提到，在词典里论及历史人物他是首创。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英雄罗斯·布荣、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克拉克松、莫里哀的母亲克莱赛。他尤其对犯罪行为的动机感兴趣，每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叙述得十分详细，不惜用大量的篇幅讲述详情、经过和各种细微末节。在这些不厌其烦的描写中，自然少不了受当时世俗偏见的影响而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

他对任何事物都感兴趣，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如铁路的出现，汽球的制造等。对当时的习俗风尚也有兴趣，每有这些条目他总要发表议论。

为使读者对他关心历史文明和他释文之丰富有一具体概念，我们打算对他的“铁路”条目进行具体的分析。这一条目肯定是出自拉鲁斯之手，这一点他在1867年7月27日的《声誉报》上已经谈过了。

该条目一开始便热情赞扬铁路这一新生事物：“铁路！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词汇。而当它作为文明、进步和博爱的同义词在我们当中出现时，它又被罩上了何等神圣的光环！……”词典中关于铁路的历史，由数字、图表和文字资料相互补充说明。如1832年法国火车头每小时行驶速度不到10公里。但到1868年，克兰普顿^①也是用了一小时，速度竟达到70到80公里。词典用了两大页画出法国开辟铁道线路的图表，并附有公里数。这是一份其它地方没有用过的材料，日期从1828年10月1日起至1868年1月28日止。在另一页上还有一些图表提供了其它各国开辟铁路总长度，以及各大公司为获得铁路建筑专利权付给国家金额的总数。接下来便是修筑铁路的详细技术情况介绍，工艺情况、土地使用情况以及筑路材料等情况介绍。还附有一份关于铁路问题讨论情

^① 克兰普顿（1816～1888）英国工程师，他发明了大车轮火车头。——译者

况的记录以及1842年有关铁路的法令等等。关于这方面的法律规定，他接受了蒲鲁东的二元论，即国家帮助筑路，私人公司通过向国家缴纳专利税的办法负责经营。对于客、货的运输应把税率降到最低限度。每个铁路员工都参与企业管理，并可入股。大词典又用了五页的篇幅提供了一年一度的铁路财产详细清单以及自1833年到1868年间出版的有关铁路书籍。这份清单十分详细，也为其它资料上所无。接下来便介绍铁路事故和在铁路上发生的各类犯罪活动以及对铁路改革的建议。还有一部分介绍了不幸的乘客们的哀叹，这一部分可以称为铁路轶事集，其中有些事故是很惊人的。还有一部分是对古老驿车的回忆。总计只“铁路”一条使用去四直列的大页共35页，其中包括第一版时一个带插图的闹剧《地狱般的火车》，共五页，是描写一个关于铁路的荒诞故事。

Ab uno disce omnes^①，对于拉鲁斯，我们也可以说，分析了他的一条释文，就能使我们大致看出其它各条释文的丰富内容。……

评价与批评

1932年11月10日，《时代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拉鲁斯书店的高篇专论。在回顾了该书店创始人拉鲁斯和布瓦耶“设计了一个通过书籍来教育人民的方案”以后，也谈到了这部词典，该文引用了什莱（就是此人对这部词典能否完成曾表示过怀疑）在介绍这部词典时说的一段话：“从来没有人曾把如此浩瀚纷纭的事物集中在一部书里。我们可以在这部词典里找到一切要找的东西，

^① 拉丁语，意为：通过对一个人的了解，便可学会了解其他的人。——译者

但我不禁自问：里面找不到的东西呢？”对此，《时代报》的编辑解释说，由于该词典的编排有条不紊，释文清楚明白，因此，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相反，它不仅仅只为一部分文化人所用，而且还为一切人所用：

“拉鲁斯赋予百科全书以新的生命，他大大扩充了百科全书的范围，它面向的已不只是少数知识界人士，而是所有的人。因此这是一部杰出的、具有民主精神的著作。它对一切事物都赋予明确的定义，它把各种思想和各类事物都给予准确的清理并用一种统一的和简单的方法把它们一一分类，但同时它又是典型法国式的著作。它在词汇的解释、编排的顺序和释文的明确方面，完全符合我们法国人的特点，同时它又适应世界读者的口味，因为把法国人的思维和其它各国人的思维对立起来是毫无必要的。何况，要写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首先就要有为全人类服务的思想。因此，这部大百科词典很快就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在法国，它被认为是法国民族一部杰出的百科全书，并把我国的文化介绍到外国去。在国外，出现了大量模仿这一编排体系的词典，如果有一天能把这些书目搜集起来将是很有意思的。大家都亲切地把这部词典称为‘拉鲁斯’。这一称呼在今天已成了全世界公认的大百科词典的同义语。”这是一个历史的评价，是友好的、善意的。其着眼点是从整体出发。但在后来的文章中就不太容易找到和它完全一致的评价了。这部词典在世界各国发行数量没有准确的数字，据我个人估计，大约有15万册左右。

该词典第一次受到攻击，是在头几个分册出版之前。路易·弗约在一个时期曾是该词典的合作者之一，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巴黎香水》（1865年出版）一书中把拉鲁斯当靶子攻击。弗约和拉鲁斯都是勃艮第人，他俩都出身平民并且工作勤奋，但两人的思想却有如冰炭。那一位记者愈是粗暴，气量狭窄，这一位词

典编纂家就愈是随和、宽宏大量。弗约针对拉鲁斯写了一首14行诗，把拉鲁斯写得狂妄自大又没有才华。这诗写得很蹩脚，后半部又使人倒胃口。该诗写于1864年以前，正是拉鲁斯出版词典前几个分册的时候。于是拉鲁斯起而自卫，在一篇只有一页的《致万用大词典的合作者路易·弗约先生书》中，对《巴黎香水》一书进行了评论。他对这本书的“不怀好意，口出秽言，以市井小人的语气粗野地谩骂”表示遗憾。“在这本书中，有许多冷嘲热讽的攻击，已引起公愤，更不幸的是书中还有更多其它低级下流的东西。”

此外，这部词典对一些历史事实，由于疏忽造成的差错，也被公正地指了出来，在这样一部巨著中，这当然是难免的。如维克多里安·萨尔杜就曾指出：“拉鲁斯大词典的历史部分把孔布莱夫人和孔布莱小姐当成了一个人，并为此人写了传记，我当时未能提出质疑是应受到良心上的谴责的。这是一条十分奇怪的释文，人名、地点和事迹全是错的！更其严重的是，以这些想当然的材料为依据，词典竟把所谓费利西·孔布莱在复辟王朝时期写的回忆录片段摘录给我们，而忘记了这位费利西·孔布莱在第一帝国时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更其严重的是在“巴尔贝依·多勒维利”条目下，把朱尔和他的哥哥雷昂神父两人弄混了，从而引起了不小的误会。到增订本第一卷出版时，大词典的编辑们便在“巴尔贝依”条目下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在新版本第一卷中便由一条准确而简短的释文取代了前释文。

《会话和阅读词典》，在“词典”条目下，忠实地对拉鲁斯词典作了有益的介绍后，也提了某些大体上是正确的批评意见：

“该词典用特小号铅字印刷，未免显得过于在‘百科全书’这个意义上下功夫了，这样它势必大大地扩充其分量。我们认为，其中

有些条目太过发挥，显得没有必要并且超出了它应具的范围和版本容量。同时，有些内容很快就会过时，不久就会使人感到陈旧。比如对当时还在世的人的传记就是这样。此外，有些条目看后使人觉得欠严肃。”

对大词典的许多批评都是言之有据的，如各条目的释文繁简失调，在整体上不够和谐，有的条目缺乏批判思想、评论失之偏颇。而闻人轶事部分和新闻报纸部分又占有明显的优势……等等。但有一件事是不容忽视的，即自该词典一出，其它词典的使用率便大大降低了，甚至连贝特洛的百科大词典也很少有人问津了。大多数人还是喜欢《拉鲁斯》的。他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实干家的足迹，可以看到对过去一个时代活生生的写照，可以发现丰富的词汇宝库。这些都是一系列艰苦的工作和他整整一生勤奋努力所结的硕果。我们怀疑是否其它许多大百科词典也会象这部词典那样，被大家拿来象小说一般贪婪地读着。

记者、工场主、商人都用这部词典，官方人士自然也使用它。布列塔尼一位专区区长为一条地方铁路剪彩时，他的讲话引起了轰动。不巧该演说词被当地报纸登出来了，有人同拉鲁斯词典上关于铁路的有关部分的释文一对照，两篇东西竟然一模一样。“最使人拍案叫绝的是，这位区长竟因他这篇漂亮的演说获得了公共教育部长颁发的一枚一级教育勋章。”在沙迪·卡诺竞选总统时（1887年12月3日），一位记者由于时间紧迫，便拿着剪刀到附近的图书馆里搞了《拉鲁斯》上的一个条目来使用。

“其实，不用这种手段也照样可以厚着脸皮来剽窃《拉鲁斯》上的释文”。这种事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也无需对此发什么牢骚：向富翁借钱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富人从来就是借钱的对象。在中央林荫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奥雷里安·舍尔遇到了巴黎一位著名专栏作家，舍尔邀他坐到自己这边来，这位作家谢绝了，于是舍尔

说：“啊，对的，一点不错，因为你从来都是利用吃饭时间来抄《拉鲁斯》的……”（见大词典增订本第二卷）。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小仲马在给他的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一个好图书馆只要有三本书就够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这3本书里。第一本是《新约全书》，是讲宗教伦理的；第二本是拉封丹的寓言诗，是讲形象教育的；第三本是拉鲁斯词典，它向你提供各类史实和具体日期。”阿纳托尔·法朗士曾说，他就从《伊壁鸠鲁大全》和《拉鲁斯》里吸取了知识：“是的，先生。拉鲁斯词典的出版，对我们非常之有用。”莫利斯·拉特说：“这部万用大词典，关于词汇部分有许多新的发展。这在其它词典，甚至在利特雷词典里是找不到的。它们条理清楚、叙事明白，合乎逻辑并且讲究方法。”

1970年12月4日，我们收到一位82岁高龄的D夫人寄自马赛的一封来信。她是这部词典“狂热的崇拜者”。她1915年结婚，新婚夫妇购得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拉鲁斯词典。“我们因工作需要，要经常翻检它。”自1945年以后，她稍有了空闲，便开始通读词典全文，直到1969年才通读完毕。“从词典上摘录的笔记达40本之多。我随读随记，把我最感兴趣的人物都集中起来，并摘抄了大量语录。”她反复阅读词典中的伟人传记，似乎这些人物又在她心中复活了。“我从中找到了乐趣，自从我把这部百科全书当作自己心爱的读物以来，再读其它杂志和小说便觉得索然无味了！”她把那些笔记本同这封长信一起寄给我们。她写道：“我要反复地向大家表示我对拉鲁斯先生的景仰之情。在我的心目中，无人可与他相比，他把所有认真严肃而又不知疲倦的研究人员组织起来，并使他们紧密合作，而他自己也正是这样一种人。……”

好学之志千古，赤子之心永存！

性格与观念

本章开始，拟先介绍一下蒲鲁东的伟大形象，因为他在很多方面解释了拉鲁斯的性格和观念形态。在大词典前言行将结束时，拉鲁斯向蒲鲁东表示了敬意：

“现在，请把我们的笔管裹上黑纱吧，因为盲目的砍刀已经在我们当中打造出来了。这是何等的盲目啊！那位已经不在人世的带头人，他的才能远远高出我辈之上。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这位19世纪最大胆、最深刻的思想家，我们曾发表过他给我们的信，信中谈到将与我们合作编写大词典，他说：‘我对您关于‘无政府主义’一词的释文是满意的……当您编到‘上帝’和‘财产’条目时，请您通知我。……我坚持这两个条目的释文应按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我绝不为一件事便去亵渎上帝，也不想为此而废除私有财产。’这一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遗嘱性质的愿望，肯定会被虔诚地完成。是的，我们著名的哲学家，请您放心吧，当我们处理这两句恶毒而令人费解的句子^①（这两句话曾为您树了那么多敌人来破坏您的声誉）时，建立在一切虚伪上的愚昧无

^① 指“上帝，就是罪恶”、“财产，就是偷窃”两句。——译者

知都将坍台！”

蒲鲁东的信我们在前一章已全文介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
到，拉鲁斯对他的尊敬是真挚的、无保留的。在大词典中，蒲鲁
东占的重要地位可以从他的长篇传记，从在他的作品中引用的大
量例子，以及从对他的长篇评述中看出，在许多条目中，拉鲁斯又
创造性地运用了他的思想。这一切都使人深信，蒲鲁东是拉鲁斯
思想上的伟大导师，尽管在许多观点上拉鲁斯表现得对蒲鲁东并
不盲从，甚至同他的看法相左。

他们两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俩都来自农村，热
爱大自然，并忘我地工作，又都是自学成才的共和主义者。对圣
经都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自尊而又热诚，并且都是身体力行的
伦理学家。两人又都是以人民为本的人。蒲鲁东曾写道：“我自
己原本没有多少值得称道之处，如果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话，那
就是人民造就了我，我自己也在学习如何作一个普通的、现时代
的人，并且永远留在人民中间……。要作一个人民的代言人，对
我来说要比其他人更有条件。”（《论正义》）和拉鲁斯一样，
蒲鲁东也从父母那里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德：正直，信守诺言，
尊重别人而又自重，喜欢独立思考。“这就是所说的家族的高尚
吧，我是高尚的。”（《蒲鲁东笔记》）对正义也有同样的感情，
蒲鲁东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虔诚信徒”。他歌颂正义，他认为正
义永远是平等、自由和互相尊重，人与人之间应该永远遵循信仰
的独立道德标准，他们应该服从自己的道德信仰。在回答米尔古
尔时，他说：在天主教教义中，没有真正的道德标准，没有对人
格的尊重，没有对自由的尊重，也没有对人类信仰的尊重。一切
都按自己的道德标准行事，这就是蒲鲁东所说的，他从孩提时代
就学到的东西。我们后面讲的拉鲁斯的社会主义就具有这种蒲鲁
东色彩。蒲鲁东和拉鲁斯在这种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或者至少

是对一切权威都加以怀疑的个人主义方面是相通的。俩人都是相互主义者（拉鲁斯在这方面有着较大的保留）、联邦派、反集产主义者。俩人在教育人民的观点上又都主张民本主义，认为它是民主的基础。

在大词典中，对蒲鲁东的评价是有保留的，并且对他的观点也略有异议：“可以从各种角度对蒲鲁东加以评价。但我们只说，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勤奋工作者的形象，一个伟大作家的形象。他的治学方法有缺点，不灵活多样，论点有时自相矛盾，甚至有许多诡辩之处，或如英国人说的，有许多虚假之处；他博览群书但却不求甚解，有知识根底，但又不甚牢固，有时会出现严重错误，有些甚至是致命的错误；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19世纪最有独特见解的、最强有力的、最深刻而又最博学的思想家之一。蒲鲁东将永远作为一个在处理各种杂乱纷繁的工作中使我们的时代为之惊愕的忠实形象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对他可以这样加以归纳：急躁，过于激动，大胆，有否定的东西，也有肯定的东西。”这一评价并非出自拉鲁斯之手。据我们所知，这个条目出自弗朗索瓦·皮隆之手。从文章写法上看，没有拉鲁斯风格，口气也不象。从发表时间上看，这一卷发表于拉鲁斯去世以后，在作准备工作时，拉鲁斯又正在病中。

增订本第二卷，在“无政府主义”条目下，概括地叙述了一下蒲鲁东的思想：“应该指出，在蒲鲁东的否定政权和否定政治权威方面，他不只倾向于否定资本（更确切地说是资本权力），同时他还否定上帝。‘无政府’在法文词形上是‘反—指挥’，它和‘反资本主义’以及‘反有神论’在体系上是有联系的。他认为上帝和国家政权，以及资本生产率这些概念在思想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互相支持。为了实现‘反—指挥’，为了把‘社会契约’变成真理，应该在知识界和理论界清除‘崇拜’这个概念，因

为政治权威始终是建立在这个概念上的。同样，要在时间和空间上组织对信贷流通和信贷互惠的保证。这样一个否定三部曲便决定了无政府主义的宗派性。它是从蒲鲁东那里来的，在这方面它又联结着互助主义的社会主义。”

道德观念

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研究拉鲁斯的意识形态，既道德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和文学的。和蒲鲁东一样，拉鲁斯是一个道德观念很强的人，他时而象个说教者，时而又象个清教徒。他主张非宗教的道德观，但总的说，他的道德观是传统式的、时而带着自由主义的大胆，时而又过于严峻，其核心则是个人主义的信仰观。“‘善念’的产生，蒲鲁东认为，是基于人类内在的良心。‘善’的实现乃是我们人类的职责之一，对‘善’的认识，则是我们要研究的学科之一……，我们把路上的石头搬掉吧，这样，马车就可以自由地前进了。自命为马车夫的哲学家们的鞭子却从未产生过如此大的效力。一个单纯而正直的生命在现实的道德方面所懂得的，要比一个最深刻的推理家多得多。”人类的良知指导着这位词典编纂家的生活。他在1866年对他的朋友迪歇医生说：“劝告、指责、尖酸的或是宽厚的批评，无论哪一种，只要有助于澄清事实，我都能接受。我现在需要用知识和公众沟通，他们就是我的法官，但对我的终审，则只有一个最高法庭，它就是我的良心。我习惯于把所有引起诉讼的案情交给这个法庭审判，从不后悔。因此请放心准备你的建议甚至拿出你的手术刀吧，我毫不畏惧地等待着。”

尽管他喜欢饮酒，特别是喜欢好酒，但他却谴责酗酒、谴责麻醉品，反对精美的夜餐。

拉鲁斯对妇女的评价时见暧昧之词。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一种纯高卢式的对妇女的不信任、嘲笑和厌恶情绪。在这方面他和蒲鲁东的意见一致，也和多米埃的看法相同。但他有时又是一个女权论者。

他词典中的“妇女”条目，是最长的条目之一。他对“妇女”一词的定义是：“与雄性相对的雌性，可以受孕、可以生孩子的人类有机体”。这个定义短而欠文雅（但比较准确）。但他的小拉鲁斯词典就不这样，其定义是：“男性的伴侣”。应该指出，“女权论”和“女权论者”这两个词在1872年出版的大词典第八卷上却没有收进去。而据多札考证，“女权论”一词在1837年便已出现（傅立叶创造），“女权论者”的出现却晚些，但在1872年也已出现（小仲马创造）。

他的《师范学校》和《竞赛报》杂志的订户，以及他举办的许多竞赛项目的参加者，大多是女性代表。有一次他曾为男青年的不踊跃表示遗憾。鉴于读者的这一状况，他便有意在杂志里增加了一些对妇女们的恭维、赞扬、献媚、有时甚至显得矫揉造作的文章。

他赞成妇女在社会上应有所作为，当时这种思想颇为流行。有一次一位女记者很巧妙地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打算向您提一个关于妇女衣着打扮的问题。先生，请不要笑，衣着打扮对我们女性，是个高度的政治问题。有位作者对妇女一词的定义是：

“穿了脱，脱了穿，东家长，西家短”，她以挑衅的语气讲出了一个真理。“我准备接受这一解释，不知您意下如何？”拉鲁斯严肃地回答了她：“您在《师范学校》上向我提的问题，确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要我选择的话，从合法合理地挑选妻子的观点看，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位整日围着梳妆台转的太太，而不想找一天整天向往坐上科学院交椅的女人作妻子。我建

请您读一读乔治·桑夫人的那本最新小册子，您就会看到，这位女大师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拉鲁斯对于实行妇女教育颇感兴趣，但他却要求她们首先是一件装饰品，并应努力讨取男人的欢心。下举《竞赛报》上一篇练习题为例：“一个漂亮的女人，如果再具有一个诚实的男子应有的品德，那么，在市场上的价值就高了，因为她身上具备了两性的美德。一个不温柔的女性，就象牧场上没有绿草，山谷里没有鲜花，森林里没有树荫，花坛里没有长青树，鸚鵡没长羽毛，天空中没有太阳一般。”拉鲁斯满意地看到，他的教育杂志得到了女性“强有力的支持”。“有一位女性作你的支持者，你就会成功。《师范学校》有数百名妇女对它表现了热情，这就是这份不足挂齿的杂志能在世界上开创一条光辉道路的秘密。”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善使外交手腕，善讲甜言蜜语，并且善于阿谀奉承。

这位杂志的主持人为得到女性的配合而感到十分高兴：“克拉丽斯小姐给我们写的这些文章，是多么富有教育意义和多么宝贵呀！这些妙不可言的短文又会在我们年轻的女读者中激起何等甜美的感情啊！有人说，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女性，就如一个花坛里没有玫瑰花，这是很有道理的。同样，我们也可用这一比喻来形容我们这份教育杂志。科学是有点枯燥的，因此需要有温情，有微笑，有优美的文笔。克拉丽斯小姐那支生花妙笔满足了我们这一切！啊！《师范学校》是何等幸运啊！”在笔头作文中，他善于分辨作者的性别。

在另一篇作业练习中，就更矫揉造作了：“在人类社会里，女性就是眼睛，男性就是手臂。在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女性却要从男性那里学习她应该看什么，而男性则要从女性那里学习他应该做什么。”

对人类之爱是构成拉鲁斯道德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爱也并没有离开他个人主义的轨道。他同蒲鲁东一样，主张保护弱者，保护不幸的人。对伤残军人是同情和仁慈的：“多么可怜的人啊！他们对历届政府都表现出同样盲目的忠诚。而他们所崇拜的那位上帝，就是他们伤残的伟大制造者。这个拿破仑，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来作自己的赌注。向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们致敬吧，无论就他们过去的历史或是今天的处境来看，对我们的敬意都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并且希望，总有一天伤残军人不再仅仅是各国人民愚蠢行动的标志，也不再成为各国君主们骄傲的回忆，尽管这一天的到来是遥远的。”拉鲁斯是把对人类之爱放在对祖国之爱之上的。

有一点使我们非常感动，并且值得特别一提，即他对我们法国海外殖民地的观点，特别是对阿尔及利亚的观点。我们知道，拉鲁斯对可兰经、对伊斯兰教、对穆斯林教徒都表示了特别的敬意。他勇敢地起来反对我国政府对北非各国采取的过分干涉的做法，反对在那里实行残酷的政策使土著居民大量减少。他主张仿效英国的办法，采取“移民”政策。在他去世以后，他的继承者们和他采取同样立场。他们认为一定要在阿尔及利亚找出各种反抗和残酷镇压的原因。“要取消各地的阿拉伯办事处，土著居民和欧洲居民应享受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而至今仍然对宗主国承诺着巨大负担的殖民地人民，他们最终应该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并且应该取得从未取得过的繁荣昌盛。”

社会观念

拉鲁斯一向很重视社会。他从来也没有忘记过他是来自普通的家庭和农村；他不是一个轻浮者。历史对他来说，首先就是日

常生活史、精神生活史、各国人民的经济和新社会生活史。

拉鲁斯认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宗教、哲学方面，他从费尔巴哈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但比蒲鲁东对他的影响要小得多。蒲鲁东的思想支配着拉鲁斯的社会思想，但他又不是这位大师的盲从者。他对蒲鲁东的社会观念，经济和财政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他甚至反对“相互主义”。在他身上，个人主义的成份比集产主义的因素更多。正义和自由就是他的格言。这是法国的社会主义本色。它与德国的社会主义以及美国的社会主义是不相同的。

拉鲁斯对资本绝不温情，对资产所有者和富家翁也是如此。因此他反对建立在剥削穷人基础上的“奢华”和“挥霍”。提到巴黎社会上专做坏事的“黑衫帮”，他说：“难道这就能说明不穿黑衣服的就不是小偷了吗？请大家想一想交易所里那些非法的勾当吧，请大家想一想那些大大小小的工业集团和那些大银行吧，它们的老板可能不再去首饰店里行窃，但却在光天化日之下把那些老实诚恳的股东们扒个精光，这些人反倒比较不担风险。”

拉鲁斯有“社会主义”思想是不会有人怀疑的。这是一种慷慨的社会主义。它始终把注意力放在保卫人权，特别是保护弱者方面。这种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和“正义”。如果说他并不太支持罢工的话，那是他把注意力放在妇女和儿童工作上了。他关心人民教育，关心他们的各种协会，关心他们的工作条件。

正如他同时代的人一样，拉鲁斯相信社会的进步。“到50世纪或者60世纪的时候，人类应该是什么样子呢？这是时代的秘密。自然界的演变是缓慢的。由人类的自身活动而引起的人类自身变革也是如此。可以说，我们只认识昨天。与开天辟地混沌初开至今的几亿万年相比，五、六千年又算得了什么？再说，通过在这么短暂时间内所取得的社会进步来判断未来，你敢于大胆地对

大家说一句：‘你们前面的路不长了’吗？工业只能在两个前提下发展进步，即第一，工业管理人员要取得足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并能养活其家庭的必要报酬；第二，他们文化修养的提高、社交活动的改善、以及为使成为有教养的人的必要条件等，这些应予保证，并且应有劳动制度作保证。”这在1873年来说，可谓尽善尽美的设想，即使一百年以后的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

拉鲁斯已经预见到机械化已面临困境，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坚决地面向未来：“……应该承认，已经落后了的机械工业造成了许多弊端，这是机器进步的必然结果；这种现象各国政府应该尽量使之缓解，但却不应成为人类前进的绊脚石。”

你想看一看现代嬉皮士的画像吗？在“（那不勒斯的）无业游民”条目下就可以看到：“他们依然具有颇富诗意的名声，就象我们当中有的人为了独立生存而往往要摆脱社会羁绊一样。从古代的犬儒主义者，到我们小说中的波希米亚人，乃至到贝朗热的老流浪汉，大家都喜欢赞扬他们这种懒散而自由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使一个人摆脱了各种义务的同时，也使它自己摆脱了各种非议。似乎是，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卷入世俗生活的羁绊之中，但当人们在卷入这个社会大机器中并永远不能解脱以后，有时便不免于抱怨自身命运的不可知，并对那些主张与世无争地过着独立生活的个人和民族常常投以羡慕的、甚至是赞赏的目光。但这种个性的解放以及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完全错误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除了通过个人的活动和劳动所得到的合法财富能使你独立生活以外，压根就没有什么真正的与世无争的独立。”他并且引用了缪塞的诗句，“这位诗人由于对精神生活感到厌倦，便特别渴望能达到一种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的境界；

他们席地而坐很少开口，

或者一丝不挂或者老衣不遮丑。
他们身无分文头靠着一块石头，
他们无忧无虑亦无所求。
不要唤醒他们，
当心叫来咬人的狗。
不要伤害他们，
因为他们都贴耳俯首。
不要蔑视他们，
因为你离开他们便寸步难走。”

政治观念

“自由是诸财富中占第一位的东西。这一命题是使你下笔时文思泉涌并能使文章产生行动效果的最好主题之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失去的自由，甚至最甜蜜舒适的生活也不能代替它……。”这是拉鲁斯对拉封丹的寓言诗《狼和狗》的评论。在大词典“寓言”条目下，他用了差不多两直列的文字来评论这篇寓言。这篇寓言在《师范学校》第四期上已作过分析，关于“自由”的句子也已当成作业做了布置。并且，他自己在另一篇寓言故事中也对此做过评论，那一篇寓言以一支非常著名的歌曲结尾：“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值得追求/它不是别的/就是自由！”在他的墓碑上应该刻上他早已刻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这句话：“自由是诸财富中占第一位的东西。”这也是他最珍爱的格言。

对法国大革命的崇拜，产生了对自由的崇拜。在谈到玛丽·

安托瓦内特^①时，拉鲁斯的结论是：“……我们毫不犹豫地站在民族和自由一边，站在我们的母亲和人类的母亲——法国大革命一边。”

他的大词典有两个特点：反君主政体和反拿破仑。前者可以参看“路易”条目，特别是自路易十四以后的部分。关于后者，在“拿破仑”条目下以及其它许多有关释文中都有体现。拉鲁斯对贝朗瑞和马尔科·圣—伊莱尔写的有关拿破仑的传奇故事颇为反感。

他曾不断地同第二帝国的政权作斗争。“波拿巴”条目的长篇释文（同司汤达一样，他比较喜欢波拿巴而不喜欢拿破仑）是这样结束的：“当我们后面编到拿破仑条目时，我们会以同样的勇气拿起我们的笔。不过从现在到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在奥斯特利茨大桥下涉水而过了，到那时，我们的胡子肯定会白了许多，我们的头发也要大大地变稀了。”

关于拥护共和政体的人，不管他们是否被流放过，他都在释文中加以赞扬。对于后来成为公社社员的人（包括德勒克吕兹）更给予特别待遇，对他们的介绍都是肯定而赞扬的。对费利克斯·皮雅的一个剧本，他都作了赞颂性的评论。拿破仑（波拿巴）亲王，由于他对自由的热爱和反对帝制而受到称赞。随后，拉鲁斯又为为争取共和制而斗争的民主战士们留出了充分的版面，他们的敌人也因此叨光，享受了同等待遇。

对1848年的革命，词典从批判的角度作了热情介绍，但这种批判是严厉的，甚至把这次革命说成是“一次玩笑性的革命”，然而我们却从这种1848年式的理想中发见了作者对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的根源。

^①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奥地利公主，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她极力怂恿路易十六反对革命党，支持保皇分子。她还鼓吹对奥地利作战，但却希望法国战败。1793年10月16日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译者

帝制终于崩溃了。拉鲁斯终于可以明确表示其各种信念了。他正在写“第二帝国”这一条目时，第二帝国垮台了。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在一场革命之后，（这场革命到来得太晚了，它整整晚了18年）今天（9月6日）法兰西共和国终于在多难的祖国大地上矗立起来了。因此，今天是个有意义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874年，他的笔调便开始带有雨果式的强烈复仇味道了。

他对共和国由衷地崇拜，并为此战斗了一生。“共和国”这个词“立刻唤醒了人们要建立一个理想政府的思想，唤醒了人们建立共和政体的思想以及组织人民群众的各类团体的思想……我们的先人是那么向往这样一个共和国。它是所有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想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有健全的法律，有正义，人人都平等，特权废除了，人民团结起来，国家有绝对的主权，并不断进步。弱者和受歧视的人社会地位得到提高，身心得以自由发展，各式各样的暴政均被铲除。这一正义的神灵理所当然地要使世界上所有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惊恐万分，因为它威胁着他们的生存。在完成了它光辉的业绩之后，这个共和国便可以消亡，但它却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共和国存在于人们中间，因为人们绝不会因为它已消亡便遗忘了它。正如古代传说中的凤凰，虽然现实生活中没有，却永远存在于人们中间。”（见大词典“共和国”条目）

拉鲁斯想象的共和国，是带有蒲鲁东色彩的共和国。这种共和国是相互主义的、联邦制的、巴黎公社式的，同时是反集产主义的。它与自由紧密相联而反对独裁、甚至反对罗伯斯庇尔式的共和国。它要负起教育人民的责任。从1861年起，拉鲁斯便为学校非教会化和普及教育而斗争。随后不久，他又投身到妇女文化解放运动中去。他对在文化和信仰上打下民主的基础是有信心的。他细致而又坚定地，勇敢而又坚韧地用他的笔准备着共和

国的到来。

和同时代的人相反，他在政治领域里的行动始终和他的文章和理想相配合，他不象有的人那样随风倒。对这位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应该把他献给菲拉雷特·夏斯勒的铭文稍作修改刻在他的墓碑上：“在近40年的时间里，创作并发表了四十多部各种题材的作品，且在作品中没有一行字同另一行相矛盾；也没有一处表现出任何有悖于为思想独立，为人类自由，为伦理道德而献身的思想。”

宗教观念

在整个19世纪的最后25年内，以及其后的年代里，拉鲁斯是以一个坚定的反教权主义战士的形象而闻名于世，他甚至还是一个反宗教主义者。我们谨举让·拉科斯特为土西纪念碑落成而写的一篇文章为例：

在“批评方面，他嫉恶如仇。他诅咒教会和旧法兰西。只要或多或少与专制制度和教会有关联的，都受到他的谴责。不管是谁，只要他是个天主教徒，或者是保皇党人，都被他目为思想平庸和危险分子；不管是谁，只要他攻击过王朝或教会，就会因此受到他的赞扬。有时候他的合作者们也会起而反对他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们，但由于他在选择合作者时非常严格，或者是非常年轻者，或者是只知埋头苦干的人，而经常则是两条兼备的人，因此他们便很易被说服，从而使他很轻易地摆脱困境。所有大词典的编写人员都知道他们这位主持人在这方面有点固执，甚至有点专断。他属于那种随处可以迅速地大量繁殖增生的品种，一个自由思想家，他总爱把自己的自由思想强加给所有的人，还常常把得来的材料重新加以组织，以便加强已融进他自己意见的论点。……

他立志要编一部词典以取代过了时的阿朗贝尔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并要有所发展。他非常清楚一部词典在理想宣传方面所具有的力量，尤其是在他非常巧妙地把大量细节和大量资料组织在他的词典里以后，便更加提高了他词典的这种力量。他几乎使他的大词典成了当今新闻界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

如果说，在拉鲁斯的作品中有仇恨和好斗情绪的话，那么在上面这篇文章里也有这个毛病。拉鲁斯意识形态上的对手阿道夫·拉科就曾对我们说过，评价拉鲁斯词典的观点必须考虑到他的专横（！），考虑到他选择合作者的苛刻，以及同事们对他的感情等。那么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拉鲁斯对教权主义强烈的憎恨，有时甚至反对宗教，其根源何在？

有一件事最使我们感到惊讶，即在他办的两份教学杂志和他的教科书里却充满了对宗教的尊敬和有关宗教的例子。这可能与大量出版的宣传宗教的文章有关，但尚属悬案。

有几件事值得一提。直到1881年在所有的学校里，宗教教育还是强制性的。在第二帝国时期，尽管帝国反对宗教干预政治，但它的政府却是笃信宗教的政府。另一件事是，拉鲁斯两份教学杂志的大部分订户都是私立学校或是教会学校的人。

第二帝国很明显是受到宗教界支持的，在其建立之初尤其如此。在它统治时期，作家们在这方面不敢讲真心话，于是在新闻界和文学界就出现了为数颇不算少的一批因循守旧，甚至虚假伪善的人，合法的宗教势力在各教育团体占据要津；许多师范学校都由神甫领导，各种民间仪式中总是加杂着宗教仪式。

当时绝大多数的读者是教徒，他们都订了这两份教育杂志并享有特殊待遇。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对于在杂志竞赛项目中获胜并登上荣誉榜的私立学校学生，拉鲁斯便不间断地向他们提供有关教会的各种信息。他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给这些众多的订

户和读者带来不快。

拉鲁斯对圣经和与天主教有关的知识极其丰富。圣经中许多不太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事件，他在写作时都能信手拈来。仅在他《历史的花絮》一书中，就出现了至少十几个圣经人物。至于他的教学杂志上，圣经人物和圣经故事更是比比皆是。

米克罗梅加这个人物是作者的化身，在《师范学校》第2期和第4期上就曾提到。他经常去听《圣母痛苦经》，并且每个礼拜天必去教堂做弥撒。

拉鲁斯对种族主义曾以《新约全书》的名义进行过谴责。其时是1858年，距美国南北战争尚有3年！“他们也是人，而所有的人都应是‘兄弟’，这是圣经教给我们的。对于黑人，一种世俗的偏见使你歧视他们，但他们也和你一样，属于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他们可以做到和你同样聪明，只不过要经过长时期的文明教育而已。”对学生的体罚，他也同样以圣经为依据给予谴责：“我们应按圣经告诫我们的道德标准行事；人们要互相爱护，以德报怨。这是一面仁慈的大旗，所有的耶稣门徒都应在它的引导下前进，这就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法典。”就这样，基督教式的道德观不断地被他所宣扬，各类学者所表现的宗教特点都受到他的赞扬，他并认为社会生活的基础便是宗教。

一有机会，他的同事们便为自己杂志的正统性作辩护。但他们的领导者却奉行着思想上兼收并蓄的政策。许多思想，以及许多思想的发挥，都是来自伏尔泰、孟德斯鸠、培尔、卢梭和其他一些思想家。这些人，才应该是拉鲁斯名符其实的老师。因此我们不禁要想，是否就是在这时，他思想上转到反宗教方面去了？而这一转变是否又是由于孔特和蒲鲁东、米什莱、基内和勒南，以及受到证实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影响而催化？这种演化的痕迹在维克多·雨果身上，以及同时代其他大学者身上都有所体现。

从蒲鲁东的“改换门庭”可以证明我们的看法。拉鲁斯原先并没有宗教思想，和拉鲁斯相反，蒲鲁东原先却是个虔诚的宗教徒，甚至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但为了保卫人权和保护穷人终于变成一个教会和上帝的强力反对者。他认为天主教使他的名誉在政治上受到损害，因为这个宗教总是和政权联在一起，它只是对穷人进行逆来顺受的说教，并让他们一心一意地为富人劳动，这样它便不可能去保护穷人。这个宗教所持的宝塔形的社会结构观念、天意论、安于天命等观点，激怒了站在人民和自由一边的蒲鲁东。同样，拉鲁斯也知道，（他那个时代的）基督教是自由的敌人、进步的敌人、共和思想的敌人、科学和人类幸福的敌人。我想，这便是促成他转变为反基督教战士的原因。

各种思想的冲击、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演变，人类的偏见和教育的缺陷，动摇了拉鲁斯的传统信念。在宗教、帝制同革命、自由、科学、人民和共和制之间没有调合的余地。在第二帝国时期，他还只能间接地表达他的思想而不敢公开摊牌。他只一般地表示自己严格尊重各种信仰，并且十分谨慎小心，有时甚至单纯为了博取好感。比如他常向一些宗教徒们约稿写一些技术性的文章，有时在文章后面加上一个表示怀疑或略带讽刺意味的按语也在所不惜。第二帝国以后就不同了。他表现出一个战斗思想家的热诚和激情。他的著作就是一个反宗教的武器库。

自1865年开始，继拉芒奈之后，拉鲁斯便鼓吹政教分离，“只有自由联合，才能使宗教或者新教派同政权分离。这也正是信仰自由的必然结果。”

总的说，拉鲁斯对宗教意义上的那种精神生活并不感到需要，但他对上帝的信仰似乎并没有受到触动。他的一位外甥朱尔·奥利埃（也是他的信徒）就是在教堂里举行的结婚仪式，并始终是一位虔诚的教徒。

1971年11月7日星期日，巴黎米歇尔—昂热大街的玛丽—雷巴拉特里斯女修道院举行该修道院和它的图书馆创建100周年纪念会，会上宣布把该图书馆命名为“拉鲁斯图书馆”……。

文学趣味

对于文学的爱好，也是拉鲁斯观念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此我们曾概略地提起过，现在拟详加叙述。我们还将同时附带提一下他的大词典对文学史研究者所提供的无与伦比的财富和宝藏。一个文学史研究者如果能发现一部与巴尔扎克、梅里美和维克多·雨果同时期的书，并且书中又提供了这些人物的大量轶事和各种有关资料，那他们将会感到这是一种巨大的、出乎意外的收获！这样一部书是存在的，它就是拉鲁斯的大词典。

为说明该词典的信息价值，我们谨举“作家”一条的释文为例：弗雷德里克·苏利埃为发表《魔鬼回忆录》一书，就提取了5万法郎，而“拉马丁的《沉思集》，花了许多力气才找到了一个出版家，出版后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便销售了45,000册。用这笔巨款，拉马丁在1832年和他的夫人及女儿乘坐全部由自己装备的船只，到远东作了一次帝王之游。他在每个住脚之地都购置了房产，出入都由马队护卫，并由所在国家的王公贵族陪同。”而乔治·桑的《安蒂亚娜》出名后，每年可以收入4万法郎，“仅这一数目就足以说明她的天才是出类拔萃的。”雨果的《悲惨世界》版权权卖了40万法郎。在此之前，有人只花了300法郎便买下了他的《冰岛魔王》的版权。“一部作品的价格并不总是由该作品的文学价值来决定的，新闻小说、丑闻秘史之类的东西曾不止一次地冲击了作品的实用性及其文学价值。就在蒲鲁东在近乎凄惨的情况下去世的那一年，一位咖啡馆里的歌女写了一本自己的

回忆录，就拿到两万法郎。”

拉鲁斯的文学兴趣非常之广，对外国文学也广泛涉猎。他高度评价莎士比亚和歌德，赞扬维龙、拉伯雷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的新派作家，特别赞扬拉封丹及一部分他同时代的寓言作家。

“对伟大的开山鼻祖如莎士比亚、歌德等，现实主义绝不排斥其作品的理想化，在没有让布鲁托斯、安东尼和凯撒走上舞台之前，莎士比亚让罗马的补鞋匠同马车夫用粗俗下流的话交谈^①。他让那些围绕在朱丽叶棺木周围的装殓尸体的工人和吹鼓手们满嘴讲一些粗俗的同音异义语和嘲讽的语言。这并没妨碍那些历史人物，或者说臆造的人物如安特瓦那、凯撒、罗密欧、朱丽叶等人的纯理想化。他就是通过这种互相掺杂的手法体现了生活的复杂性。同样，歌德的现实主义也不把小人物、地位卑下的人、家庭纠纷、家庭感情、市民语言等排斥于戏剧或小说之外。”

由此可以看到，他爱好的方向在转移，即转到大众化，高卢化和趣味性方面来。他说：“我国16世纪的文学是这种文学，即它们是我们民族道德风尚的产物、教育的产物、思想的产物、也是包括法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互相融合的产物。但这种文学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人们摒弃了蒙田的语言、蒙吕克的语言以及拉伯雷的语言而模仿希腊文学，这便是龙沙和普雷亚德学派。从偏离轨道的路上运转来以后，我们又把希腊人给法国化了，这便是17世纪的古典学派。到了18世纪，如果说哲学得到了解放，而在文学方面却仍然拖着上一世纪的尾巴在步履艰难地移动着。只是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才有了比较伟大的创新之作。这些作品或是回到老的传统上来，重新拿起维龙和拉伯雷的语言，或是

^① 布鲁托斯、安东尼和凯撒都是莎士比亚剧本《裘力斯·凯撒》中的人物。他们是上等人、贵族，语言高雅、讲究词藻，如安东尼和布鲁托斯的演说，有的是散文诗或散文体的文即无韵诗，语言庄严有力。这与前面那些“下等人”的语言形成鲜明的对比。——译者

因受外国文学的启发而问世……。文学的国际性打入我国，在文人当中是如此，在道德风尚上也是如此，只要看看在法国发生的情况就够了。我们有两位伟大的英国式诗人，一位是湖畔诗人拉马丁，一位是拜伦派诗人缪塞。还有一位是卡尔德隆^①时代的纯卡斯蒂利亚^②人，他就是维克多·雨果。然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却是更加绚丽。它更多地打上了民族精华的烙印，却更少地受到邻国的影响。这种文学上的互相影响，其后果便是创造性的削弱。”（大词典“文学”条目）。

从这时起，我们便了解了拉鲁斯对于各时期法国伟大而光辉业绩的态度，这些业绩都具有法兰西骑士风度。我们也了解了他对大查理一世^③和圆桌骑士的态度，了解了他对拉伯雷、蒙田、莫里哀、拉封丹以及博马舍等人的态度。例如莫里哀，他认为他“是所有喜剧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1873年拉鲁斯曾为他逝世200周年举行纪念会。又如夏多布里昂，他“是19世纪初期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20多年中，他对文学有着绝对的影响，甚至远达国外。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文采绮丽、想象丰富、敏感、热情、雄辩、色彩鲜明、表现力强并且多产。”此外还赞扬了他的“共和主义思想”。……

一提起拉封丹，拉鲁斯便赞不绝口。他从未间断过对拉封丹的分析和评论。他说，他的才能属于世界各国人民，“他是无与伦比的。他还在世时，人们便称他是‘无法模仿的人’，时间证明了这一评价的正确。他可以说是后无来者……但令人遗憾的

① 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1600～1681），17世纪西班牙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和戏剧家。——译者

② 位于西班牙中部地区，卡尔德隆的故乡。——译者

③ 大查理一世（742～814），法国国王，后来是西罗马帝国的皇帝。

——译者

是，人们大都忽略了其作品的文学性。我们的孩子学习拉封丹的寓言故事，但却不理解拉封丹的思想。他们只知道嘲笑青蛙的自负、乌鸦的愚蠢……但其中那深刻的教育、那调皮的天真、那细腻的笔触，则统统被忽略。待到他们长大成人，可以理解拉封丹时，却又不屑于再去读一遍他们过去所学过的东西了。夏多布里昂曾说过“我现在才开始理解拉封丹的寓意”，这话多么深刻！如果说他没有被那些传统的模糊观念所俘虏的话，那夏多布里昂是用了30年的时间才开始了解他的。拉封丹是法国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寓言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并且已经成为世界上普遍的读物。”拉鲁斯还引用了费奈隆对拉封丹赞扬的话：“阿那克雷斯善开玩笑，却没有他典雅；奥拉斯善用诗意阐明哲理，却没有他丰富多采、引人入胜；泰朗斯善写人的风习特性，却没有他那么自然多彩；而维吉尔的文章又缺乏他那种感人的力量和音调的铿锵和谐。”

勃艮第人

前面我们已对拉鲁斯的某些特点作了介绍，而通过他的观念形态了解他，现在我们拟从另一角度归纳他的性格特点，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典型的勃艮第人性格；第二，善良、正直；第三，博学多识、兴趣广泛。

他是一个乡下人，而且是勃艮第的乡下人。这是个轴心，围绕这个轴心形成了他的许多特点。

他在大词典中对波尔多葡萄酒和勃艮第葡萄酒作了详细比较，他说，两种酒，一种是淡黄的，一种是棕红的，在对每种酒都作了一番着意的赞扬之后，我们这位朋友便带着偏心的口气下了结论：“如果说波尔多酒代表金发女郎、代表晴朗的白昼、代

表合法的女人、代表清水熟肉和烤牛肉的话，那么勃艮第酒代表的便是棕发女郎、美妙的夜晚、情妇和果酱。高乃依说：

如果你能够，那你就猜一下吧，

如果你勇敢，那你就选一个吧。

在他说过这两句话后，我们也这样说，不也是很合适吗？”

类似的情况在大词典中有大量条目，其口吻，由思想上的轻薄，转而发展到放肆了。他把一切都放进自己的词典里，如文字游戏、隐语行话、讽刺奚落、粗俗笑话、娱乐玩笑、俗语村言、勃艮第式的戏谑、有时甚至出现些低级庸俗的东西。……我们有如面对一个中世纪农村的故事员，向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述五花八门的物事。但这并没使人感到不快。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喜欢说笑、欢快乐观的形象，就象桌上摆有各式酒菜一样，这也是一个活生生的老好人的形象。如果少了这些，词典也就失去了个性和特点，失去了生动活泼的色彩。

此外，幽默诙谐但却稍欠思索之处也随时可见：“学者们（从这些学者身上，特别是德国学者身上，我们常常看到由于知识太多而显出一股呆气）都想证明荷马从来不是盲人。”再如神甫和酒鬼的故事，被阉割的猫如何遭到母猫的歧视，以及无穷无尽各类“故事”等等。对“粪便”一词，大词典作了大量发挥，在讲了一个比较放肆的故事之后，下边点了两行删节号，接着又写道：“我们只好在此打住，因为这太过份了，我们把这个故事留给某一位更大胆的20世纪百科全书的作者去煞尾吧，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还过于羞怯和讲究道德。我们的那些女慈善家们，现在已给我们作出了过于端庄的榜样，她们是宗教的上天使者，可能都用轻纱遮住了面孔……那么，让我们的某一位后人来向这个比较丑恶的故事冲刺吧，如果他有勇气的话。”

关于他粗犷豪放的性格，还有一个例子，即拉鲁斯对富兰克

林的评价，在提到人们对他的责难后说：“我们不要让这些评论牵着鼻子走得太远，这些评论家都是些面色苍白的大人物，只能是狂犬吠日，他们只知道迷信于修身养性，就象印度的乞讨行者一样。他们一生就只见到自己的肚脐眼。有人说富兰克林把‘实用’奉为神明是罪过，而对我们来说，‘实用’则是最美好的光荣课题之一。这个‘实用’的神明永远属于美国，它才是真正可以获得进步的‘希望之乡’^①。富兰克林是他的国家向前发展中最大的形象，他的名字也是美国人才能的最高体现。从物质观点看，这个伟大的名字比其它国家在这方面的人物毫不逊色。由于富兰克林的才能和他的工作，并由于他在18世纪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心悦诚服地肯定他是一个出众的人物，而无需把他的名字同苏格拉底或索龙^②相提并论。他自己也从未自认与他们相像。”拉鲁斯身上没有一点飘逸的浪漫气质。他的双脚踩在实地上，他崇尚实际，不务不着边际的空谈。甚至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仍然保持着一个勃艮第的农民形象。

善 良、正 直

拉鲁斯的生气勃勃、精力充沛，使他成为一个泼辣肯干的人。这种泼辣肯干含义甚广，如抱负远大、工作勤恳、处事宽厚、慷慨大方。《法兰西新书目录》专栏在他的简历中曾提到这一点：“由于事业的成功，使他的条件十分优越。他本应藉此颐享天年，他的朋友们也曾这样劝告过他，但他不知疲倦的性格不容他在各种棘手的问题面前退步抽身。这些棘手的事主要来自他

① “希望之乡”见圣经，指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译者

② 索龙（前640～558），古希腊的执政官，政治家。具有民主思想。

的大胆尝试，即由于他那部《19世纪万用大词典》的原故。不管人们对这部著作怎样评价，它也将会永远存在下去。它的编者的名字也将永远被人们所铭记。他性情和蔼、心地善良，而他的慷慨宽厚又赢得了同事们的尊敬。”

关于这一点，舆论也是一致的。1877年1月3日，在蒙帕尔纳斯公墓举行了他的纪念碑落成式，大词典排字车间的代表、校对工艾·布米致辞说：“……由于他来自真正的人民中间，而他的成功又完全靠了他出色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因此拉鲁斯就特别了解和热爱劳动者……在巴黎地区，由于生活费用上涨，提高工资势在必行，但在这之前很久，即生活费用刚开始上涨之际，他就自动地给印刷厂的工作人员大幅度地提高了工作报酬。……由于他自己是勤奋和积极的，所以他也要求他周围的人勤奋和积极。他的印刷厂声誉非常之好并且奉公守法，因而大家都以被录取在其中工作为荣。今天，这种声誉依然存在，在巴黎地区的排字工人，凡曾参与过《19世纪万用大词典》排字工作的，都把这作为自我推荐的先决条件，并把它看作一个荣誉称号。”这一简单而感人的讲话使我们看到了排字工人对他们主持人的热爱之情，并使我们了解到他曾自动增加工资、他的印刷厂的名声、以及他的慷慨解囊之举。

大词典增订本第一卷上关于拉鲁斯的条目释文中，也部分地列举了上面的讲话，同时也引用了《民族未来》杂志上所介绍的关于当年大词典着手之初的情况：“拉鲁斯先生在一次致读者和报界的信中说：‘在这方面，不管你们同意或者不同意，也不管你们议论还是不议论，总之我已做好了准备，并已踏上了征途，志愿者可以同行。’他已经出发了。在这一切都使人怀疑的时代，对我们最负责任的，就是信仰，哪怕是乌托邦式的信仰。现在，我们曾试图对他作一个了解，因为我们除了对这位热情而善

良人的怀念之外，已不可能再做什么事了。拉鲁斯的逝世，使文学界失去了一位名人，一位自由思想家，一位热情的保卫者，使独立派艺术家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辩护士，而对那些曾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们来说，失去了一根支柱，工人们则失去了一位慈父。”

许多记者也曾回忆他对处境困难的文学家们巨大的援助。

“几乎所有的新闻机构都对这位善良的人很关心，都特别强调了他高尚的品德，但有一点却为大多数对他热情回忆的作家们所忽略，那就是他对困难的文化工作者慷慨援助的优秀品德。在经济上受他帮助的人，数目之多已无法统计。……”

博 学 多 才

《法兰西新书目录》在拉鲁斯的简历中，对他作了如下介绍：“对文学美有灵敏的感应，喜爱花木并以此自炫，而对美术作品却表现很冷漠。哪怕是沃热拉^①或是孔狄亚克^②的一行字，对他所起的作用也远比拉斐尔^③或者吕宾^④们最受称道的作品所起的作用要大。他走在所有学术研究者的前面，成了一位多产的语法学家。但这绝不是说，他培育出的果树可以毫不费力地自然结果，相反地，他是花了大力气、克服了大困难，方获成功。他思想上的宏伟蓝图也是经过反复修改方始画成。他对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竟不是科学院会员。他获得的唯一美称是：他是一位著名的商人！可以100%地肯定，他所追求的，绝不是这

① 沃热拉（1585～1650），法国语法学家。——译者

② 孔狄亚克（1715～1780），法国哲学家。——译者

③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译者

④ 吕宾（1577～1646），比利时和法国交界处佛来米人，画家。——译者

种称号。”

这篇文章颇有意思。我们引用它，是因为它把拉鲁斯对文学的爱好放在首位，而否认他的艺术触角。说拉鲁斯喜欢书籍甚于雕塑和图画，我们完全赞同。说他对各时期的绘画艺术不感兴趣，这无疑也符合事实。但我们却不认为他对艺术是个门外汉。美术作品在他的词典中占据很重要位置，这不仅表现在他直接写成的条目释文中，而且还在历史人物部分补充了大量肖像画的释文，地理风光画的释文。此外，对古代艺术、近代艺术和现代艺术，他的词典都有介绍。

在这方面，他师承蒲鲁东，但又不是亦步亦趋：“蒲鲁东无疑是对的，因为他考虑到了一个活的社会，考虑到这个社会里的风习、爱好、向往、发展趋势等足可给艺术家以灵感，并且足以向他们提供有关的、强有力的主题。无论从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的观点看，都是如此。但他却过于拘泥于自己的哲学观点，他没有感应到纯物质的美，没有感应到一幅美丽的画面或一尊美丽的雕像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魅力。他只要求艺术应有实用性和说教性，但他却忽略了艺术的目的首先应有欣赏性，与此同时也要提高其思想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件艺术品首先要赏心悦目。”

确切地说，拉鲁斯对一切都感兴趣，他对一切都有深厚的知识根底。他的文化知识极其渊深博大，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渊博学者。我们已经知道，他喜欢散步，甚至喜欢在街头闲逛，他喜欢现场观察街头上活的场景；他随时随地都注意考察名胜古迹，观察各类人物、各种职业特点、各种风俗习惯等。他并且是轻罪法庭上惯常的旁听者，他就象一个老实的普通市民一样，对犯罪故事非常感兴趣。……

我们还发现他喜欢收藏书籍、喜欢音乐，而尤其对戏剧有特

殊爱好。

许多资料表明，拉鲁斯尽管不停息地工作着，他仍然经常去剧院看戏，至少，在他一生的某个时期是如此。他不仅和费利克斯·克莱芒合编了《歌剧词典》（最近该词典又在美国重印），他不仅详细地评论过各种剧本，其中也包括在巴黎上演的一些历史剧目，而且他还对各类有关戏剧的问题有新颖而独特的见解。

如果把他为之作传的剧作家和演员的名单全部列出，需要几页的篇幅。仅剧作家斯克里布，他就举出该作家的剧本达数百种之多。他的大词典就是现代戏剧史的宝库。

无论哪方面的内容，如技术的、行政管理的、政治的、历史的、地理的、实用科学方面的……等等，他都非常关心，并且有精辟而独到的见解，有时甚至具有预见性。

由于他能高瞻远瞩，站在时代的前面，他衷心号召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大词典中也指出了解决欧洲局面松散的办法。如果说，从未来的观点看问题，他热衷于联邦制的话，如果说借鉴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样板，为维持欧洲现存的局面而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的话，那么，他认为以下三个原则就足以解决各自为政、权力过分集中在分散的各国这一弊端，并可有效地实现自由化。这三个原则是：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区别开来；把个人和国家区别开来；把最大的管理自由交给个人或管理集团，并逐步扩大选举的范围，并且各级人员都要实行有效的责任制。在遵循蒲鲁东的原则的同时，拉鲁斯反对集权主义。他的这些观点到目前仍有现实意义。

他很注意对这一理想的宣传工作：“世界各国的公民们，一切把祖国利益放在第二位而把全人类利益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人们，请你们记住：良心才是世界的公民。”这一思想大约是从马

尔科—奥莱尔^①那里来的，因为下面便引用了他漂亮的句子：

“作为安托南家族的成员，我的祖国是罗马，作为一个人，我的祖国是世界。我们大家都是世界公民、都是兄弟，我们应该互相爱护，因为我们生命的源起是一个，同时又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拉鲁斯大约很喜欢这位皇帝的品德，他说：“马尔科—奥莱尔认为个人信仰是至高无上的。这种信仰是我们行动乃至我们思想的最高法官，我们没有权力干涉并反对这种信仰。”他也支持平等的观点，曾说：“亚历山大国王^②、他的骡夫和那些战死的人都享有共同的生活条件。”为善而善，是他的理论，这和塞内克^③的理论一样：“行善吧，因为这是你的天性所使，但不应该要求报酬。”……

1871年4月19日，小仲马在给乔治·桑的一封信中赞扬了他已故的父亲（1870年12月5日去世），几年以后，拉鲁斯也去世了，我们也应该用小仲马的话来纪念拉鲁斯：“在此期间，我反复地读了他的著作，对他那种无比的热情，那渊博的学识，那滔滔不绝的话语，那善良的性格，那宽厚的思想，那优美的笔调，那强大的力量，以及那种激情，那种坚强的个性，那种对事对人不同凡俗、不因袭前人的深刻而有见地的理解，简直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总是那么开朗、那么准确、那么清晰、那么完美、又那么天真而善良。”

① 马尔科—奥莱尔（121~180）诞生在罗马，被罗马帝国皇帝安托南收留，并传位于他（161）因而继承了皇位。他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译者

② 亚历山大又称大亚历山大（前356~323），马其顿国王，曾夺取了巴比伦，但他的军队最后也死光了。——译者

③ 塞内克（前65~4），西班牙哲学家。——译者

第七章

悲剧性的余年

(1869~1875)

那是悲剧性的年代。按雨果的话说，是可怕的年代。对拉鲁斯或是对法兰西民族都是如此。对法兰西来说，一系列的灾难接踵而来：1870年的战争，巴黎围城，巴黎公社的战争及其灾难性的后果。对拉鲁斯来说，他身体健康状况一天天在坏下去，直到最后完全丧失了智力。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巴黎的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它表面上繁荣景气但却麻木不仁，镇日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金钱第一，但另一面却也有着和外省生活似的安定平静的生活。拉鲁斯的一位同事在1877年曾回忆说：“我年轻时，巴黎并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口，也没有这么大。也不象现在这样，无论是广场上、公共游乐场还是大街上都是这么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我记得那时每逢星期日，便有许多男女及青年人三五成群或最多十几个人聚集在房前屋后，或一部分人在门洞里，一部分人在露天或坐或站很随便地呼吸新鲜空气、聊天、说笑、打闹，不时发出快乐而爽直的笑声。这比在啤酒店或咖啡馆里看歌舞、杂耍，空气要新鲜多了。在每一家酒馆或啤酒零售店门前都设有投饼游戏

箱^①，整个下午便只听见铜饼或者铅饼和箱上的铁标号撞击的声音。这些铁标号有的是10分，有的15分，有的1000分不等，再就是参加游戏的人的欢笑声。在巴黎各城门下，或在公共游乐场设有九柱戏^②或圆盘游戏^③，有滚球游戏，有网球场等各种球类游戏。”当时巴黎是无忧无虑的、欢乐的，同时也是单纯的。那些战后余生的老人和巴黎公社时期的人回忆起那时的巴黎，都充满了眷恋之情。……

健康状况不佳

身体一直很好的拉鲁斯，这几年开始走下坡路了。1866年他还向前来看望他的同乡都什医生骄傲地说：“你看我象个肺病患者吗？”都什回答说：“根本不象，你象个大力士，我保证你没有肺病，也保证你神经很健康。”然而神经过度疲劳是会受到惩罚的。尽管他原来很健康，但在连续几年内他每天都工作14~15个小时，因此恶果便显现了。

大词典增订本第一卷初次向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情况：“……人的力量是有限度的，拉鲁斯就是被大量而繁重的工作压垮了。他在1867年时说：‘我必须每天工作15~16小时，这样还得连续干3~4年。不说到那时能发表我的著作，至少希望到那时能完工，这样我就可以休息了。或者说，如果需要我付出生命，我那时也可以心甘情愿地去死，只要我的大词典能完成。’但这一预言并不准确，到1868年他便已感到病痛开始向他袭来，他不但没因此而略事休息，反而以加倍的热情努力工作。他坚强的意志

① 该箱上开有若干槽口，分别标有分数，把金属圆饼投入者得分。——译者

② 一种用球击倒远处设置的九支木柱游戏。——译者

③ 一种用圆盘击倒九根木柱的游戏。——译者

是可以克服自然规律的。但1869年的一场大火使他的手稿受到严重威胁，从而使他的思想受到一次巨大的冲击。而当凡尔赛的军队开进巴黎以后（1871年），他发现他的著作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时，他本来已经受到损害的身体便很快地恶化了。在这同时，他老母的去世又给了他最后的一击，于是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样一位不知疲倦的勤奋者、深刻的思想家、思想如此活跃的人，从此便不得不辗转病榻过着一种纯物质的生活。无论是尼斯的宜人气候，还是普隆比埃或迪沃诺的温泉，都无济于事，瘫痪从此就紧紧缠住了他，并且没有任何办法控制它的发展。他就这样生活了三年。如果说这样一种存在还可以称为生命的话，那么这种生命的延长，是来自一位完全配得上拉鲁斯这个名字的一位善良女性，来自她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悉心照料。但病情最后一次发作，终于使他彻底垮了下来，于1875年1月3日痛苦地死去。他的那部巨著，如果说尚未全部出版的话，至少是完成了手稿。

一般地讲，我们认为他得的是脑血栓和瘫痪症，有三次大的发作。第一次在1868年，比较肯定的说法是在那年年底；第二次在1871年，即公社事件发生和他母亲去世（10月21日）以后；第三次，也是决定性的一次，是在1874年12月，他身体的全面衰退始于1871年冬季到1872年初。“由于过度疲劳，他有三年的时间瘫痪在床，无论是伴侣无微不至的心灵上的关怀体贴还是名医灵药对身体上的治疗，都不能稍减其病痛。在此以前，他的朋友们就预料到一个不样的后果在等待着他。只有拉鲁斯夫人存有幻想，希望通过自己的悉心照料而战胜死神。她对自己承担的这一义务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对那颗经受过许多苦痛的心，给予了它所需要的安慰……。他就象一个敢于下大力气干活的矿工，终于被过于沉重的大块煤炭压垮了。的确，长时期的灯下熬油，头脑始

终处于紧张状态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为这部巨著献出了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而且是巨额财产和生命。但这部巨著一开始却受到一部分读者的怀疑，就是他自己也曾犹豫过。但他最后终于看到了这部作品受到普遍欢迎并取得成功的实际情况。”（见《法兰西新书目录》）

我们在此想介绍一个人，此人的命运与拉鲁斯紧密相联。他就是拉鲁斯的外甥兼代子朱尔·奥里埃（1842~1909）他父亲朱尔·亚历山大是一个面包商的儿子，1842年3月与拉鲁斯的姐姐索菲亚·玛丽一路易斯·拉鲁斯结婚。她是拉鲁斯唯一的姐姐。当时亚历山大和索菲亚在土西开了一个小客栈。朱尔·奥里埃是他们家族同代人中留下的一棵孤苗。父母亲和舅父拉鲁斯对他特别疼爱，拉鲁斯把他看成自己的儿子。他在奥赛尔上完中学以后便研究农业知识，后来改学法律，他的志愿是想在荣纳省取得一个法律公证人的资格，但经他舅舅的要求，经常到巴黎来协助管理大词典的编纂事务。他不能不这么做，因为一来他一直把舅舅视作自己的父亲，二来自1869年以后，这一工作的经济业务已由拉鲁斯一人承担了。

拉鲁斯的经济管理办法非常简单，他有一个装钱的抽屉，每当他要向同事或提供资料者付款时，就顺手从里边向外抓，直到抓完为止。作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不善于理财和造预算之类的工作。因此他需要一个行政管理人员作助手，朱尔·奥里埃是最好的人选。

在脑血栓第一次发作以后，拉鲁斯便决定他外甥来巴黎定居并永久性地协助他工作。当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时，朱尔一直守候在他身边，帮助拉鲁斯的女友照料他。1871年拉鲁斯由于工作劳累和对当时那种混乱状态的忧虑，病情有了新的发展。医生们把这位高血压患者送到尼斯、送到普隆比埃、送到第沃纳去

疗养，甚至还把他送到瑞士去住，以为那里的气候对他健康有利，每次朱尔都陪着拉鲁斯和他的女友一同前往，然后再返回圣母广场大街的印刷所。这时大词典的印刷工作和其它管理工作便落在他一人身上。在拉鲁斯临终前的三、四年间，已不能担负正常工作了。1874年12月，最后一次发作。这是致命的一次，经过几天的弥留期，终于拖到1875年1月3日清晨便与世长辞。享年57岁又两个月。在词典的题铭上，他豪迈地并且骄傲地写道：“这是我骨骼的骨骼，肌肉的肌肉。”他的巨著熔融着他全部的热情，损耗了他健康的身体。这部巨著贯穿了他的生与死。

印刷厂的出货及分离

拉鲁斯和布瓦耶的正式分手当在1869年春季。这年4月1日，奥古斯坦·布瓦耶和他的两个侄儿埃米尔·莫罗（28岁）和奥古斯特·莫罗（25岁）创办了奥古斯坦·布瓦耶联合公司，地址就在圣—安德烈—德札尔大街49号。该公司便成为当时唯一的一家教科书书店。两年以后，保罗·吉龙也参加了该书店的工作。

尽管拉鲁斯热情极高，但仍未能说服他的伙伴自始至终地参加大词典的编纂工作。两人分手了，但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大词典已出到第七卷，上面仍印着“拉鲁斯—布瓦耶书店发行”字样。教科书和大词典的发行工作由布瓦耶书店承担，拉鲁斯自己著作的印刷工作则由其本人负责。不论在1875年拉鲁斯墓前，还是1877年在拉鲁斯纪念碑落成式上，奥古斯坦·布瓦耶都是以他挚友的身份出现。人们甚至怀疑，是否在这两位同乡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即为了不使两人的事业一损俱损，为应付万一会出现的变故，才决定把各自的财产分开。但据

安托尼娜回忆，两人的分手又似乎使拉鲁斯感到非常之痛苦，其时他身体状况已开始坏下去。

有一份手抄件记录了自1812年10月~1870年9月10日之间巴黎地区具有开业执照的书店名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1869年7月2日，拉鲁斯辞去书店业务，由奥古斯坦·布瓦耶代替。但在1870年的书店年鉴上，在书店经营人的名单里仍然有这样的记载：“拉鲁斯，拉鲁斯—布瓦耶书店经营者，印刷厂厂主兼书店老板。地址：圣—安德烈—德札尔大街49号及圣母广场大街49号”，该年鉴第46页上，还录有印刷厂厂主名单：“拉鲁斯（皮埃尔），1869年，‘博尼法斯’，圣母广场大街49号”，这条的意思是说，拉鲁斯在1869年从一位名叫尼博法斯的人那里接手了这家印刷厂。

1869年的《世界画报》杂志记载了1869年7月24日发生在该印刷厂的一场大火。火势在印刷厂新建和修建的各车间蔓延，并殃及周围木结构的各个大型仓库，很快便形成灾难性的势态，并威胁着邻近和街对面的房屋。马克西姆·沃维埃曾亲见这场大火并在7月31日的《世界画报》上作了介绍：“大约有300余辆大车停在各车间上面当仓库用的阁楼上。这些仓库都是木头结构。当天夜里近11点时，住在圣母广场大街印刷车间对面的一些人，发现一个仓库的屋顶上有火光，马上便感到这是不祥的征兆。接着便响起了警报，附近的居民都起来了。火势越来越大，火苗越升越高，以致蒙帕尔纳斯大街以及更远的圣—米歇尔大街、美迪西斯大街上的房屋，甚至先贤祠的圆屋顶都被火光照得通明。大团的浓烟笼罩了整个塞纳河左岸的南部地区。当时正刮着北风，天气特别凉爽，火灾周围地区如圣母广场大街、瓦凡大街、布雷阿大街等地的居民都忙着搬运物品，街上堆满了家具，情景十分狼狈。幸而风向有利于防范措施，因之，位于斯坦尼斯拉斯大街

上的第二幢建筑物由于街面宽阔而幸免于难。直到晚上5点钟，废墟下仍然冒着小火苗……”。

可以想象，当拉鲁斯看到他用一生的心血经营的作品受到威胁时，何等惊悸。大词典的全部手稿都堆放在书店里，那正是易燃物品。当时，他站在高处看着他的手稿正面临着毁灭的危险，

“这使他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刺激”，对于一个正在被心血管疾病缠身的人来说，这一打击无疑会使他身体更加恶化并会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

但还必须继续工作和活下去。因为词典的各分册必需出版，如不能定期出版，至少也要尽量陆续出版。而事端竟又是接二连三地发生。1869年10月13日，圣一伯沃^①死于自己的小屋里。在遗嘱中他要求自己所在的任何团体，不论是法国科学院还是元老院，都不要参加他的葬礼并且不要在墓前发表任何演说。他写道：“我死后，请把我的尸体直接运往蒙帕尔纳斯公墓，并放在我母亲的墓穴里，也不要经过教堂，这是为遵守我的意愿，请不要违背。”这种做法在当时曾引起公愤，拉鲁斯无疑参加了这位自由思想家的葬礼，他曾说：“圣一伯沃以一个自由思想家的形象逝世，他那些做法是他进行的最后一次变革。”

另一事件也曾引起轰动。1870年1月10日下午4时左右，皮埃尔·波拿巴亲王在奥特依杀死了记者维克多·努瓦尔，1月12日下葬时引起骚动。3月21日至25日高级法院处理这一案件，结果波拿巴亲王被宣告无罪。由于拉鲁斯对这类事件很有兴趣，许多迹象表明，他以个人身份出席旁听了这一诉讼案。

1870年4月8日，“大词典互助会”成立（1947年改名为“大词典互助者协会”），互助会章程于同日由全体大会通过。该

^① 圣一伯沃（1804～1869），法国作家，开始是浪漫主义作家，后来成为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生前便被誉为“文学批评大师”。——译者

互助会向一切愿意入会者敞开大门，其中包括妇女和学徒工。其办事机构组成人员为：主席一人，秘书一人，财务一人，账务监督一人，另设一人担任病残者专员，负责组织家庭访问。“每星期六领到工资后，每个会员便分别进行捐助”。当时每周发一次工资，捐款数额一般为每人两周捐50生丁，但在必要时可以加倍。如连续五次不捐者，便注销其会员资格。对迟交者，不参加全体大会者，以及办事机构成员不履行职责者另有处罚规定。新入会者应有两名介绍人作保并有三个月的候补期。会员生病后，自第五天算起，在120天内，每天可领到1法郎50生丁的救济费。“如果某一会员去世，互助会负责一切丧葬费用，并拨给其37法郎50生丁的抚恤金。”会员大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1876年1月，拉鲁斯遗孀和朱尔·奥里埃向互助会捐款100法郎。该协会成立至今已有100余年，它诞生在拉鲁斯时代。很明显，这一组织是当时印刷工人互相支援的思想的一种体现。

1870 年的战争

在大词典中，拉鲁斯对1870年战争及战后发生的突变叙述得十分详尽，颇具戏剧性，因为那些事都是他身临其境、亲眼目睹，因此也可以说是每日见闻录。对此，我们无需强求其某些细节的绝对准确，但却正是由于他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时期，所以他才能向我们提供一份活生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

这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始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即布卢瓦在1870年7月的一次所谓阴谋诉讼案。大词典中关于这次战争的条目是这样开始的：“1870～1871年的战争是法兰西记忆中最被动和最具灾难性的一场战争。战争的起因或者说借口，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说这场战争是由法国宣布的，那么它恰好符合了德国

人的心愿。”接着拉鲁斯又按时间顺序叙述了外事交涉、各种冲突，以及议院里的辩论情况，并复制了议院里主要发言稿。在谈到梯也尔时，引用了他这样一句话：“至于我，我拒绝宣布进行一场这样缺乏正义的战争。”接下去拉鲁斯写道：“对他的这一发言，左派分子全体报以热烈的掌声，并在掌声中联合起来，一致认为这一发言无比英明、深刻、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对他发言的回答，埃米尔·奥利维埃^①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慷慨而悲壮的声明，声明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豪言壮语结束的……”这里指的是那篇后来以全体内阁成员名义发表的、以轻松愉快的心情负起全部责任的著名宣言。就这一问题，勒伯夫元帅也在议会的走廊里说：“请大家不必惊慌。对于战争，我们已经准备得万分妥当。我再宣布一遍，已经准备得万分妥当。我们已把军靴腿套上的最后一个纽扣都检查过了。”对此，拉鲁斯接着说，作为一名陆军部长，在法国处于军事戒备的情况下讲出这样的话，从忠诚老实的意义上讲，这位法兰西元帅已经是不称职的了。

拉鲁斯说，实际上这场战争是王族成员蓄意挑起的：“事实证明，是王朝宫廷想发动这次战争。王后竭尽全力想挑起这场可怕的冲突。她说：‘这场战争是为我打的，我需要它。’至于为发动这次战争的秘密活动，一位同一党派的激烈作家保罗·卡萨尼亚克在《国家》杂志上无意中透露出来：‘对我们来说，宣布战争是刻不容缓的事。这是法兰西的利益所在，同时也是王朝的需要。’”

拉鲁斯对当时军队毫无准备的情况也作了介绍。我们这支军队在作战之初只有当时使用的那种步枪，“而其它一切，诸如子

^① 埃米尔·奥利维埃（1825～1913），居法国第三位的领袖，1870年他正在内阁总理任上。——译者

弹、各类军需物资、车辆、装备、运输工具、驮运工具、粮食给养、炉、灶等等都非常缺乏。一切都处于手忙脚乱之中。至于炮兵，无论在数量和射程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因此我们说，法国军队之所以失败并非败于它对手的勇敢善战，乃是败于这种空前糟糕的准备情况。俾斯麦和莫尔克及时地利用了这一机会。我国的军队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以1对3的比例作战，有时甚至是1:5或1:6。我们的将军们甚至连一份作战地图都没有。而普鲁士军队在最后收尾的战士每人都有一张制作认真而详细的方位图。”敌人的骑兵在组织上也优于我们。开战之初，我们以23万骑兵对其45万，不久敌人骑兵便增至135万。在此种形势下，要想取胜应该集中兵力，而绝不可分头出击。

8月5日，巴黎流传着麦克一马洪取得胜利的传闻，“几小时以后全巴黎便处于完全狂热状态，但随即又得知，前线并没有传来任何消息，于是狂热马上便成了愤怒。”接着便是斯特拉斯堡被普军围困和格拉夫洛特战役发生。麦克一马洪本应从夏龙向巴黎方向撤退，但在摄政的王后怂恿下，却向色当运动。此举纯系王后怕在巴黎引起革命而采取的措施。结果是9月2日国王率领83万大军在色当向普鲁士投降。9月4日巴黎宣布废黜国王成立共和国。10月27日，在梅斯，巴赞^①把173000人的军队（其中包括6000名军官、3名元帅，56面军旗、1600门大炮、25万支步枪）拱手交给德国人。

拉鲁斯同意弗雷西内的这一观点：“法国的失败，在于它本身太弱。这种劣势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军队的数量不足；二、武器不如敌人；三、组织能力低下。”色当和梅斯的两次大

^① 法国元帅（1811~1888），曾任法国驻墨西哥军队司令，1870年他率领洛林地区的军队在梅斯与普军作战被包围，旋即投降。——译者

投降并没有完全结束战争。巴黎正在积极准备迎战。甘必大^①把残兵组织起来，有时也打些胜仗。直到1871年1月28日才由朱尔·法弗尔和俾斯麦签署了停战协定。

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拉鲁斯心情怎样？他在9月6日写道：“18年前就应该发生的一场革命，今天来到了。随着这场革命的发生，法兰西共和国面向着我们被侵略的祖国诞生了，面向着我们被蹂躏的阿尔萨斯、洛林、香槟等地区，面向着被狂轰滥炸的斯特拉斯堡耸立起来了。法兰西的士兵们被那些只知道指挥警察的将军们带到火线上，被优势的敌人战胜、打垮和屠杀。巴黎已到了被围困的前夜。”

几年以后，这位老和平主义者和他的同事们却充满了复仇精神：“在我们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法兰西正在受着伤害。她满身血污，正在被尚武的精神激励得浑身发抖，而我们对此只有俯首听命。我们憎恨战争，但我们也热爱自己的祖国。她手中举起的是复仇的大旗，这面大旗并不只表示民族的仇恨，它代表了人类的仇恨。这面大旗，它庇护了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它代表着世界共和国的胜利。”

拉鲁斯对共和国的建立给予严肃的评论。根据当时的形势，他写道：“9月4日星期日，太阳发着异乎寻常的光辉从东方升起，似乎大自然对我们的哀痛无动于衷，而向着和平的革命发出了微笑，这种和平的革命即将完成。在经受了一场痛苦的失眠之夜以后，巴黎带着阴沉而愁苦的面孔起床了。”“没有遇到一点抵抗，也没费一枪一弹便推翻了一个王朝。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事件，还有比这更具特色的事件吗？一个政权的垮台并没有一个人出来保卫它，甚至在那些由于这个政权的存在而得到荣华富贵

^① 莱昂·甘必大（1838～1882），法国政治家兼律师。共和党人。1870年他当时任国防政府的内政部长同时又兼任陆军部长。——译者

的人们中间，也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不知这个政权会作何感想？”拉鲁斯接着指出，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是第一个宣告共和的城市，他最后说：“共和国的成立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欢欣鼓舞，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巴黎卫戍部队中也有了一般老百姓，也溶进了一般公民的爱国热情。”共和国“将在明天遍地开花。因为她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原则、一个高尚的思想，并且对现代社会来说，她还是，而且将愈益明显，不可抗拒的归宿，是合乎逻辑的结论，甚至是社会的需要。”

巴 黎 围 城

大词典中对巴黎遭德国人彻底围困的日期记载得不甚确切（在“巴黎”条目下是9月17日，在“1870~1871年的战争”条目下是9月19日）。关于巴黎围城的长篇释文是一篇出自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它详尽地叙述了敌人包围巴黎的进展情况，叙述了被围困者匆忙而勇敢地赶修防御工事的情形，提供了巴黎各要塞的名单，并附有每座要塞与巴黎的距离以及各要塞之间的距离。六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保卫首都已足够了，但又有许多年轻人来志愿参加。因此，仅国民自卫队就有30~40万人。城内所有的裁缝铺都在赶制军上衣和镶有红条的军裤。到处都焕发着热情工作的激情。公共工程部长原是一个手工工厂的厂主，他细心地检查着所有的项目（保卫城市的各种勤务工作、军需品的供应、饮用水的储备等等），事先准备了各类储备仓库（例如圣母广场大街上未完工的教堂也被用来堆满了饲料），牛和羊都集中在大街上，直到卢森堡宫附近。向外地逃难的居民正在匆忙地疏散……。

9月19日，夏蒂荣战斗拉开了一系列围城战斗的大幕。有一些国民自卫队队员躲到外省去了，但总的说，国民自卫队表现了

他们的勇气、耐心和愤慨。遗憾的是那些将军们并不愿让他们参战，而特罗许^①又只进行一种纯防御的战斗。9月18日和19日朱尔·法费尔拒绝了俾斯麦提出的屈辱条件。23日，在维尔朱依夫和德朗西取得两个军事胜利。9月20日巴黎市便已有20个区议会会员集会，预示了未来公社的征兆。10月2日，传来斯特拉斯堡和土尔陷落的消息。城内对间谍的恐惧已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

“只要有一点异常现象，比如窗外挂着一件衬衣在随风摆动，夜里高层楼房屋顶的牛眼窗里透出一丝烛光等等，都会引起怀疑”。但大体上讲，巴黎还是镇定的，“不满分子的老巢是在贝尔维尔，老实的巴黎市民永远感到那里是个令人恐惧的地方。”

10月5日，弗鲁朗带着5个营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市政厅门前和他属下的军官们一起敦促政府采取行动。这位雇佣兵的头领是拉鲁斯的朋友，这里对他有一个形象的描写：“他性格果断，心地宽厚，但脾气暴躁，随时都可能做出惊人之举，却却不善深思熟虑和不懂善择时机。”10月7日，甘必大在蒙马特的圣一皮埃尔广场乘汽球出发去图尔。

战事经常受到挫折，却未影响巴黎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巴黎居民迎来了第一次寒流。冰冷的寒夜袭击着城堡，而且供应也在减少，市场上空无一物，食品商店都已关门。这一切都无所谓，他们仍然没有失去信心，他们仍然信任特罗许将军……”。

10月27日，在先贤祠前面搭起了一座装饰着彩旗的高台，是为招募国民自卫队而设。老老少少的人群涌向那里，“是的，一定要参加这一盛会，以便了解人们的爱国激情，这种激情使大家心潮澎湃，并象一股电流传向各处。”同一天，费利克斯的《战斗报》宣布了巴赞打算放弃梅斯的计划，对此，政府进行了辟

^① 他当时任国防政府首脑兼巴黎市最高军事长官。——译者

谣。30日，在布尔盖发生了一次损失极大的战斗。人们得知，在停战谣言盛传时，巴赞便已在梅斯投降，接着那里便发生了暴动。11月3日，巴黎市民被召集询问是否支持国防政府。5日，进行了市政选举。

这时食品储备日益枯竭，物价上涨。11月初，一只鸡平时标价3法郎，现在却涨到14~15法郎；新鲜黄油涨到45法郎；一升菜豆6法郎。人口死亡率逐日上升，自9月18日至次年2月24日，死亡人数比上年同时期比，增长了三倍。

为进行一次大突围，特罗许重新组织了防卫体系。大词典对当时的巴黎作了生动的描写：“在所有的肉铺和面包店里，都由有经验的老人担任服务工作，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原来的有产者，过惯了悠闲自在的生活。如今天不亮便起身，在阴暗的清晨冒着十一二月里夹着雪花的冰雨到处送货。街上到处响着军号。在街心花园里、在广场上、在大街上，荷枪实弹的国民自卫队员和机动巡逻队随处可见，到处都在铸造大炮、制造车轴，装备弹药车，制造枪弹和炮弹。整个巴黎已变成一座热火朝天的熔炉。在这里锻造着各种为防务所需的器材。与此同时，它又开始了和外省的联系。外省不断向巴黎放出信鸽，翅膀下装着几乎使人看不见的小管子，里面装着比洋葱皮还薄的信纸，上面印着极其细小的文字。这种信件已收到几千封了。对这些信件的回答，巴黎则通过汽球送出。”

11月16日，朱尔·费里接替埃蒂安纳·阿拉科任巴黎市长。他肩负着沉重的为居民分配口粮的任务，他为此愉快地开拓了迄未被人们试验过的精美食品的试验科研项目，并给大家开了一张菜单以作样板：红酒蘑菇烧猫肉、狗肉加胡椒沙司馅饼；饮料则是以秋海棠作香料的甜汁。但事实上雄猫肉和狗肉早已在人们的餐桌上消声匿迹了。到11月底，一盘煎鸡蛋价值1法郎。

11月28日，一个大的突围计划制定出来了。大词典全文引用了向居民宣布这一计划的文告，并对当时的战斗作了详细的叙述……。

“12月27日，普鲁士人无视文明国家的惯例，在事先没有通知也不发警告的情况下开始炮轰我们的各要塞工事。”依据当时世界通行的惯例，在炮轰之前，须预先通知对方。1月5日，敌人的炮口便瞄准了塞纳河左岸地区：“炮弹首先在蒙帕尔纳斯公墓上爆炸，接着便在其它各处开花……有一发炮弹落在我们的朋友阿尔弗莱德·德贝尔勒的书房里，他眼见自己的手稿和他心爱的书籍被野蛮的炮弹炸成灰烬。德贝尔勒曾任《法兰西信使报》编辑，现任大百科词典主编。纪尧姆^①立即声嘶力竭地把这一破坏‘现代巴比伦文明’的野蛮行为及对巴黎的炮轰向普鲁士王后和全德国宣布。他在电文中炫耀说：‘自清晨九时对巴黎南部的要塞进行炮轰。这是一个绝妙的冬天的清晨，无风、无雪，但气温却冷到9度。——1871年1月5日于凡尔赛。’”

据拉鲁斯的说法，那些炮弹对人们引起的好奇心甚至比恐惧心更强烈。孩子们争相抢夺破弹皮，路上的行人聚集在高地上，似乎在观赏着“某种使他们开心的事物，认真地倾听炮弹在他们头顶上呼啸而过的那种不祥的声音。”德国人的目标似乎专门对着大型建筑。拉鲁斯曾引用了海纳描写德国人的一句话：“造物主把他们变成了畜牲，而科学又使他们变得更加残忍。”

人民群众对军政当局的软弱无能异常愤慨，于是出现了骚乱，一份用红纸写的宣言出现在街头。这是巴黎20个区的代表们的共同宣言。该宣言最后说：“9月4日颁布的政策、战略和行政管理法都是王朝政策的继续，应受到谴责，政府应该让位于人

^① 又称纪尧姆一世（1797～1868），当时是普鲁士国王，在他打败了法国夺取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后，统一了德国，便宣布当了德国皇帝。——译者

民！让位于公社！”1月6日，特罗许发表了告慰演说，他表示：“巴黎政府绝不投降。”但这时在各俱乐部和大街上，激动的人们情绪已达白热化。

对巴黎南部的炮轰，疯狂地进行着。“通常情况下，炮击是在晚十时开始至第二天清晨结束，也有连续炮轰一天的时候。在沃吉拉尔、格勒奈尔以及在整个巴黎郊区，炮弹不停地落地、爆炸。有一个星期日清晨四时，作者被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惊醒，原来一发炮弹刚刚在他窗前饭厅的门口爆炸。整个门面全被炸毁。幸好人们事先已经躲避。大部分居民都躲入地窖，在地窖里做饭、睡觉。当你在街上走时，你会觉得奇怪：许多火炉的烟筒都是从地下室的气窗里伸出，并且冒着黑烟。”

1月5日，从夏蒂荣突围的计划被取消了，改为1月19日从布藏瓦尔方向突围，目标是凡尔赛。但特罗许仍然借口大雾会妨碍他的作战布署。这再一次使拉鲁斯感到此人缺乏战斗意志和领导才能。在这次殊死的战斗中，有3000人战死，其中包括天才的青年画家亨利·勒尼奥。“无论如何，在经过这次被人称为‘绝望的一试’之后，如果不能成功，又不想饿死的话，就只有投降。巴黎人只能领到最后一块可怕的黑面包了，这还是人们精打细算的结果。做这种黑面包的原料，除了面粉外，什么都用。”特罗许被撤职，由维诺依将军接替。此人是前王朝元老院议员，拉鲁斯对他不蒙有一丝好感。

此时巴黎的粮食只够几天的用度，售价出奇的昂贵。拉鲁斯举了一些数字：一只胡萝卜0.60法郎，一只萝卜0.80法郎，一棵甜菜4法郎。“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15天以上，人们便可看到街上的饿殍将象苍蝇一样联成一片。”1月22日，一个军事会议召开了。会上除热尔马上校以外，所有军官都认为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在26日便开始了谈判，但这天的炮轰却加倍激烈。

“这是普鲁士人看到一切即将结束时，要把他心底积存的野性和仇恨全部发泄出来。最后一名受害者是沃吉拉尔区一个不幸的年轻女孩。她在穿过岗布罗纳大街时，一发炮弹打中她的头颅。炮轰持续到半夜，突然间万籁俱静，一炮不发了。凄惨的寂静笼罩着首都，牺牲的祭礼结束了！值得永记的巴黎围城结束了。从9月19日起，围城共持续了131天。但巴黎并没有死亡，至少它还能在痛苦中骄傲地站起来，并象莎士比亚戏剧里的英雄一样大声疾呼：

我只是屈服于饥饿，而绝非缺乏勇气！”

朱尔·法弗尔会见了俾斯麦，并于1871年1月28日签订了停战协定。2月26日又签订了延长停战期的协定。该协议规定，为解救贝尔福^①，法国政府接受德国人提出的派出30000名德军占领巴黎一部分地区的要求。这一象征性的占领由于群众的反对，48小时以后便取消了。

在此有必要提一提当时鲜为人知的一件事，即拉鲁斯曾是他家乡土西区1871年2月8日选举中的众议员候选人。在延长停战协定的第二条中规定：“停战期的延长旨在使国防政府能召开一次自由选举议会。该议会将就战争是否继续进行，或和平得以在何种条件下实现等问题表示意见。议会定在波尔多市举行。对议员的选举及议会召开事宜，德国军队将给予充分方便。”投票定于2月8日在法国各地同时举行。

当土西拉鲁斯纪念碑落成时，各报纸都提到拉鲁斯曾作过议员候选人一事。如里尔的《快报》于1894年10月16日报导说：

“公共教育部长莱格先生于下午1时35分到场，并在倾盆大雨下发表演说。他指出，拉鲁斯曾预见到民主运动即将到来。一个简

^① 在巴黎以东423公里地方的一座小城市。——译者

单的事实是，土西人民今天给拉鲁斯树起一座纪念碑，但在1870年（作者原注：应为1871年）他们却拒绝委他以立法权。”

2月8日利特雷当选为塞纳省议员。他的同事中当选的还有加里巴尔迪、雨果、路易·布朗。国民议会于2月13日在波尔多召开，16日选举梯也尔为法兰西共和国首席执政官。3月1日，议会批准同德国的和约。随后，某些议员如费利克斯·皮雅、维克多·雨果等相继辞职。3月10日，在梯也尔压力下，议会决定迁往凡尔赛而不是迁回巴黎。路易·布朗当时就曾预言，首都将会举行暴动。果然，八天以后预见得到证实。可以肯定，如果拉鲁斯当选为这次议会的议员，他肯定不会长久当下去。

巴 黎 公 社

在公社100周年的时候，人们发现，大多数作家们对公社都持反对立场。多米尼克·雅麦说：“事实是，凡立于文人之林者，都站在反动派方面，当时法兰西文化精英都站在凡尔赛一边。”他又说：“请你不要徒劳地反复计算吧，你翻遍所有的字典，搜遍所有的书橱，最多只能找出两个同情公社的作家，……一个是没有名气的魏尔伦，另一个是初出茅庐的兰波。”但是雅麦本人就没有认真地翻阅词典和书橱。他忘记了，还有同时代中最重要的那位，那就是拉鲁斯。问题不在于是否要把拉鲁斯列入当时文化界头面人物的行列之中，尽管他那支笔尖刻泼辣、生动活泼而且词汇丰富得令人吃惊。但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讲，作为一名作家，他是有充分资格的。他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文章中，他都站在公社方面。

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当时的一位证明人、拉鲁斯夫人的侄孙女安托尼娜的文章，当时她年方11。题目是《皮埃尔·拉鲁斯》：——

出于对曾经养育了我，并赋予我一个幸福童年的人的义务感，我愿在此介绍一下不为人所知的一些他的生活插曲。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这些事实在拉鲁斯和我的精神生活中，都是高尚和仁慈的体现。

拉鲁斯是个“纯粹的人”，他的生命就是工作和才智的体现。尽管在他的头脑中也曾有过一些错误的东西，如自由主义思想，曾笃信卢梭；尽管他和他的女友非正式地生活了30年之久，但他的一生仍是沿着一个诚实人的良知所开拓的道路前进的。他把仁慈施于他的周围及与他一起工作的人们身上，施于他的同事、他的工人身上，他称他们为孩子，而他们也都很尊敬他。

在1870年战争期间，我亲爱的叔祖对参加保卫祖国的工人家属特别关心。他们的妻子每周照样到他这里来领取丈夫的工资。

就这样，我们用出卖土西家产的所得拿出来分发工资。这笔财产共值四万金法郎。我们在离开土西时都伤心得哭了。因为拉鲁斯并没有积蓄，他的收入都陆续用在进行了一半的大词典上了，而无休无止的战争又影响了词典的出版。

他从王朝时期一个热烈的共和主义者一变而成为公社的拥护者。凡尔赛的军队开进巴黎之初，居斯塔夫·弗鲁朗东藏西躲并被追踪，他只好藏在可靠的朋友家里。接连两天，为避免引起仆人们的议论，都由我亲自去地窖里为他送饭。当一到风声松了些，为不使拉鲁斯受到牵连，居斯塔夫·弗鲁朗便去找他的战友。他最后还是战死在街垒上。

仅在圣母广场大街49号印刷厂门前，就有许多公社战士被杀害。有一次我们试图把一个身中许多枪弹奄奄一息的不幸者拉到我们院子里来，这时我跑到我家的3楼上，从一个

小天窗里向外张望，却被占领街垒的凡尔赛军队发现了。于是一个上尉军官和几名士兵便进入我们的院子并走进我家楼下的客厅。这时那位军官粗暴地向站在他夫人旁边的拉鲁斯说：“你这里躲藏着公社社员，刚才我们已经从窗户里看见了。我们要马上进行搜查。”这时我叔祖和叔祖母面色苍白！我也想到了地下室！……但我却毫不犹豫地走到他们面前说：“上尉先生，刚才是我从天窗里向外看的，没有人向外开枪。”

“你说的是实话吗？”

“小孩子是不会撒谎的。”我叔祖自言自语地说。

上尉便命令一个士兵和我一起到楼上观察一下他说的那个地方。我被那个士兵领着走到楼上，并向他指出哪个是我坐过的椅子（作者原注：原文如此）然后我们便下来了。他们相信了我。另外，他们时间也很紧，便走了。那一次大家都紧紧地拥抱我。

这是我第一次表现出意志和勇敢的行动。

拉鲁斯的印刷厂里大部分工人都参加了公社的行列。在出发奔赴自己的岗位前，他们分批前来向拉鲁斯告别，并依次接受他的拥抱。拉鲁斯和他们一起眼含热泪说：“是的，孩子们，去吧。我向你们保证，对于你们的家属，请你们放心，一旦你离开他们而去，我一定很好地照顾他们。去尽你们的义务吧。我的心灵和思想是和你们相通的。”

人民就如同孩子一样，对他们应该是爱护的。

在凡尔赛军队杀人放火的日子，邻居们把贵重财物都托给他们平时十分尊敬的拉鲁斯。他把他们几箱子钱币和金银首饰都放在地窖里，并对他们说：“我这房子就是你们的。”

接着便是恐怖的对公社社员的分区大清洗。成年妇女

和年轻姑娘都跪伏在叔祖父母面前请求解救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因为他们将不经审判便被执行枪决。拉鲁斯坚持认为应该释放这些不幸的人。……

这一系列可怕的感情冲动，再加上对他的巨著未来命运的担心，以及事件过后大大加重的工作量，使他的疾病第二次发作了。出于正义的感情，必须在此提出，即拉鲁斯曾提拔了许多人，并使他们功成名就。但他们却背叛了他……我可爱又可恨的叔祖，生活中充满了风风雨雨。他负担着推销书籍和写作的事务，肩负着人事领导和组织工作，肩负着与合作者协调工作等等。由于神经过度紧张，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拉鲁斯由于心血管疾病的第三次发作，于1875年1月3日逝世，享年58岁。（作者原注，应为57岁）

对这一篇漂亮文章，有几件事值得提出，该文无疑把事实给理想化了（包括拉鲁斯做好事的次数）。此外，这位小姑娘的文章至少有一处错误，即居斯塔夫·弗鲁朗在5月份凡尔赛军队开进巴黎时，并没有藏在他朋友的地窖里。他早在4月3日便在律埃被杀害了。弗鲁朗在巴札斯监狱被释放后可能曾在印刷厂留宿过。在大词典里，拉鲁斯为他立了一个很长的、充满激情的条目。

拉鲁斯笔下的巴黎公社

在1878年装订成册的大词典增订本第一卷中，“1871年的巴黎公社”条目，内容详细而丰富，足足写了大四开本的22页之多。它向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比较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拉鲁斯本人于1871年或1872年所

写。该条目的引言便是以一部名符其实的历史作品的口气开始的：“对这一痛苦的、悲剧性事件的叙述，为使其与现代历史相适应，我们进行了慎重的处理，这是因为内战的鲜血刚刚才在我们的街道上淡却，而在我国，读者们又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缘故。读者将会看到，我们仅仅局限于对历史事件的简要叙述。它也绝不是在这场斗争的第二天人们以绝对不偏不倚的态度来对它进行评价。我们力图避免错误并克服任何偏见来对这些斗争作一可靠的、使人满意的介绍。”

在整个条目中，使我们感到作者对这一流产的革命运动和它的参加者抱有一种绝非做作的真挚同情。因此，公社的各种业绩便得到详尽的、颇具好感的阐述。如在围城期间巴黎市民的困苦（“如果你没有经受过在漫长的围城日子里巴黎市民在肉体 and 心灵上所受的那些痛苦，你就不会对此有深切的感受），又如1月28日的和约和巴黎的投降，各省对于和平和君主制的顺利抉择等等。

此外，关于普鲁士人开进的前夜，人们把大炮扔在普鲁士人行将占领的地方的谣传，人们又如何匆忙地把这些大炮运上蒙马特高地；关于限期令如何将使逃亡业主和商人们破产；关于人们如何焦急地等待着当时尚未提交议会通过的租金法；关于维诺依将军如何下令取缔了几家共和派的报纸等等也都有详细的叙述。

我们不可能详尽地摘录本条目所叙述的各种事件，该译文自1871年3月18日起，一直讲到5月27日甚至一直讲到对公社的镇压时期。其中使用了大量官方或半官方的文件资料，这在其它地方是很难找到的。

释文并没有掩盖公社行政管理的失误及其内部的不和：“一想到在当时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其领导人为争夺这个昙花一现的公

社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时，便使人感到沮丧。公社、中央委员会、公安委员会，应该由谁来领导？对此人们是说不准的。虚荣和行事的愚蠢，这便是在几个星期中从他们大部分执政者身上所看到的表现。用大炮去轰击城，缺口很快就会打开，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是公社各项事务中当务之急，但据那位若阿纳尔先生的看法，这却是侵犯敌方政权的行为。”

但对公社的镇压却遭到严厉的谴责：“不管怎样，公社最终是被打垮了，接着而来的便是镇压活动。这次镇压是可怕的、残忍的，就其镇压范围之广和持续之久，可以说史无前例。时至今日，六年已经过去，当局还在逮捕、处死那些唯一的罪名是曾参与领导过社员营的人。我们对在巴黎进行的七天可怕战斗中使用，未经审判便直接处死的做法无话可说。麦克—马洪元帅曾估计，在战斗中就地枪决者约 15000 人，而阿培尔将军估计的数字更大。这些官方数字似乎在某些方面修正了巴黎出现的大大高于这些数字的传说，但对此我们无法证实。这些大屠杀他们尚嫌不足，还动用了严厉无情的军事裁判权。”有一点应该指出，该条目有一部分，起码是上述这一部分是写于 1878 年，并且不是拉鲁斯本人所写。

在那个公社受到全面诋毁的时代，起而反对残暴的镇压行动，并以一种同情的态度，至少是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这样一场造成那么多的废墟、那么多的戴孝人、那么多可怕的回忆的运动，是需要勇气的。

如果我们想了解拉鲁斯态度倾向公社的秘密，应该了解一下年龄最长的公社社员贝斯拉伊公民在市政厅前公社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他说道：“……50 年来，旧政权的维护者一直用一些伟大的词句来愚弄我们。什么‘地方分权’呀，什么‘用国家管理国家’呀等等。这些伟大的字眼却使我们毫无所得！……公社的解放，也

就是共和国自己的解放。每一个社会团体从今以后将享有充分的独立，并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公社将管理本地的事务，省级机关将管理各地区的事务，中央政府将管理全国性事务。我们要大声宣布：我们建立的公社是各公社的榜样。要工作就要有条理，就要节约，就要诚实，就要有严格的管制。在我们这个共和式的公社里，巴黎不应该有四亿法郎的行政费，应该减少到一半。政府只能是人民经过普选推举出来的忠实代理人 and 共和国的保卫者。公民们，这就是我认为应该走的路。让我们热情而果断地踏上这个征途吧！只要我们不超出纲领所规定的范围，那么国家和政府就将对我们这一革命感到高兴和骄傲并为之欢呼。这是一次如此伟大而又如此简单的革命，它将是我国历史上生命力最强的革命。”

这样的发言应该使拉鲁斯的心灵充满希望和欢欣。作为蒲鲁东的信徒，他主张地方分权和实行联邦制，并反对行政管理的官僚化。总之，他主张给予各级政权（包括个人、公社级、地区级和国家级）以充分自由。

1970年9月18日，我们收到圣一芒戴博士的一封信：“在拉鲁斯的万用大词典增订本第一卷上，收入关于巴黎公社的长篇释文，这一条目一直使我很感兴趣。这是一位伟大的百科全书学者亲身经历的写照和批判性文章。其中宝贵的历史资料俯拾即是，还有一些是我们从未发现过的。在公社100周年的时候，你们书店不打算重新出版这篇释文吗？对表明拉鲁斯是怎样一位自由思想家，有时甚至是论战家而绝不是一位沮丧主义者和庸俗的剽窃者，这将是一个好机会。他无疑是当时最合适的见证人之一。通过这部大词典我们常常感到他不但没有死，有时甚至还是一位公社的拥护者。”这位来信者的愿望没能实现。

拉鲁斯与巴黎公社

我们想讲一讲发生在当时的三件悲剧性的，或者说是奇怪的事件。这三件事与拉鲁斯密切相关，即对他进行的谋杀事件，卢森堡宫爆炸事件和企图焚毁印刷厂事件。

自1870年起到以后的几年中，拉鲁斯常常喜欢同几位朋友到德鲁昂饭馆吃午饭。在1871年公社时期，阿道尔夫·杜比松(1851~1912)任该饭馆的助理厨师。不久，他发明了一种活动随军炊事车，这时候他听到风声说，有人打算谋杀拉鲁斯。几天以后有人指给他，顾客中的某人就是这位词典编纂家。杜比松便把这一消息透露给拉鲁斯，于是拉鲁斯便悄悄地躲了起来。此事发生在1871年5月份的前半个月。谋杀可能是通过德鲁昂饭店餐厅的窗户进行。

1904年有一份报纸讲了如下事实(我们既不知该报纸的名称，也不知确切日期，我们只有这篇文章的影印件)：“杜比松先生是一位严肃的人，他从不轻易传播不确实的消息。因此，对他的话我们完全相信，还应强调的是，杜比松先生是一位本分的公民。1871年他在巴黎时，就通过公社社员的一个团体救过拉鲁斯先生的命。……”

于是我们便想到了他的一个孙子，名叫让·杜比松，出生在南特，目前住在巴黎。他在1969年12月16日给我们的信中说：“我祖父在德鲁昂饭店时，曾成功地使谋杀拉鲁斯先生的阴谋未能得逞。当时我祖父以助理厨师的身份在该饭店实习，我常常听他讲到这件事。”这件事相当神秘，而我们又找不到执行谋杀的当事人。……

1871年5月24日，凡尔赛军队还在一寸寸地争夺塞纳河左岸

地区。在头一天晚上，勒瓦索尔—索瓦尔师就已包抄并夺下了雷诺大街的两个街垒，并控制了蒙帕尔纳斯码头。在夺下瓦凡大街的“母爱图”雕塑以后，便把攻击矛头指向卢森堡宫。24日，西塞伊的军队接到了夺取卢森堡宫和先贤祠的命令，波什埃和帕都各率一支部队沿阿莎大街和圣母广场大街分别从卢森堡宫的西部和南部包抄过去。

大词典增订本第一卷对这两支部队进行了分头叙述：“（蒙帕尔纳斯）码头至24日星期二才被占领。同日，卢森堡宫的一座弹药库发出巨大的爆炸声。这一爆炸把座落在附近的大词典仓库的顶棚全部震塌，拉鲁斯夫人也被落下的碎木碰伤。这对拉鲁斯来说，是惊心动魄的。在距印刷厂仓库和他大词典手稿所在地仅几公尺的地方就筑起了一座街垒，在左边，也只有几公尺的地方，在瓦凡大街和布雷阿大街已经有3幢房屋升起了腾腾烈火，而印刷厂也几乎被公社社员所焚毁，幸而街垒的一位领导者原是该厂的排字工人，这一偶然的巧合才把大词典从毁灭性的灾难中拯救了出来。这是最可怕的一天。入夜，数不清通红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火照亮了巴黎上空……这一景象使人不寒而栗。”

1871年5月27日的《声誉报》和6月10日的《世界画报》也以统一的口径报导了这一事件。《世界画报》是署名文章：“24日发生了一次爆炸，据认是卢森堡宫的一座弹药库出事。它引起全区的强烈震撼。……卢森堡宫殿受到破坏，玻璃全部震碎，其它物品幸未受损失。”

1875年1月5日《事件报》披露了远比火灾更为严重的另一事件。据一位排字工人透露，他指挥的那座街垒的战士接到一份命令，要他们去烧毁“穷人小修女慈善院”，这片房屋与大词典印刷厂紧邻，于是他便通知了拉鲁斯。

“我们的作家大声喊了起来‘这岂不是要把我多年辛劳写出

的原稿全部毁掉吗？！这简直是要消灭我无数个通宵达旦辛勤创造出来的成果！’这位排字工人犹豫了一会，那后果他是完全了解的。最后拉鲁斯终于说服了他，于是这位工人说：‘好吧！我同意你的意见，但不这样做，则要用我和我同来的这些人的生命作代价，因为这样我们马上就会被包围……’说完他们便离去。”

“穷人小修女慈善院和大词典终于保住了。一刻钟以后，敌人便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街垒里没战死的几个公社保卫者全部落入正规军手中。”在此我们愿意顺便向那些无名英雄们致以敬意。从拉鲁斯平时的言行和这次事件中可以看出，他与公社社员关系良好，这也使我们想起了他的侄孙女安托妮娜讲的他收留受伤社员和家里被搜查的那段插曲。当时利特雷的手稿也几乎被焚毁，他的手稿存放在距拉鲁斯印刷厂几百米远的地方，即西部大街12号亦即今天的阿莎大街78号，但利特雷对公社的热情却远远比不上拉鲁斯。

结婚和去世

说到结婚，我们应再提一提他的外甥奥里埃。这是一段堪可和古罗马的浪漫故事相媲美的插曲。拉鲁斯的遗产，按法律规定需全部交给他的“儿子”奥里埃来继承。但拉鲁斯并没有正式举行过婚礼。另外，奥里埃又坚持他的舅舅应该娶那位自15岁就开始是他的“家庭主妇”的那个人，为此他宁可失去一部分遗产继承权。他说：“必须保证她生活安定和生活来源。我认为我应该从一位真诚的人那里继承这一笔遗产，而一位真诚的人不应该让这位女性无法保证自己的生存。”而他的舅舅则基于两个理由听不进去：作为一个蒲鲁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在理论上有一个偏见，即反对任何世俗的形式主义，特别反对举行结婚仪

式，这是一。第二，作为一个文化人，一个极力鼓吹放荡不羁、自由和鄙视女性的人，他认为所有妇女都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想不通，为什么当前这种使他十分满意的状况不能维持下去。在大词典中，他曾提到某某人象一个小市民一样结了婚，并宣称：天才都是独身者。在孔多塞^①条目下，他曾这样写：“1786年，年已43岁，孔多塞结婚了。一个达到这一年龄的人，特别是作为18世纪的一位哲学家，竟在对异性的爱慕面前缴了械并结了婚，这是令人费解的。我们不能对他加以责难，但我们只能说，这种现象是罕见的，如此而已。……”

然而，拉鲁斯自己最后也缴了械。1872年1月12日，他在巴黎的公证人奥布隆夫人面前签了结婚证书，并于次日，1月13日，在巴黎第六区区政府举行了结婚仪式。自那时起，苏珊·波利娜·科贝尔便成为“拉鲁斯夫人”，并经常承担着看护妇的职务，陪丈夫去疗养院和外出旅行。她丈夫的疾病每次发作，身体状况的日益恶化，都给她造成许多痛苦。

拉鲁斯终于在1875年1月3日晨1时病逝于巴黎寓所。

新闻界在那个时候只报导查理·加尼埃新写的歌剧举行首演式的消息。庄严的首演式于1月5日星期二举行，那天正是拉鲁斯安葬的日子。这一年一月份特别寒冷，整个巴黎都结了薄冰。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麦克—马洪元帅的夫人举行了她主持的第一次舞会。就在这上流社会达官贵人、仕女名媛们翩翩起舞的时刻，拉鲁斯悄悄地离开了人间。他早于阿格里科尔·佩尔迪基埃六周逝世。同年去世的还有埃米尔·佩雷尔，画家米勒和科罗，埃德加·基内。米什莱先一年去世。

^① 孔多塞：侯爵（1743~1794）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兼政治家。曾任法兰西立法院院长，后任国民公会议员。因属吉伦特派遭逮捕，在狱中他写了《人类思想进步历史图表草案》。——译者

巴黎警察局的档案馆于1871年毁于大火，因此我们无法找到第二帝国时期有关拉鲁斯的刑事档案。他仅存的档案只有1871年以后的资料。其中有一份报告是关于他1871年3月14日被罚款100法郎的事，理由是“未经注册擅自出版题为《论布朗基》的政治小册子。编辑人记者孔贝。被告抗传。”还有奇怪的是，警方当局竟对这位词典编纂家的安葬仪式进行了严密监视。至少有十份报告是向市警察局长详细报告安葬仪式情况的。当时派出了10名警员进行监视。

下面是这些报告的主要内容：死者住宅周围聚集了2000多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换上了新衣”，另有许多好奇的人被“华丽的车队”所吸引前来旁观。这是第一流的送葬行列，灵车上装饰着许多紫罗兰花束、各种鲜花以及象征不朽的黄色菊花扎的花环。没有叫喊声，也没出意外政治性事故。有350人参加了南方公墓（按：即蒙帕尔纳斯公墓）的仪式。市参议员德柏尔勒致悼词，他回顾了死者的生平，“并代表自由思想家、代表他自己82岁的老父，代表拉鲁斯的遗孀——拉鲁斯勇敢而忠实的伴侣，以及代表他所有的同事”向拉鲁斯最后告别。另一姓名不详的参加者（巴黎一位小学教员）也致了悼词。最后，拉鲁斯在凡尔赛师范学校的一位老同学名叫维尔奈（或者叫梅尔莱）也作了即席发言。在第二个人讲完之后，人群中有人高喊：“给我们孩子以自由受教育的权利”，对此，无人响应。

参加送葬的人“很少显要人物”，可以叫出名字的有居斯塔夫·纳盖夫妇，“文化人及自由思想家协会”的埃尔奈斯特·阿迈尔，康达科莱尔……等人。“大部分送葬者都属有文化教养阶层人士”。监视人员还报告了安葬的时间：下午四点，由十辆马车送行。

如果拉鲁斯地下有知，他对警方在他进坟墓时都对他进行监

视一事，也一定会发出莞尔一笑。……

据《世界画报》1月16日报导：“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为这位善良的人忙碌起来了，纷纷介绍他高尚的品德。”1月5日的《时代报》和同一天的《小报》（拉鲁斯曾是该报的股东）也发表了文章，在谈到大词典时，《小报》说：“拉鲁斯先生以毕生精力致力于这一伟业，最近几年以来，他的思维已然不能负担这一重任，但这位坚强的作家硬是活了下来，他的巨著也从而得以全部完工。”同一天的《事件报》对此事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

《声誉报》杂志1月16日（本消息应在上一期发出，因他们消息来得迟，故在本期发表）对拉鲁斯逝世只在第50页上发表了16行字的消息，但在第53页上却登出了一副非常精美动人的拉鲁斯肖像：进入老年期的拉鲁斯，由于疾病缠身，那副充满书生气的憔悴面孔略显忧伤，那胡须由于饱经风霜已变得花白，嘴角上刻着辛酸的纹路，只有那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

依据1875年6月7日的继承权申报表，拉鲁斯夫人又接受了属于她所有的215,000法郎（是否仅为一种形式姑且不论），因为依据1872年1月12日的结婚证书，她是这笔遗产的合法受赠者。她在经过公证人奥布隆的认可后曾宣布过放弃对这笔财产的继承权。其余的620,057法郎又53生丁，以1/4分给在土西的父亲阿特纳斯·拉鲁斯，其余的3/4则属他们的外甥所继承。须指出的是，这笔财产的税金竟达39,780余法郎。因为占总数一半的一大笔金额是从“文学作品著作权”中所得，故须交税。为使事业继续下去，必须把全部资金集中于奥里埃手中。因为自此以后他便是该印刷厂的唯一负责人了。他也被公认为是“这笔遗产的能干的经营着。”

纪 念 碑

1877年，即拉鲁斯去世的两年以后，在蒙帕尔纳斯公墓为他建立了一个专供凭吊的纪念碑。1894年，另一座纪念碑也在他的家乡土西落成。

1877年1月20日，《世界画报》杂志发表文章，并附有插图，对落成仪式进行了报导：“1月3日星期三，在蒙帕尔纳斯公墓为纪念《19世纪万用大词典》的作者拉鲁斯而建立的纪念碑举行剪彩仪式。该纪念碑为建筑师沃德勒梅尔带来了巨大荣誉。纪念碑是一巨大的石棺，顶端是一金字塔形的四角椎体，上面用青铜塑就一尊拉鲁斯半身像。拉鲁斯的同事、他的工厂的职员、土西镇长及许多镇议员都参加了这一仪式。许多“文化人协会”的会员和新闻界的代表也参加了。他们并为能参予这一盛会而感到荣幸。许多人发表了讲话。其中有年高望重的大词典合作者布瓦西埃先生，印刷工人代表布特米先生，以及“文化人协会”会员阿芒·伏雷先生等……”。

另外，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到（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仪式上还有三名警方的探员，他们事后向当局写的报告说：共150人参加仪式，其中有3~40名妇女，还有50余人是好奇的观众。有四人发表讲话……几乎所有的参加者都是文化界人士，还有其家庭的一位成员（按：指奥古斯坦·布瓦耶）由拉鲁斯夫人挽着手臂，依次向来宾致谢。

1877年1月3日的讲话，随后由大词典印刷厂印成八页的单行本发行。布瓦西埃在讲话中说，拉鲁斯“永远活在读过他的作品的人的心中，他们永远怀念他，并为他的逝世而永远哀悼。小学教师们把他的作品发给学生阅读，并每天都能欣慰地看到这些作品

所发生的作用。他也将永远受到广大学生的爱戴。当他们一旦能够从这些著作中体会到对自己的教益后，便会愈益感激他。而拉鲁斯的生命价值，则可能是在孩子们的心灵上所带来的巨大欢乐。如果拉鲁斯有知，他也会对此欣喜万分。因为，能够驾驭孩子们的心灵，将是对人类未来施予影响的有效手段。”

布瓦西埃接下去又谈到大词典和词汇教学法，他认为大词典的编纂只不过是词汇教学法的继续，而词汇教学法是十分出色的。

1877年7月间，拉鲁斯夫人就曾建议，在家乡土西建立一座纪念碑，费用全部由她承担。但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遭到土西镇议会的否决。

拉鲁斯夫人于1890年去世。在1892年的选举中土西镇旧镇长下台，由保罗·德弗朗斯任镇长，这就使得他与奥里埃得以旧案重提。1893年，沙迪·卡尔诺总统批准了建立纪念碑的提议，并开始公开募捐，土西镇议会也捐了款，奥里埃负担除捐款外的全部建筑费用。纪念碑底座模仿蒙帕尔纳斯公墓沃德勒梅尔的设计式样，而雕像则用佩罗的设计方案。

1894年6月24日，沙迪·卡尔诺总统被暗杀，纪念碑落成式由原定的7月15日推迟到10月14日。街头张贴了广告，报纸发表了启事，并向邻近的市镇发了通知，对所有参加人都发了请帖。被邀请者中，不能参加的有前部长斯普雷埃，初级教育司的负责人布伊松。他们在表示歉意的信中说：“我谨在此向土西城的这一行动表示祝贺，此举是你们对拉鲁斯纪念和感激的公开表示。拉鲁斯是一位小学教员，他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由于他献身于全民教育的崇高精神而成为一个坚定的科学和品德教育的普及者，并为此而赢得了荣誉。”“我衷心支持对拉鲁斯的这一纪念活动，我对拉鲁斯相当了解，并为使大家不要忘记他的崇高品质而做过工作。他的家乡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向这位人民的儿子、向

这位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做过万千好事的儿子表示怀念之情，对此我谨致谢意。”

土西城进行了包括钟楼在内的全面装饰。迎接乔治·莱格^①及其他显要人物的专列于13点35分进入车站。在广场上为纪念碑举行了揭幕式后便开始讲话，首先是镇长保罗·德弗朗斯，接着是雅瓦尔博士的冗长演说。乔治·莱格的讲话受到在场的5000名群众热烈欢迎。最后是奥里斯—拉鲁斯讲话。仪式结束后，来宾们参观了镇发电厂、男、女小学校。然后便在敞棚里举行了320人的宴会，每人标准为6法郎，我们看见过这次宴会的菜单。席间有歌咏及军乐队伴奏。

乔治·莱格在讲话中对拉鲁斯作了评价，他说：“他是一个诚朴而善良的公民，温和的哲学家，非常善于独立思考的思想家，一个很自信的共和主义者。他追求真理的愿望超越一切，并有为追求真理不惜穿越荆棘丛生的小路而置一切危险于不顾的勇气。”镇政府至今仍然保留着20篇各报纸对于这一集会的报导文章。谨举其中两句：“如果所有从拉鲁斯那里受到过教益的人都来参加今天这个仪式的话，那么这里的平原不管有多大，也将全部占满。”（《高卢人报》）“说实话，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要他识字，无论是谁都应该对拉鲁斯表示感谢。”（《时代报》）

身后的荣誉

拉鲁斯生前视荣誉如草芥。这位辛勤的劳动者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他从不让别人过多地谈起自己，他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没有得过一枚教育勋章，也没有一小条绶带。如果有人对他说，

^① 乔治·莱格（1857～1933）法国政治家，曾数度出任海军部长，为法国海军事业做出过许多贡献。他当时任公共教育部长。——译者

有朝一日法国的许多学校和街道将会以他的名字命名时，他可能会纵声大笑。然而这却是事实。

1876年5月22日，他生前的一位土西订户给《荣纳日报》写信说：拉鲁斯的大词典“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的百科全书，刚由他的夫人和他的外甥献给了镇图书馆。这一慷慨的馈赠将是我们镇政府许多最骄傲的荣誉之一。再加上艺术家佩罗雕塑的一尊他的青铜像（作者原注：原文如此），将向我们这一代及后人展示出这位伟人的全部特点。他为从事这一崇高的事业贡献出全部财产和生命。镇议会于本月14日经投票一致通过向拉鲁斯夫人及奥里埃夫人（作者原注：原文如此）表示真挚的敬意。在这一时刻为弥补无以回敬的遗憾，特决定把大词典作者出生地‘大区’那条街命名为拉鲁斯大街。”

1882年，马拉科夫镇（1883年以前属旺沃镇）的一条大街也命名为“拉鲁斯大街”。下面是该命名证书的原文：

鉴于拉鲁斯先生在教育事业中做出的贡献，特别是通过大词典的编写为普及群众教育做出的贡献，

鉴于这位著名作家生前曾住在旺沃镇博韦大街28号，而今他的遗孀拉鲁斯夫人继续住在这里。

兹决定自即日起，博韦大街即改名为拉鲁斯大街。

塞纳省旺沃镇镇长（签名）

随后巴黎市议会也行动起来。1886年12月25日市议会决定把巴黎第十四区的一条街道以这位大词典编者的名字命名，虽然遭到当时许多有正统观念的人的反对。

在土西有两所学校也以拉鲁斯命名，一所是规模很大的男校，于1896年改名为“拉鲁斯高级小学”。另一所是原“社会教育中心”，男女合校，于1975年正式以拉鲁斯命名。

1902年12月24日，巴黎一家银行隆重纪念拉鲁斯—布瓦耶

书店创建 50 周年。该书店创办 100 周年纪念于 1952 年分别在巴黎和土西举行。雅克·莫罗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位求知欲极强的人从未停止过对知识的探索。由于他生性慈爱，遂使他成为一个非宗教的传教士，并且始终坚持这一使命。……即使处于极端黑暗的年代中，由于他的坚强信念，拉鲁斯这颗星也一直发射着纯洁的光辉。他一生都为别人工作，为你们大家为子孙后代工作。而这一切又绝非为了沽名钓誉或博取别人的感激。正因为如此，他这颗明星今天才得以升到天之绝顶。今天，该是他取得报酬的时候了。他的雕像高高地矗立在上面，俯视着他家乡的孩子，看着荣誉之光在焕发，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它是逝者们的太阳。”同年，即 1952 年，他在格雷万博物馆占了一席之地。

1967 年 11 月，巴黎举行集会纪念他诞辰 150 周年。由他的书店出版的许多小册子中，对 1952 年和 1967 年的两次纪念活动都作了突出的描写。这两次纪念活动再加上 1968 年 5 月 11 日和 12 日在土西发行的印有拉鲁斯头像的 40 生丁纪念邮票，可以说，对他的纪念活动已达尽善尽美的地步。

在 1961 年 9 月份的《生活与语言》杂志上，莫里斯·拉特写了一篇关于拉鲁斯的文章，他的结论是：“这位原只受过初级教育的自学者，虽然有些罗嗦和持有某些与语言学无关的政治见解，但他在传播和保卫我们的语言宝库（它不论是学者语言还是群众语言，都是十分丰富的）方面，所做的努力比任何人都多。”他尊拉鲁斯为 19 世纪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学者。奥拉斯·马尔古在他的一份传记中是这样结束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要以这样一位普通而谦虚，勤劳而坚定的人为榜样。他的学识造诣，他的财富和荣誉，无不来自于他那不屈不挠的毅力。”

继 承 人

有关本章的材料足可写出一部书，我们对有朝一日能就此主题单独出一本书并不悲观。经过 100 年认真而精心的管理，拉鲁斯书店在营业额上已居法国出版商家的第二位，而在大百科全书和词典出版方面则居法国第一。这是一家在国外享有盛名的书店，其图书发行量在国外十分可观。在这 100 年中，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数次经济危机。这段时期，无论就名人轶事还是各种值得纪念的物事来说，都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也是一部几代人的连续史。

奥古斯坦·布瓦耶和苏珊·拉鲁斯

一分为二的拉鲁斯—布瓦耶书店于 1885 年又重新合并。在这之前，奥古斯坦·布瓦耶在其两个侄儿埃米尔·莫罗（1841～1919）和奥古斯特（1844～1884）帮助下自己经营书店。自 1871 年起，保罗·吉龙也参予管理。而另一方则由拉鲁斯的遗孀和她的外甥奥里埃于 1875 年 1 月 23 日联合创办了一家出版公司，其目的在于把大词典的编纂工作搞完并将其全部出齐，同时也继续出

版由拉鲁斯署名的和其他人编写的教科书。公司定名为《拉鲁斯遗孀出版公司》，资金固定为796,643法郎又40生丁。

在1875年1月23日的开业证书上，苏珊·拉鲁斯被称为“靠利息收入者，现住巴黎圣母广场大街49号”。后来她迁往马拉科夫的拉鲁斯大街28号，最后定居在迪尼并在这里逝世。她的死亡证书是这样写的：“1890年1月25日21时，印刷商兼发行人保丽娜·苏珊·科贝尔于寓所去世，终年65岁，出生于马尔维若尔，曾定居塞纳省迪尼磨房大街3号，系弗朗索瓦·科贝尔及苏珊·热丽（均已去世）之女，皮埃尔·阿塔纳斯·拉鲁斯之妻。”

1879年她曾荣获一级教育勋章。当时的杂志报导说：“拉鲁斯的未亡人刚刚获得法兰西一级教育勋章。在报导公共教育部长这一决定时，我们有责任表达这一决定给我们带来的喜悦。这位功勋卓著的伟大女性的品德，突出地表现在在最痛苦的时刻，她顶住了考验。对此，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敬意。在她的外甥奥里埃的协助下，她完成了伟大的编纂家、她的丈夫所留下的艰苦卓著的未竟事业。在分享他身后各种财富时，最令人欣慰的，莫过于看到荣誉之光终于照在了她身上。这种荣誉紧密地与19世纪法兰西文学书店所产生的那部鸿篇巨制联系在一起，并因之把它的作者拉鲁斯这个名字置于法兰西名人之列。”

1877年在蒙帕尔纳斯公墓纪念碑落成典礼上，奥古斯坦·布瓦耶曾被拉鲁斯夫人挽着手臂以他们俩人的名义并代表全家向来宾一一致谢。后来又在拉鲁斯夫人和她的外甥奥里埃的提议下，以布瓦耶的健康状况不佳为由把原来已分为拉鲁斯和布瓦耶两家的书店又合成一家。1885年4月30日，拉鲁斯夫人和奥里埃的联合宣告解体，随之一个由拉鲁斯夫人、埃米尔和乔治·莫罗、奥里埃和科罗德·奥热联合创办的出版公司成立了。名字仍然是“拉鲁斯遗孀出版公司”。这时奥古斯特·莫罗已在前一年去

世。保罗·吉龙当时任圣—安德烈—德札尔大街分公司的经理，他是1887年5月加入的。

对拉鲁斯书店来说，1885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1886年布瓦耶书店把资金全部转让给它。1878年该公司自圣母广场大街49号搬迁到蒙帕尔纳斯大街19号，并在那里建立了印刷厂。自那以后，该公司的落款便是：“蒙帕尔纳斯大街拉鲁斯遗孀出版公司”，但该公司的信笺在上述名称下又加上“拉鲁斯—布瓦耶联合书店”字样。

“布瓦耶先生的积极作用已告结束；但他对于自己曾为其蓬勃发展而在各方面都做出极大贡献的这一事业，却仍不能毫不关心。他仍然对他的侄辈和老同事们提出建议。此外应该指出的是，他把自己不懈努力换来的全部财产都用在—一个高尚的消费上。在那个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余威还在继续威胁着人们的年代中，他把很小就成为孤儿的侄子侄女们抚养、教育成人、为他们的婚嫁承担了全部费用，并把他的关怀施及侄孙们身上。因此可以说，他作为一个鳏居的老人，已把自己形成一个大家庭的中心，这个大家庭的成员竟有50余名之多。可以说，在时刻关心自己的后代，并为他们做出牺牲方面，他为多子女老人们做出了榜样，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榜样。”（见大词典增订本第二卷）奥古斯坦·布瓦耶度过了自己充实的一生，于1896年7月17日在巴黎逝世。享年76岁。

1952年，拉鲁斯书店的经理人，布瓦耶的侄孙雅克·莫罗又提到了这位被世人过于冷落了的人物（见《荣纳日报》10月14日第四版）：“今天，当我回忆起我们书店的创始人之一奥古斯坦·布瓦耶的面孔时，仍感到无比亲切。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那时，他已退休了，但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仍然充满了启发教育的精神。有一天我同他在卢森堡公园闲

谈（已经60多年过去了，多么可怕啊！）祝贺他的生日，他睿智的面孔上带着微笑对我说：‘我也同样，小雅克，我也祝贺你的生日，咱们俩不都是四月份出生的吗？你多大了？’我回答说：‘爷爷，我七岁，您哪？’‘我恰好是你今年年龄的10倍。我给你时间，你仔细算算看……拉鲁斯和奥古斯坦·布瓦耶是两个人，两种性格，前者是一位创造者，激越、热情；后者是一位组织者，沉着、冷静。布瓦耶考虑到，作为教育家的拉鲁斯，他的有关词汇学的作品有其不容置疑的价值，于是便把为出版这些作品而筹措资金作为己任，从而保证了他的合作者硕果累累。……在那以前，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俩人协调一致、步伐合谐。但到了这时却出现了人们在运动会上常看到的那种情况：一个优秀的运动员突然一下子松了劲，离开了他的伙伴，这就是拉鲁斯的情况。就象魔鬼附体一样，他一心一意想编一部“能解答一切问题”的万用大词典，并矢志不移。他为此就不能让那位处事谨慎小心，凡事精打细算的合作者拖后腿；而另外一方的布瓦耶也怀疑这位轻率、冒失的伙伴是否足够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在1863年（按：应为1869年）拉鲁斯便单枪匹马地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冒险活动，把书店交给了布瓦耶，不久便改名为‘布瓦耶出版公司’。布瓦耶之所以同意分开，是出于他一颗善良的心，他不能为此而冒险，因为他还要抚养54个侄子和侄孙……。”

1961年9月23日在奥古斯坦·布瓦耶故居前安放了一块牌匾，同时在他的侄子乔治·莫罗的故居也安放了一块上面由雅克·莫罗简明地勾画了他“叔祖布瓦耶睿智的面容和不平凡的路程”，并表彰了他叔祖务实的性格，在经商上的杰出才能以及对家乡的热爱。

1886年3月17日，由奥塞尔省民事法庭仲裁，并于同年4月10日在巴黎市第六区政府记录备案的文件中记载，奥里埃的家庭

可以在其父系姓氏奥里埃之后再添上“拉鲁斯”这个姓氏。自那以后他便可以被称作奥里埃—拉鲁斯了。自苏珊·拉鲁斯去世以后，新组建的公司就是以它来命名的。于是一个新的“奥里埃—拉鲁斯出版公司”便诞生了。该公司宗旨在继承拉鲁斯夫人的事业，参加者有朱尔·奥里埃—拉鲁斯、埃米尔和乔治·莫罗、科罗德·奥热以及保罗·吉龙。1890年2月11日在巴黎由参加人签字立约，并于次日在巴黎登记注册。

1889年，分公司由圣—安德烈·德札尔大街49号移至学校大街58号巴黎大学对面。在一份通报中说，这次搬迁目的是，分公司将“专门用来以现款出售各类书籍。凡属各类订购业务的单据、函件，以及借阅事宜均请径与蒙帕尔纳斯大街19号总公司联系，该处全面负责书信联系及邮购事宜”。

家庭企业

下面是雅克·莫罗于1952年在土西的一段讲话：“如果你们这座城镇有幸能使拉鲁斯和他的外甥奥里埃再生的话，那座站在山坡上便能看见钟楼尖顶的秀丽山村如果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集会，那就是背叛。我指的是维利埃—圣—波诺瓦，在那里诞生了奥古斯坦·布瓦耶，随后他的侄子埃米尔·莫罗和我的父亲乔治·莫罗也在那里出生，我的弟弟皮埃尔·莫罗就长眠在那块土地上。他和他的兄辈们一样，都曾是拉鲁斯书店的经理。再向远处走，沿着乌阿诺谷地直到夏多勒纳尔，便是保罗·吉龙的出生地，他也是布瓦耶的侄儿，这个家庭企业的经理之一。可以说，这一绿色的山谷就是我们这个大企业的发源地。在老一辈的书店经理人中，只有我的叔父克洛德·奥热诞生在伊斯尔·朱尔丹，这未免有点遗憾。他同保罗·奥热一样，用他南方人的热情为我们共同事

业作出了贡献。尽管他出生在南方但却和拉鲁斯的后人联了姻。”

上面这段讲话明白地表明了拉鲁斯书店的家族特点。在每一代经理中只有四个姓氏，即奥里埃—拉鲁斯、莫罗、吉龙和奥热。奥里埃—拉鲁斯和奥热两家族同拉鲁斯家族联姻，吉龙家族同奥古斯坦·布瓦耶家族联姻，而莫罗家族则和拉鲁斯和奥古斯坦·布瓦耶两家族都有姻亲关系。克洛德·奥热于1880年6月同拉鲁斯夫人的侄孙女洛朗斯·朱丽结婚，而克洛德的女儿伊冯娜·奥热又同皮埃尔·伊博斯上尉结婚，他是军人兼作家，后来成为将军。他的儿子让·伊博斯（生于1907年）开始也是军人，后于1953年正式成为书店经理（接替其叔父保罗·奥热的职务）。保罗·吉龙（1853~1934）的母亲是奥古斯坦的姐姐，名叫朱尔·布瓦耶。吉龙的儿子安德烈（1880~1969）和孙子埃蒂安纳（生于1911年）都先后继承了父亲的职务。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莫罗、埃米尔、奥古斯特三兄弟和乔治，同他们的叔父奥古斯坦·布瓦耶一样，都当过经理，而乔治的儿子皮埃尔和雅克则协理店务。皮埃尔的儿子让·路易（1916年生）则于1951年成为该书店的经理，同年，雅克的儿子克洛德（1917年生）接替了经理职务。

下面三个时期归纳了三代人的历史：1885年，相继主持店务的为拉鲁斯夫人、奥里埃、埃米尔·莫罗、乔治·莫罗、克洛德·奥热，随后是保罗·吉龙。1920年，先后主事者为克洛德·奥热、保罗·奥热、安德烈·吉龙、奥里埃—拉鲁斯、皮埃尔和雅克·莫罗。1951年为埃蒂安纳·吉龙、雅克·奥里埃—拉鲁斯、克洛德·莫罗、让—路易·莫罗和让·伊博斯—奥热。1972年以后，雅克·奥里埃—拉鲁斯和让·伊博斯—奥热两人则只对店务出出主意从旁任顾问。

一个百年的书店

作为拉鲁斯词典商标图像的那位播种姑娘十分出名。关于它的出处，有必要在此略事说明：“拉鲁斯书店出版发行的商标，那幅美丽的图像，原是根据乔治·莫罗的一张草图而定，后由大艺术家欧仁·格拉塞于1898年精心设计定稿。题文是：“我仅借风力播种”，这一题铭完全是埃米尔·雷贝埃构思而成。但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教育者，这位漂亮的播种姑娘却绝不是盲目地散播她那蒲公英的羽绒。她那张嘴吹出的气是有一定目标的，即使要使这些美好的种子播在美好的土地上。为适应拉鲁斯词典各种版本的需要，又由设计者在原标记的大框架中设计了多种变通式样。”

（见1923年3月1日《法文书店通报》）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标记是始于1880年以后的几年，即始于“拉鲁斯遗孀出版公司”的年代，那时只是一个纯粹的标记而已，并没有题文。另据乔治的儿子雅克·莫罗的回忆，这一标记始见于1890年。而最原始的，带有播种姑娘并加题铭的资料，仅见于1895年出的记载土西拉鲁斯纪念碑落成典礼的小册子上。上文提到的埃米尔·雷贝埃是法国建筑师兼装潢家，1893年去世。

这一标记的另一种式样，见于1897年出版的《最新拉鲁斯插图词典》封面上，该标记带有欧仁·格拉塞名字的开头字母。另一种式样是《小拉鲁斯词典》第一次问世时（1905），封面上的播种姑娘却用黑纱羞怯地把自己胸部遮住。埃隆·维尔弗斯说：

“把她的胸部遮住，我不想看。”并把这一形象定为1900年的风格。生动活泼的蒲公英图案极其著名，已成为拉鲁斯遗著的珍贵标记^①。1907年该书店的一位老职员提到这一标记时说：“我

^① 作者的这一段叙述，在时间上很有互相矛盾之处，大约只是把搜集到的资料作一客观的记录吧。——译者

仅借风力播种’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但我们却没找到什么有力的证据。

书店的老职员都认为店主是慷慨大方的。并且该书店也正以这一点而闻名。每逢婚丧大事及职员生病时，都能得到额外补贴。“有一位老经理为其儿子结婚，每个职员都得到一枚金路易。1909年奥里埃—拉鲁斯去世，他把一笔很大的款子（似乎是20万法郎）按资历深浅分赠给工作人员……”（引自一位老职员的叙述）但也有不足之处，即工资的分发并不总是很公平的，比如某一位女职员1907年进入该店，日工资为三法郎，而另一位1908年入店工作的女职员却每月只领30法郎（相当于六本小拉鲁斯词典的价格！）。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书店均向本店应征入伍人员和被俘人员寄赠物品。在1914年的大战期间，皮埃尔·莫罗夫人开办了一家缝纫厂，征用了许多职员的缝纫机以解他们的生活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书店又在比埃弗尔为本店人员创办了一个蔬菜种植园。1942年以后，书店职员可以分到某些食品（如食糖、菜豆、香料甜面包、罐头、土豆等）甚至还可以分到兔皮。1945~1946年，法兰西书店联合会甚至有分发大米的想法。

职员的暑假期，目前是每年一个月，再加一周的寒假（工资仍按每年13个半月发放），但请假休息的长短则按季节和职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有一个时期，编辑为一个月，职员仍为15天。

1907年的工作时间是早8点至12点，下午1点半至7点。工作紧张时再加1小时并付1法郎的加班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夏季每两周便可享受一个周末下午的自由支配权。1920年规定，如果罢工满一个月，便将取消一切福利。当时负责广告事务的只有一个正式职员，即贡贝尔，再加上一个做半日工的打字员，因此，他忙到星期日上午也要工作。……

本世纪初，在以下两个意义上讲，书店的家族气氛大大加强：一是本店职员互相通婚形成了一个大家族，他们人数并不算多，而另一部分职员则和两位创始人的后裔结了亲。比如总出纳路易·罗贝尔便是埃米尔·莫罗的侄子。在印刷厂工作的就有吕西安和亨利·拉鲁斯兄弟（他们可能都是拉鲁斯家族的远房表亲），保罗·吉龙的一位表侄乔治·比拉尔则在门市部工作。

书店里一些职员任期非常之久。比如监工格罗斯雷，在该书店工作了50几年，安德烈·吉龙的表姐土伊丽埃工作了45年，玛丽·雅卡尔和安德烈·皮舒47年。这仅是几个例子而已。因此大家对往昔那种相互间非常熟悉，彼此帮助的气氛非常怀念。这就形成了该书店工作人员数量不多的局面。比如1920~1947年间，编辑部只有25人左右，还包括校对员、制图员、排版员及摄影人员。雅克·奥里埃—拉鲁斯曾公开说过：“书店之所以兴旺，功劳在老职员们那里。”每逢节日，书店里自己组织聚会，圣诞节聚会连家里的孩子们都参加。遇有重要的日子，如《最新拉鲁斯插图词典》的发行（1898年4月2日^①）和书店成立50周年纪念日（1902年12月24日）则举行宴会庆祝。再如我们前面谈过的1952年的100周年纪念和1967年的纪念活动等都是如此。

其他重要词典

构成拉鲁斯重要著作的多卷本大百科词典凡五种，即我们经常提及的那部《19世纪万用大词典》，克洛德主持出版的《最新拉鲁斯插图词典》，保罗·奥热领导出版的《20世纪拉鲁斯词典》，《大拉鲁斯百科词典》^②和《大百科词典》除此之外还可加上

^① 这与本节前文讲的出版于1897年差一年，恐前文有误。——译者

^② 这里的《大拉鲁斯百科词典》是正式名字，我们前面经常提到的不加书名号的“大百科词典”或“大词典”都是《19世纪万用大词典》的简称。——译者

《小拉鲁斯词典》，因为它的发行量之大实属罕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词典第一卷装订成册的日期中间差不多都间隔30年：《19世纪万用大词典》第一卷出版是1876年；《最新拉鲁斯插图词典》是1898年；《20世纪拉鲁斯词典》是1928年；《大拉鲁斯百科词典》是1960年；《大百科词典》是1971年。

《最新拉鲁斯插图词典》是一部万用百科词典，共七卷，1897年开始出第一分册，1898年第一卷装订成册，1904年10月最后一卷出齐。1906年6月2日开始出增订本第一分册，1907年1月增订本全部出齐。该词典前言中说：“《最新拉鲁斯插图词典》不是《19世纪万用大词典》的简写本，但其基点却与该词典的百科全书思想相通，并在这一思想支配下编写了本词典，就这一意义讲，这两部词典有紧密的联系，但这本插图词典有其自己的新颖性，有自己突出的特点，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与前一部词典相比，它旨在“简明、实用、查找方便”。因此篇幅比以前要短。另有不同于过去的，是在每一卷的后面都把参加撰写的主要人员姓名标出，但不标出每一条目的撰写人。它还在词汇和人物自传上进行了筛选，摒弃了过时的词汇和删除了一些不知名人物的传记。该词典的编者力求公正、科学，因此他们认为这部词典“不是一部争执的机器，不是打笔仗的地方，而是对事物和思想进行心平气和地客观叙述的场所。”在此，克洛德·奥热对《19世纪万用大词典》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批评。大量的有选择的插图（有些甚至是彩色插图）是这部词典的一大特色。本词典在介绍某地区时，除了地图外，还在该条目下注明居民情况、农作物及畜牧业等。《小拉鲁斯词典》也继承了这一特点，这部词典在当时极受欢迎，在出版后的30年内便售出了25万余册。

《20世纪拉鲁斯词典》每周出一分册，第一分册出版于1927年11月26日，第一卷装订成册于1928年，最后一卷即第六卷完成于1933年，另有增订本一卷，出版于1953年11月。该词典由保罗·奥热作序，其宗旨为：“同已出的词典一样，本词典尽量提供同样全面的法语词汇，同时通过其丰富而准确的百科知识对人类各领域的知识加以阐述。”本词典收录了各类新生词类、专门术语及技术词汇甚至包括俚语行话，堪称活的法兰西语言的一部宝鉴。保罗·奥热也指出了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及该词典收录的一些有语病的词组。此外这部词典对编排方法、编排次序及评价的公正性、叙事的客观性都很重视，他说：“一部词典应是劳动的工具而不是作战的武器，它应该启迪人们的智慧而不应损害人们的良知，这便是我们为自己规定的格言。”这部词典插图比上一部更为丰富，使其成了一座“真正的肖像陈列馆”。

《大拉鲁斯百科词典》凡10卷（1960~1964）另加两卷增订本（1968年本和1975年本）。均由艾蒂安·吉龙主持，克洛德·杜布瓦协助出版。这是一部模范词典，对语言问题的处理十分谨慎。由于该词典辟有技术词汇汇编，收有1300多条技术词汇。编者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工作，有系统地摘抄了500多份期刊。……语言中老的和中世纪的表达方式被剔除了，而方言土语中的词汇也不象从前那样无限地引伸。从科学意义上讲，《大拉鲁斯百科词典》在语言处理上体现了巨大的进步和真正的转变。

拉鲁斯书店并没有在这一成功的努力以后裹足不前。他们又雄心勃勃地投入另一部词典的编写工作，即《大百科词典》（1971）的编写。其版面安排仍以字母表的顺序为纲，但却在内容上坚持了比百科词典更加“百科”的特点。“我们选择了8000多条专题条目，按字母顺序做了编排，内容为：一般概念，自传、历史分期，哲学学派及哲学运动，艺术、音乐、文

学，专题著作（如科学专题、技术专题、史地专题等）。这8000个专题条目的篇目完全以现代名称编排，并完全适应现代人的习惯。”（见“前言”）有上千名法国及外籍人员参加了这一工作。其名字见诸于合作者，大多为非常著名的人物。

我们之所以把《小拉鲁斯词典》同上述五种比它重要得多的词典相提并论，是因为它的发行量异乎寻常之大。它自出版（1905）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的销售量已达3000万部。如此受人欢迎并广泛的为人所使用，这在旧版图书和廉价图书中可以说是首开纪录。80%的法国家庭中都有这本词典。有数以几百万计的儿童和大人都想得到这本词典。这可以说是全民教育的一种形式。

准确地说，这本小词典出版于1905年7月29日，由于它本身具有的优点，再加上得力的广告，一出版发行量便大得惊人，售价也相对地便宜，5个法郎一本。在1年内就售出20万本。1911年1月份竟售出60万本。再版的次数（应该说印刷的次数）使人瞠目结舌：1905年再版6次，次年12次，在不到15年的时间内印刷了175次。而模仿者也便纷纷出现。1910年出现了《教学用拉鲁斯插图词典》，1912年5月出现了《拉鲁斯袖珍词典》（一种非常小的圣经纸印刷本），同年以它为样板的西班牙文《小拉鲁斯插图词典》问世。此外还有许多仿制品、伪造品、剽窃之作等等不一而足。

列宁于1921年5月19日写给他的同事利特肯斯的一封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使人感兴趣的证据。他在信中建议请波克罗夫斯基和一些语言学家编写一本俄语词典。他在信中说：“任务：编一部简明的（以《小拉鲁斯词典》为样本）俄语词典（从普希金到高尔基），要使用标准的现代语言，并采用新的正字法。”

该小词典每年都大量出版，因此，我们只须研究一下它陆续

出版的版本，便可看出语言史和文明史的一个清晰轮廓。隔一定时期，它便几乎要全部改写。例如1924，1935，1948，1952，1959，1968都曾做过较大的改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播种者的图案也有变化。到1973年版时，又恢复了格拉塞的原图案。

在国外，该小词典的发行量也相当大。每年60万名购买者中许多都是国外用户。在一个时期中，加拿大和比利时还出现了特别版的《小拉鲁斯词典》。用外国文字翻版的有西班牙文(1912)、葡萄牙文(1927)、希腊文(1961)、英文(1968)和美国英文(1972)。还有些文种正准备出版或正在规划之中。1931年甚至出现了供盲人使用的布莱叶^①盲文拉鲁斯词典，大开本共20卷。改编工作用了五年时间。此外还有一种名为拉鲁斯/帕泰·马尔科尼的有声词典，以唱片形式发行。

外国的书评家经常对《小拉鲁斯词典》加以赞扬。1968年意大利的一个期刊曾誉它为“最著名的百科词典”，同年3月，美国的评论就更前进了一步，它说：“《最新小拉鲁斯词典》是当代参考书中最好的版本之一。它查阅方便、资料新颖，作为单一语词典，在其它语言中尚未见有可与其媲美者。”

国外影响

由于这些词典在国外有巨大的发行量。因此拉鲁斯在提高法国的语言及文化在国外的影响方面贡献巨大。对法国在国外的经济影响也有着间接贡献。法兰西语言在世界上地位之重要绝非小可。仅举作品的翻译为例：“就作品而言，在世界上除英文外，法文是被翻译得最多的文种，位居俄文、德文、西班牙文之前。

^① 路易·布莱叶(1809~1852)法国盲教匠，他创造了供盲人使用的人用手辨认的突点文字。——译者

世界上英、法两种文字占世界已翻译著作总量的51%，但其中法文仅占15%。

法文著作以哪类作品被翻译得最多呢？被译成外文的宗教作品居世界之冠，文学和历史著作的翻译量也相当可观，相反地，科技方面的著作被译成外文者则远远落后于英文和俄文。”（据1972年1月3日《世界商业官方通报》）

拉鲁斯书店是法国最重要的出口书商之一。其出口额一般占营业额的25%左右。职员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这种国际商业活动，还不算“万国百科全书公司”的业务。该书店作为文学作品的代办所，专门负责作家们作品著作权的转让工作，并有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负责下述工作：向国外书商售书；管理分公司的事务工作；向国外推销书籍，对国外的广告、著作权的转让等。因此，各种宣传广告可以在法国、瑞士、比利时同时推出。

此外，在南美洲、北美洲、澳洲、非洲、欧洲等许多国家都设有拉鲁斯书店的分公司。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也出版了许多拉鲁斯词典，如《大拉鲁斯百科词典》意大利文本、西班牙文本、希腊文本、土耳其文本、荷兰文本等。其中希腊文本印刷了五万册。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个很大的数字。所有这些词典均按法文原著翻译出版。在拉鲁斯档案材料中还保留有各种文字的编译本，如英文、德文、荷兰文、希伯莱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①、犹太文、瑞典文、日文等等。

近年来设立了“阿歇特—拉鲁斯奖金”，对象是对研究法国文学卓有成绩的外国大学生。1970年一名土耳其大学生获奖，次年两名日本大学生获奖。这种研究奖金由法国航空公司赞助颁

^① 南斯拉夫通用语。——译者

发。

1966年1月28日,《世界报》撰文称:“作为一种重要的商业活动,拉鲁斯很早就已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范围不仅在法国本土,并已发展到国外,其‘产品’倍受欢迎而其管理方法也十分讲究效率。因此,几乎在世界各地,他的词典都被翻译或改编成各种文字,他的词典已成为印刷款式的范本、新颖和简洁明确的范本。”

今天的规模

蒙帕尔纳斯大街17号已成为一个严肃而欢快、安静而繁忙的所在。翻修一新的走廊上职员们迈着匆忙的脚步穿梭往来,但互相间却不忘有礼貌地打招呼。这已不完全象往昔那样具有十足的家族气氛了,但也没有象其它大机关里常见的那种冷漠空气。从前,当某一位经理在你面前走过时,是不向你打招呼的,但如今的领导人遇到下属时,虽不向你发表鼓动性演说,但却总不吝向你投以默契的一瞥或带有笑意的一顾。在这里有一支750人之多的庞大队伍,他们同处在一条“船”上向同一个方向划着。各部门之间互通情况,相互协商,目标一致。

拉鲁斯书店在国外的合作者有1000余人,主要任务是编辑工作,与其他编辑人员不同之处是大部分工作他们都自己动手,如撰写文章、校对、拼版、注释(直到1974年才不管印刷)并负责发行工作。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没有这么复杂的内部结构,也没有这么良好的保障工作。

我们不拟在此把从一堆白纸到印成书籍以及直到柜台出售这一过程向读者介绍,那要经过50多道枯燥乏味的技术程序。但对该书店复杂的内部结构向读者作一概述还是必要的。这些部门除

本身工作外还须接待大批来自国内外的参观团体。

其内部结构用我的话来说，一为静态结构，一为动态结构，应予分清。前者是后者继续工作的基础，或者说是中继站。属静态结构的部门有总秘书室、总服务处（负责房屋修建、物资采购、机械维修等）、表报室（工业表报、总务表报、期货出售表报、诉讼表报等）、职工服务处、纸张及装订处和信息处。

我称之为动态结构的，包括编辑部、印刷部、广告部、门市部等。编辑部设资料处（包括处理过期资料的文字档案、印像档案，还有50多万份黑白图片及十多万份彩色图片，以及一般的文字资料）、校对处（1972年起也允许女性参加）、绘图室、图片整修及制版室、摄影处（包括冲洗室和20余名流动摄影师）、插图室（负责对有插图的资料研究工作）和地图绘制室。编辑部还包括一个原件核阅组，由女性组成，她们负责重读原稿以核对所用专门名词和地理名词是否有误，所引年、月、日是否准确以及辨认原稿手迹的书写特点。这一工作与一般校对员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生产机构分成四个部门（研究部门、编辑部门、生产部门和计划部门），其目的是“保证出售部门能正常交货、保证产品处于良好状态，并十分注意调动人的积极因素。”销售部门分为国内书店门市部、期货销售部、特别销售部、国外销售部及代销处等。这一部门涉及的领域十分广阔。

一部新作的出版从初步设想到最后装订成册，要经过如下步骤：首先总经理拟定出版方案。然后对该出版物进行具体研究以定出实施规划，并对该书出版后会出现的情况作出估计（如未来的行情如何，读者的反映如何等等），在此基础上造出预算表。然后送交总经理审批，并依据文字和插图的情况确定版面布局。然后进行预编，再进行正式编排。是否要国外编辑的帮助，这时视情况而定。计划部门须定出日程表，以利各阶段各部门的准备

工作、协调工作和检查工作。这时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如制图人员、拼版人员、校改人员都将陆续投入工作。大样打出后，由十几人组成的审阅组便开始重审工作。这一工作因任务不同和阶段不同其侧重点也不同。然后便是印刷、装订、入库，再由销售部门和广告部门发行。这样，一部新作才逐步进入书店和顾客手中。

出版一部新作，要求人们诚实、严肃、认真和谦虚谨慎。法语词典总编克洛德·杜布瓦在谈到百科词典的出版工作时对我们说：“诚实，大家都很容易理解，是这一工作的首要条件。读者们期待着百科全书的编写者给他们以准确的知识，而编写人员就应自觉地同粗心大意、同偏见作斗争。为此我们组织了一套严密的检查系统以避免有意无意的粗枝大叶。每一篇文字都由几个人分别重阅一遍，而这一工作贯穿在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上（《大拉鲁斯百科词典》就曾作过这种形式的重阅达五次之多）。每一条报导性的资料都要经过数次反复核实，尽管如此细心，有时仍有某些瑕疵滑过我们的注意……。”

这可能是上帝的一种奇妙安排吧，这个书店的诞生开始仅是两位小学教员的幻想和野心。而如今这家书店已经世界闻名了。

“很久以来，拉鲁斯书店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书店了，它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研究机构，并已成为‘字典’一词的通称和同义语。‘拉鲁斯’就是必读参考书，就是争论双方的仲裁者，就是无可争辩的援兵。它在家庭的私人书橱里总是被放在最适宜的位置，厚厚的几卷大词典（每家总有那么两本、三本，六本，七本或十本，并由于版本的不同而是绿皮或红皮的）陪着主人度过一生。该书店的创建人为这一出类拔萃的巨大工程所规定的宏大和人道主义的目标已被他们的后来人忠实地继承下来，并且借助于愈来愈完善和愈来愈现代化的印刷技术和管理方法发展了这一目标。同时，他们还坚持不懈地继续寻求如何使材料更加准确、质量

更加提高的途径，力求亲自参加到迄今为止，人类正在探讨的各个领域中去。把科学的精密性和表达的准确性相结合，于专家有用，于一般人有益，坚持公正地介绍，力求每人都能接受，使人读后既能丰富知识又能心悦诚服。这些便是拉鲁斯字典一贯遵循的方针”（见1966年4月28日《世界报》）。

在即将结束这一历史的回顾时，我们还是应该再回到书店的两位创始人拉鲁斯和奥古斯坦·布瓦耶身上来。他们二人为事业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并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他们曾辛勤地耕耘，开拓了道路，为后继者设立了路标。他们为使人民群众摆脱愚昧无知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甘心为人们服务。“拉鲁斯深入到他时代的里层，坚信进步的思想，并在他的著述中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一幅逼真画面。他为我们竖立了一座辉煌的丰碑。时至今日，这一丰碑仍然保持着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他的百科全书是一个时代的体现。它反映了时代的伟大也反映了时代的缺陷；反映了人民的希望也反映了人民的失望，如果你不把它置于当时的历史框架之中去看，那么凭你怎么翻阅它也将毫无所获”（见前文克洛德·杜布瓦文章）。

在120余年的岁月中，拉鲁斯的事业促进了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它为人类的智慧服务，并以扫除人类的无知和偏见为己任，从而为在人类中间实现和平作出了贡献。因此，雅克·莫罗说：“加之拉鲁斯一词不代表任何派别，因此它是属于一切人的。在许多方面它实际上已超越了自己既定目标。人们甚至怀疑，在这一把物质手段上升为精神财富的工作中，世界上是否还有哪一家能胜过拉鲁斯书店。”